

考茨基著

# 取得政权的道路

刘磊译

112

33.112  
811

# 取得政权的道路

考茨基著

刘磊译

006838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六二年·北京

К. Каутский  
ПУТЬ К ВЛАСТИ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59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9 年版译出

取得政权的道路

〔德〕考茨基著

刘 磊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5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4  $\frac{1}{2}$  · 插页 2 · 字数 106,000

1961 年 11 月第 1 版

1962 年 9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1,501—6,500 定价（六）0.56 元

统一书号 3002·69

## 目 录

俄文版序言 .....	1
取得政权的道路(关于长入革命的政論).....	11
第一版序 .....	11
第二版序 .....	13
一 夺取政权.....	21
二 革命的預言.....	28
三 长入未来的国家.....	38
四 經濟发展和意志.....	44
五 既非不惜任何代价的革命,也非不惜任何代价的合法性 .....	56
六 革命因素的增长.....	71
七 阶級矛盾的緩和.....	81
八 阶級矛盾的尖銳化.....	90
九 革命的新时代.....	109
斯拉夫人和革命 .....	128
注釋.....	133

## 俄文版序言

半个世紀以前，卡尔·考茨基曾經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起过卓越的作用，他是第二国际的理論家之一。他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有亲身的交往；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就工人运动的許多問題給他指示，并且常常因为他背离革命的理論和策略而对他提出批評。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曾經是世界上先进的、最强大的工人政党。它曾在第二国际中起領導作用。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倾听它的声音，学习它的斗争經驗。考茨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公认的理論家。社会主义者都把他当作馬克思主义的权威来向他求教。这在当时說来是有它的原因的。考茨基写了許多帮助学习馬克思主义的著作。《卡尔·馬克思的經济学說》、《土地問題》和其他一些著作都在宣傳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考茨基正确地解决了新的历史条件在无产阶级面前提出的許多問題。收入本书的《取得政权的道路》和《斯拉夫人和革命》这两篇作品，对于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論的人是有助益的；讀者可以从这两篇作品中找到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問題的闡釋，因为考茨基曾經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宣傳家。

《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小册子是在考茨基还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写的。这本小册子的第一版出版于1909年。它闡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許多問題，批判了机会主义，考察了第一

次世界大战前夕工人运动的一些迫切问题。列宁曾說《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小册子是考茨基反对机会主义的所有著作中最后一本最优秀的著作。

这本小册子是在預感到帝国主义者背着人民偷偷准备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經临近的年代写的。这本著作的价值，就在于它指出了世界大战的迫近，批評了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軍国主义和殖民政策。考茨基写道：世界大战正在非常迅速地日益迫近。但是随着战争一起，革命也在不可避免地日益临近。考茨基号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准备战斗。

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已經达到高度的发展。資本日益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企业主手中。国际托拉斯已經建立起来，彼此划分了世界市場的势力范围。銀行和百万富翁的联合組織在許多国家已經支配了大部分资本主义企业，并且壟断了国民經济的許多部門。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已經为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創造了物质前提。

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到20世紀初期，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嶄露头角。它們因为自己分赃太少而提出重新分割殖民地的問題。旧的殖民强国不甘心把自己的領地自动让給它們。列强的殖民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战争。軍备的扩张也证明了这一点。

考茨基揭穿了軍国主义和黷武主义的囂張，因为二者已使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日益感到不安。軍費撥款与年俱增。例如，1873年德国的陆軍开支为三亿零八百万馬克，而在1909年則达八亿一千四百万馬克；海軍开支在同一时期从二千六百万馬克增加到四亿零九百万馬克。英国、法国、沙皇俄国和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当然，这些数目同今天美国、英国、法国和西德的軍費开支比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1909年說来，这是

一笔巨大的款項，它占用了国家預算的大部分，并且引起了賦稅的增加，而剝削階級又总是把这种賦稅的重担轉嫁到劳动人民的肩上。

社会民主党應該采取什么样的立場？它的策略應該是怎样的？无产階級應該怎么办？

考茨基在他的小册子中对这些問題做了回答。他尖銳地批判了帝国主义者的殖民政策，号召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階級做好应付任何历史事变的准备。

考茨基指出，首先必須設法防止战争。这就需要人民群众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考茨基強調指出，要想最終消灭資本家間的战争，必須用无产階級的政策来代替資产階級的政策，用社会主义来代替資本主义，也就是說，必須进行革命。

无产階級是否能够进行革命？考茨基对这个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随着資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階級的人数及其組織性日益增长，工人階級政党和工会也日益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与伯恩施坦及其他修正主义者的論断相反，发生的不是改良主义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是階級斗争的尖銳化。考茨基指出，整个发展都在走向偉大的战斗，这个战斗将震撼国家的基础，并且只能以推翻資本家階級告終。

考茨基号召各国社会民主党准备即将来临的战斗，把无产階級的各种各样的发动汇合成为目标明确的統一行动，而这种統一行动的最高点則是夺取政权。

“……那个盼望已久的时机現在終於日益临近，政治停滯的僵局將被打破，充滿斗争欢悅的生活將重新开始，沿着夺取政权的道路胜利挺进的进軍將要开始”（参看本书第71頁）\*。可能

---

\* 以下引文所标的頁数都是指本书的頁数。——編者

延續數十年之久的革命時期已經開始了，在資本家階級還沒有被剝奪以前，這個時期是不會終結的。

考茨基雖然並不懷疑無產階級具有戰勝資產階級的足夠力量，但是當時他還沒有意識到這種力量。他曾經着重指出，無產階級廣大階層缺乏足夠的社會主義覺悟，是取得勝利的一個障礙。

考茨基批判了那些妨礙無產階級認識自己的力量和參加奪取政權的鬥爭的機會主義者。伯恩斯坦、福爾馬爾和其他機會主義者斷言，在已經改變了的條件下，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甚至是有害的；在社會方面已經取得的各種成果，如保護勞動的法律、工會、合作社等等，對無產階級說來已經足以從各方面排擠和剝奪資本家，而無須進行革命和改變現存的国家政權。機會主義者認為，無產階級單單依靠“明智的策略”——與資產階級政黨結成聯盟，通過建立聯合政府，就可以達到自己的目的。考茨基正確地嘲笑了這些資產階級的走狗，他當時寫道：在他們看來，革命“是一種所謂已經過了時的、野蠻的手段，是在我們這個民主、道德和博愛的文明世紀不適用於採用的”。

取得政權的道路——這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只有自由主義者才幻想不消滅對勞動人民的剝削，而只通過各個階級的某種自制，來建立階級之間的社会和平。社會主義者不可能贊成階級協調和社会和平的幻想。只有在消滅階級之後才能建立社会和平，而要消滅階級，沒有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考茨基解釋說，資產階級國家是資本家手中的工具，而政府則是他們的執行委員會。因此，他反對機會主義者關於由工人階級和反動資產階級的代表建立聯合政府的建議。無產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的尖銳的階級矛盾，使二者永遠不可能一起共同管



理国家。任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政府”都必然要遭到破产。这种政策只能败坏无产阶级政党的声誉，麻痹工人阶级，造成工人阶级队伍的分裂。考茨基建议社会民主党坚决摒弃同反动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政策，认为这种政策在革命日益高涨的条件下无异于政治自杀。党只有在具有高度原则性的马克思主义政策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社会民主党越是坚定不移、始终不渝和毫不调和，它就越能迅速战胜自己的敌人。”

资本主义各国即将来临的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权。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已经日益强大和巩固，足以进行革命斗争并战胜资产阶级。一旦战争爆发，无产阶级便将以革命回答帝国主义者，而且范围不仅限于德国和西欧。

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东方各国人民开始行动起来。在亚非国家中，爆发了迟早会导致摆脱外来压迫的斗争。俄国和东方各国人民都已经进入革命时期。他们的斗争也将对欧洲无产阶级发生影响。因此，整个世界都在开始动荡。革命斗争的形式和时间的久暂是难以预计的。无产阶级可能遭到暂时的失败，但是最后必将取得胜利并确立自己的政权。考茨基在他的小册子的末尾这样写道：“那些能够参加这个伟大斗争和分享光荣的胜利的人是幸福的！”

无产阶级要通过什么样的道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取得胜利和夺得政权呢？

无产阶级革命的临近，迫切地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解决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但是，正是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考茨基做了社会民主党适应于革命前和平发展条件的旧改良主义教条的俘虏。他只限于重复这样一些众所周知的真理：革命不可能按照人的意愿制造出来；不能够预言决战将在何时何地发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将日益扩大和日益

激烈，等等。考茨基在这本著作中已經表述了那些后来得到充分发展并且使他成为机会主义者和革命敌人的观点和論断。

列宁在考茨基这本著作的摘要中着重指出：这本考察政治革命問題的小册子，“关于革命地利用一切革命形势的問題只字未提！”（《馬克思主义論国家》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8 年俄文版第 137 頁。）

考茨基在談到无产阶級革命时，总是特別重視阶級斗争的和平形式。他閉口不談无产阶級的武装起义問題，虽然巴黎公社和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的起义已經显示了这种斗争形式在无产阶級的策略方面的巨大意义。考茨基认为，无产阶級革命将比反对封建主的资产阶級革命，更少采用“实力”、武力和革命暴力来对付资产阶級。在存在着結社自由、出版自由和普选权的民主国家中，将主要采用“經濟的、立法的和道义的压力”。但是俄国是例外，因为俄国无产阶級沒有政治权利和民主自由。

考茨基建議无产阶級在未来的革命中只采取和平手段：議会斗争、罢工、示威、报刊等等。在考茨基看来，这些方法虽然“不够轰轰烈烈和有声有色，但是它所要求的牺牲也远为微少”（第 63 頁）。考茨基认为，正是这些形式将成为资产阶級民主国家中革命斗争的基本手段。1905 年以后，被考茨基看做是无产阶級斗争“最有威力的形式”的群众罢工，在俄国也被列为革命斗争的基本手段。但是考茨基把群众政治罢工同为坚持政治罢工所必需的武装起义割裂开来。在 20 世紀初期，只有武装起义才能推翻资产阶級的統治和确立无产阶級专政。

考茨基指出了工会的巨大作用。工会在干預政治的时候是以罢工这种“直接行动”来影响政府的活动的；它能够“震撼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第 99 頁）。但是考茨基馬上声明，工会的“直接行动”只能作为对工人政党的議会活动的一种补充。考茨基

极力頌揚合法斗争手段，因而变成了一个议会迷。他写道，在议会竞选和议会斗争中取得胜利，是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的。社会民主党能够经常在选举中胜利，将使资产阶级畏惧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的敌人胆战心寒，从而使无产阶级成为不可战胜的，使政权手段不再发挥作用，使国内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的变化。

从这里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观点的自由主义本质；这个本质直到后来才完全暴露出来。难怪考茨基给德国无产阶级提出了一些极端狭隘的最近任务：最坚决地争取国家的民主化；争取修改帝国议会和普鲁士与萨克森邦议会的选举法。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阶级斗争的议会形式的必要性，但是认为必须使议会斗争服从革命的基本任务，必须把议会斗争和议会外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的群众革命发动，是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取得一切成功的基础。

在关于无产阶级政权形式的问题上，考茨基也仍然站在社会民主党的旧的改良主义立场上。考茨基虽然承认无产阶级必须夺取和保持政权，但是却根本闭口不谈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政权机关的问题。列宁曾经指出，在关于夺取政权的一章中，“既没有提到‘打碎’军事官僚国家机器的問題，——也没有提到同迷信国家的思想作斗争的問題，更没有提到用巴黎公社形式的无产阶级机关来代替议会机关和官僚的問題”（《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8 年俄文版第 135 页）。

考茨基虽然口头上承认一般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却根本没有说明专政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也没有提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 1848 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经验对自己学说所做的具体说明。考茨基只是作为无产阶级遭到巨大失败的例证才提到巴

黎公社。考茨基甚至不願意考察一下俄国革命經驗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意义。

无产阶级的同盟軍問題，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論中占着重要的地位。考茨基在这个問題上也背离了馬克思主义，甚至背离了他自己早些年所写的《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当时，考茨基在这本书中回答那些硬要无产阶级同自由资产阶级結成联盟的孟什維克和普列汉諾夫时写道：“但是，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間，才在整个革命斗争时期，存在着牢固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应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整个革命策略的基础。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力量以及它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就包含在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这种共同利益之中。”\*

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这部著作中硬說，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小农对无阶级的支持，虽然抽象地說来是可能的，并且对小资产阶级本身也是有利的，但却是很少指望的。他說，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长期希望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但是他們的希望始終沒有实现。据說近十年来，小资产阶级对无阶级的憎恨加强了。因此，无产阶级必須做好应付这样一种情况的准备，即“它将不得不单独地进行未来的战斗”（第 122 頁）。

輕視农民的革命潜力，是第二国际各国党以及孟什維克和托洛茨基分子所特有的一种現象。

在这本小册子中，考茨基从他 1893 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摘引了大量的引文。那篇文章煞有介事地宣称：“現時形势的危险；就在于輕易地承认我們比我們的实际情况更加‘温和’。”（第 70 頁）实际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領袖，其中包括考茨基，要比許多人所想像的更加温和和投机得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

\* 卡·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1926 年俄文版第 28 頁。——編者

时期，他們完全背叛了馬克思主义，成了德国資产階級的卫士。

对馬克思主义許多极重要問題的无数不确切的理解，以及对这些問題保持沉默或加以背棄，不可避免地使考茨基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完全轉到机会主义的立場上去，使他变成叛徒。

在战争到来之前，考茨基号召反对机会主义。可是在战争时期，他却并不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內唯一坚持国际主义原則的李卜克內西派，而是暗中帮助社会沙文主义者。

考茨基在小册子中欢迎无产階級革命的到来。可是当我国工人階級在1917年10月完成了这个革命的时候，他却用卑劣的誹謗手段攻击这个革命，成为叛徒和資产階級的走狗。以前，考茨基曾主張建立“无产階級独裁”，亦即无产階級专政。但是，当无产階級专政在我国建立起来之后，他却对它猖狂进攻，呼吁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苏維埃共和国，成为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在革命之前，考茨基反对同資产階級联合的政策。可是在1918年德国革命的关头，他自己却同反动資产階級的代表一起参加了政府。

本书还收入考茨基的《斯拉夫人和革命》一文。列宁在談到这篇文章时写道：“……当考茨基还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叛徒的时候，他曾經用历史学家的态度看問題，他預見会有一种情况来到，那时俄国无产階級的革命精神将成为西欧的模范”（《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頁）。

考茨基在这篇文章中写道：“革命的中心正在从西方轉向东方。”19世紀前半期，革命中心曾經在法国，有时則在英国。1848年，德国也跨进革命民族的行列。20世紀开头，发生了一些說明革命中心正在轉向俄国的事件。考茨基指出，俄国革命斗争的新时代，将对西方的革命运动发生强有力的影响，并将帮助清除“开始在我们队伍中流行的萎靡不振的庸人态度和謹小慎微的

政客伎倆”(第 131 頁)。他在这里所說的“我們的隊伍”，是指德國社會民主黨而言。當時，力量的配置發生了變化：西歐已經成為俄國反動勢力和專制制度的支柱。如果不是有歐洲資產階級的貸款幫助，沙皇的寶座早就被革命粉碎了。

考茨基在文章的結尾寫道：“1848 年時，斯拉夫人曾經是摧殘人民之春的花朵的嚴寒。現在則可能成為融解反動冰層、給人民帶來新的幸福春天的暴風雨。”

這個預言在後來的幾十年中間完全得到證實了。但是，曾經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考茨基，在人类的春天降臨的年代，却並沒有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而是投身到人民敵人的營壘中去。

П. 切列姆內赫

# 取得政权的道路

(关于长入革命的政論)

## 第一版序

重新来探討一下政治革命和重大政治变革的問題，在目前反专制斗争和国家制度問題正为全世界所关心的时候，在我看来是特別及时的。很可能，业已形成的困难局面会被归罪于众望所归的个别人物。因此，必須揭示那些产生目前的不安和动摇的更为深远的社会关系，因为这种社会关系可能使个别人物的偶然特点，引起足以根本动摇我們的政治局面并为改造这种局面鋪平道路的运动。

如果說，目前的形势是促使我写作这篇作品的原因，那末摩連布萊赫尔<sup>1</sup>在《新时代》<sup>2</sup>上向我挑起的論战，則是促使我写作这篇作品的外部誘因。考虑到当前的形势，我认为有必要更加詳細地說明我对革命的观点。由于各方面要求我把我的观点弄得容易为更广大范围的人們所理解，所以我在用单篇文章的形式发表了我的观点之后，就来着手把这些文章改編成为一本小册子。当然，我把同摩連布萊赫尔的論战部分删除了，因为这个論战带有純个人的性质而缺少一般的意义。所以，緒論部分是我重新写过的。小册子这种形式使我不致像在《新时代》上那样受到篇幅的限制，并且可以超出論战的范围。

曾經只能在結尾一章順便涉及的一些問題，即当前的形势

以及它的特点和任务問題，我在这本小册子中做了更加詳細的發揮，并且成为这本小册子的基本主題。在全部九章中，只有第三章和第四章，以及第二章的后半部分，是对《新时代》上发表过的一些文章的闡述，其余部分都是重新写过的。

这篇作品整个說来是我在 1902 年出版的那本論社会革命的小册子的补充<sup>3</sup>。

有种种理由可以預想，这本經過論战之后出現的书，将再度引起新的論战；因此我在这里声明，我的不以党綱和党代表大会決議为基础的言論，我的党是不負任何責任的，而只应由我个人負責。除了党的正式出版物以外，这在发表任何著作的时候都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我认为，再一次提請批評家和論辯家注意这一点也并不是多余的。

卡尔·考茨基



## 第二版序

曾經不難“預言”，這本書將引起激烈的反駁；我在第一版序言中就提到了這一點，而我的“預言”是實現了。儘管如此，我並不認為需要對第二版加以任何修改。我只是用較新的數字代替了某些舊的數字，其餘部分都不過是第一版的重刊。

在反對這本著作的評論當中，刊載在《Korrespondenzblatt der Gewerkschaften》（《工會通訊》）上的一些文章是特別值得一提的。這些文章後來曾在《徒勞無功的勞動還是卓越的成就》的標題下以單行本發表。這些文章的特点是廢話連篇和語調尖酸，這種語調是故意用來使人難堪的。我的著作沒有給這一點提供一些微的口實；——凡是肯於花功夫讀一讀我的著作的人都可以相信這一點。在我的著作中沒有一句侮辱工會運動活動家的話。我發表在《新時代》上的許多篇文章，已經駁斥了這本小冊子所援引的論據。我認為，再來重復我對這些論據的駁斥是多餘的。我在這裡重新提起這個問題，只是為了消除可能對我的觀點所產生的各種誤解。

只是這本反對我的小冊子的標題本身就足以表明，它在責備我低估工會運動的成就。此外，它還責備我敵視工會，硬說我“漠視工會已經發展成為在經濟生活中起顯著作用的強大組織這一事實”。

這是故意捏造的謊言；我在這本書中斷然地肯定了（第95、98—99頁）完全相反的東西，指出了工會的意義和必要性。我在任何地方也沒有說過工會的“徒勞無功的勞動”，也從來沒有

否定过它的“卓越的成就”，而是相反地以非常肯定的語气着重指出了德国工会的“輝煌的发展”，并且承认它“在提高工資、縮短工时等改善劳动条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第 89 頁)。我对工会的发展所表示的关切，为許多工会运动活动家所肯定(例如在奥地利五金工人杂志上)。沒有理由責备他們对我抱有偏袒态度。

但是我承认，我的著作中的某些地方，可能使那些只是粗略地翻閱过我的著作的讀者，以为我在否定工会的成就。产生这种想法，只能是由于过度的草率，以致无从发现我曾經特別強調指出的 90 年代初期以来德国工会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如果說日益阻碍工会运动发展的因素也在开始發揮作用，那也只是最近三、四年来的事情。但是这些因素也使我有理由設想，我們根本不能指望“危机的結束，会給无产阶级带来 1895 年到 1907 年时期曾經出現的那种繁荣……不管工会过去和現在是如何重要甚至必需，我們也不應該指望它会依靠单纯工会斗争的方法，重新給予无产阶级事业的发展以近十二年来所曾經給予的那种强有力的推动……”(第 95 頁)。

这是我个人的意見。不难相信，这个意見同否定工会成就毫无共同之点，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它在 1895 年到 1907 年时期曾經給予德国无产阶级的事业以“强有力的推动”。

因此，問題不在于过去所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是无可爭辯的，——而是在于現在和将来。关于这一点当然可以有种种不同的意見。但是，如果《徒劳无功的劳动……》这本小册子的作者以为，只要把 1895 年到 1907 年时期工会在个别工业部門所取得的成就一一列举出来，就可以駁倒我所提出的論点，那他們就是在多此一举，結果只能补充說明我的論点。然而，他們却对我采取不公正的态度，企图使他們的讀者相信，我是在

否认最明显的事实，而且否认这些事实是为了缩小工会的作用。

我认为，以最坚决的态度抗議这种不誠实的論战，——如果在这里不能使用更尖銳的字眼的話，——乃是我的义务。

我对工会的未来成就的估計則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个問題上，我甚至遭到善意的和有权威的批評家的反对，因为他們担心我的著作会引起工会运动活动家的情緒低落，削弱工会的吸引力。

这些批評家的反对意見帶有二重性质。首先他們认为，我对工人階級在最近三、四年来以及最近将来的經濟状况，做了过于悲观的估計。

但是去年，亦即我的著作《取得政权的道路》問世后一年来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已經消除了对我的观点可能持有的一切疑問。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英国、奥地利和德国，到处都在物价昂騰，这在目前已經成为无产階級的最可怕的災难。

現在，甚至連那些完全不能被指責为輕視工会成就的人，也都在承认这一点。例如，史陶丁格尔教授在《Konsumgenossenschaftliche Rundschau》（《合作社評論》）杂志第 29 期上关于企业主的卡特尔及其影响写道：“由此可見，在經濟发展的前一阶段，物价虽然在繁荣时期有所提高，但是工資照例也提高得更多；在危机时期，工資虽然有所降低，但是物价也随着它降低得更多。因此，1860—1900 年这段时期的特点，是工資提高、物价降低和居民购买力提高。在我們目前这个托拉斯、卡特尔和土地壟断的經濟时期，工資虽然在繁荣时期也有所提高，但同时物价的提高却比工資高出几倍；在蕭条时期，收入虽然减少，物价却只是局部降低，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直綫上升。可見，购买力普遍降低和停滯的时期已經来临了。”

· 奥托·鮑威尔在他的那本有趣的著作《物价的騰貴》中，对这个問題做了更加詳細的考察。他在那本著作中得出結論說：

“不管工会斗争使货币工資如何提高，实际工資却仍然提高得极为緩慢，而在最近几年来甚至无疑地有所降低。現在，物价騰貴是发动工人阶级的一個最大的障碍，而反对物价騰貴的斗争則是我們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但是这些事实，无论如何不應該使我們产生悲观情緒。从我这方面說来，我既沒有理由、也不希望对工会的作用发生悲观情緒。我只是声明了这样一点：我們不應該指望工会依靠单纯工会斗争的方法，就能重新給无产阶级事业的发展以强有力的推动，像它在1895—1907年期间所曾經做到的那样。因此，我所怀疑的不是促进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而是促进的方法本身。

十分明显，只有在工人阶级迄今一直未曾組織起来而直到現在才发起工会运动的地方，采取单纯工会斗争方法才能爭取到工人阶级状况的最大、最迅速的改善。

有組織的工人較之沒有組織的工人拥有巨大的优越性。在那些迄今只有薄弱的工会組織或者根本沒有工会組織的工业部門和地区，以及在那些已經建立起了强大工会組織的工业部門和地区，这种优越性会馬上在加入工会組織的工人的生活条件的改善方面表現出来。把从前沒有組織起来而現在已經組織起来的工人的生活状况加以比較，通常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他們的生活状况的显著改善。

但是如果以为，既然从无組織阶段向有組織阶段过渡是一个巨大的跃进，那末在有組織阶段本身也應該有同样的飞跃的发展，那就不正确了。已經成为某一生产部門或地区的群众性組織的工会，能够迅速从企业爭取到那些只有通过工会組織的活动才能为工人爭取到的东西。向下一个斗争阶段过渡，这取

决于許多事前难以預計的情况；但是，有着較长时期历史的工会組織，光是依靠单纯工会斗争的方法，一般說来成功的机会总是越来越少的。这一点可以从英国的例子看得很清楚。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会縮小工会在工人眼中的意义。如果說，在沒有組織起来的工人看来，因为工会可以帮助他們爭得許多东西，因而工会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那末它在更长的时期里面，对于有組織的工人說来也同样具有这种意义。这种工人已經依靠工会爭得了許多东西，以致工会一旦倒台，他們就会受到极大的損失。而且除了工会以外，他們也再沒有其他借以繼續前进的依靠。

在那些許多年來就存在着强大工会組織的工业部門或地区，工人对工会所表示的关心具有另一种性质，但是这种关心决不会比剛剛建立工会組織的地方更少。这种工会往往力图保持既得的东西，而不去爭取新的东西，因而与其說日益变成革命的力量，无宁說日益变成保守的力量。

但这只是就純工会的职能而言。同时也可能形成这样一些条件，依靠这些条件，工会在它的发展的这个較后的阶段上又發揮一种能更加提高它的意义、同时能把它重新改造成为革命力量的职能，也就是說，它不仅能保持既得的成就，而且能爭取新的成就。

正如已經一再着重指出过的，工人运动中政治斗争和經濟斗争的比重，在資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在1890年前的德国，人們关心的主要是政治斗争。这决不是因为对工会的作用缺乏足够的理解，也不是因为有着开展政治活动（政治活动可以获得更多的东西）的比較有利的条件。

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德国經歷了一个革命的时期：旧的国家基础被摧毀，新的国家基础建立起来，实行了普遍选举

权、結社自由、自由迁徙权和一些保护劳动的法律。70年代末，这些成果中的一部分为反社会主义者法令<sup>4</sup>所廢止，同时又到来了时间延續很久的危机。工会运动的政治条件和經濟条件都被破坏了，爭取廢止反社会主义者法令的政治斗争成了主要的任务。

反社会主义者法令廢除后，形势发生了轉变。这为工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此外，在这一时期开始的經濟高涨，也促进了工会的发展。

相反地，在政治方面，有产階級之間的大規模的利害斗争結束了，社会民主党日益成为唯一力求突破現状的政党，所有其余的政党都成了公开的保守政党。于是，普遍的政治停滞时期到来了。

工会的蓬勃发展与此形成鮮明的对照。但是几年之間，在工会的前进道路上就产生了种种新的困难，这些困难不能用单纯工会斗争的方法来克服，而只能用政治斗争来克服；为了工人階級能够繼續向前发展，这些困难是无论如何必須消除的。

这些困难最明显地表现在物价的不断騰貴上面。物价騰貴的原因，一部分在于利用壟断地位来提高地租的大地主势力的日益增长，一部分在于作为世界政策的自然結果的軍备竞赛以及和軍备竞赛相联系的新賦稅。最后，資本的日益加紧积聚則是物价增长的第三个原因；資本的积聚促进企业主联合組織的建立，并使国家政权日益受其支配。反对軍备竞赛政策的斗争，反对地主和工厂主国家的专横跋扈的斗争，亦即爭取国家实现民主化的斗争，——这就是德国无产階級今天的基本实践任务。为了工人階級的繼續发展，这些任务是必須加以解决的。

当然，依靠单纯工会斗争的方法是不能解决这些任务的，正像沒有坚强的、善于战斗的、相信自己力量的工会也不能解决这

些任务一样。

如果說政治斗争在目前像在 1862—1890 年期间一样重新在工人运动中提到首要地位，那末这已经不再意味着工会作用的降低，因为形势已经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

当时，在有产阶级中还存在着要求根本改造国内现存条件并为此而寻求无产阶级作为同盟者的强大阶层；无产阶级虽然已经巩固到足以成为一支政治力量，却仍然不够强大和独立，因而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成为一个危险的敌人。

1864年以后，年轻的工人运动仍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而且这种分裂的原因已经不是无产阶级能不能从代表有产阶级利益的某一政党那里得到什么东西的问题，而是它能够从什么样的政党，亦即从俾斯麦<sup>5</sup>和瓦格涅的拥护者那里还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那里，获得更多东西的问题。

现在则情况完全不同了。如果說在我们的队伍里有时还有人主张党派联合的政策，那末不管这些人自己觉得这种主张如何行时，实际上却不外是一种返祖现象，不外是在 1866—1870 年期间早被粉碎了基础、而现时则只能是出之于一种好心肠的思想的再版。因为没有一个认真严肃的人会想到社会民主党同现存某一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联盟的问题。要想使这种党派联合的政策成为可能，我们党应该一开始就自行建立一个为此所必需的资产阶级民主党，并把适当数目的选民付托给它。领袖总是可以想办法找到的。

不，在今天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找不到另一个党来做自己的同盟者，以便进行坚决果断的政治行动。但是社会民主党借以补充自己队伍的那个阶级，现在却成了构成人民群众的一切阶级中人数最多、经济上最必要、最坚决果断、最发达和最富独立性的阶级。

現在，不是建立政党联合这种外交手腕，而是群众的行动，尤其是有組織的群众的行动，才能使我们获得成功。群众性和組織——这是符合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的武器，是无产阶级能够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取得胜利的唯一武器。但是无产阶级的群众組織和群众行动不外就是工会組織和工会行动。

沒有政治上的胜利，我們就不能获得成功。但是，沒有强大的、富于战斗力的、确信自己力量的工会的帮助，我們也就不能取得政治上的胜利。

日益把自己的純职业方面的任务局限于保持既得成就的那些早已成立的强大工会，依靠單純工会斗争方法获得成功的机会已經大大减少并且变得远为困难了；但是，党和工会协同工作的可能性却为它們有效地进行活动开辟了广闊的余地，并且使它們能够实现那些既有助于工会工作的发展又有助于政治工作的发展的措施。因此，責难坚持这种观点的社会民主党人，說他們不关心加强工会，是再可笑不过的了。这种責难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在党和工会之間散布不信任，使党和工会在它們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支持的現在发生不睦。

不是縮小工会的作用和向工会會員散布悲观情緒，而是提醒他們注意他們在純工会斗争之外所承担的新任务，从而提高工会的作用，——这是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所力求完成的任务之一。

我希望，尽管总委员会为回答我而出版的小册子对我做了歪曲，我的这本著作将能在工会會員中找到足够的讀者。他們将会理解这本著作的真正意义，并且承认著者的善良意图，甚至当他們不同意它的結論的时候。

卡·考茨基

柏林——弗利登諾，1910年7月1日



## 一 夺取政权

社会民主党的朋友和敌人都一致承认它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但遺憾的是，人們对革命这个概念本身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釋，因此关于我們党的革命性质的意見也是极为分歧的。它的不少敌人把革命仅仅理解为騷乱、流血、掠夺和纵火。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同志认为，我們正在追求的社会革命，不外是一种渐进的、不显著的、但終將根本改变社会制度的东西，就像蒸汽机所曾經做过的那样。

有一点是明显的，——这就是捍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因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得不到滿意的生存条件。要解放无产阶级，必須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政权借以實現統治的手段，建立公有制，并且用公共生产来代替私人生产。无产阶级只有在根本不同于現存制度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得到滿足。

但是，社会民主党之所以是革命的，还因为它承认：国家政权是阶级統治的工具，而且是它的最强有力的工具；无产阶级所追求的社会革命，当无产阶级还没有夺得政权的时候是不可能實現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論证的这条原理，使社会民主党有别于上一世紀前半期的所謂空想社会主义者，——例如，欧文<sup>6</sup>和傅立叶<sup>7</sup>的拥护者；也有别于蒲魯东<sup>8</sup>的信徒。这些人都輕視甚至否定政治斗争，认为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經濟改造仅仅借助于純經濟措施便可以實現，而无須改变政权

和夺取政权。

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必須夺取政权的論断，是和布朗基<sup>9</sup>有相似之处的。但是，布朗基认为，通过极少数人的阴谋、暴动，就能够夺取国家政权并使它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革命不能单靠主观願望；革命只有在具备一定条件时才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不具备这些条件时是不可能发生的；而这些条件則只能逐步地形成。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的地方，才有借助于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轉变为公有制的經濟可能性。另一方面，只有当无产阶级已变为人数众多的阶级、变为社会經濟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又已經很好地組織起来，并且既通曉本阶级的状况，又洞悉国家和社会的本质，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夺得和保持国家政权<sup>10</sup>。

这些前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它所产生的劳动和資本之間的阶级斗争的发展而逐漸創造起来；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遏止的一样，終将对抗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遏止的。

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不可遏止，是因为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必然要反对资本主义剝削，是因为无产阶级必然要組織到工会、合作社和政治团体里面去，是因为它必然要极力爭取更好的劳动条件和更大的政治影响。不管无产阶级是否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它总是要沿着这个方向展开自己的活动。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在于把无阶级的各种反对剝削的行动，汇聚成为有目的的統一行动，而夺取政权的偉大决战則是这一行动的頂峰。

以《共产党宣言》为基础的这个世界观，現在已为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所接受。我們时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个世界观上面的。

但是这个世界观在它胜利前进的道路上也曾受到社会民主党內一些人的怀疑和批評。

尽管如此，实际上事情却是按着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預言的道路发展的。国际社会主义之所以能胜利地、一往直前地前进，这不仅是由于資本主义和无产階級階級斗争的发展，而且首先是由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这个斗争的条件和任务的深刻理解。

但是在一个問題上他們錯了，这就是他們把革命看得过于迫近。

例如，在《共产党宣言》(1847年末)上說：“共产党人現在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是因为德国正处在資产階級革命的前夜，是因为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具有比17世紀的英国和18世紀的法国更发展得多的无产階級去实现这个革命。所以，德国的資产階級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

《宣言》完全正确地預言了德国革命的爆发，但它指出这个革命将成为无产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这一点則是錯了。

1885年恩格斯在馬克思关于科倫共产党人审判案的小册子<sup>11</sup>的第二版序言中所做的另一个預言，在時間上說来是較近的。他在那里說道，欧洲的下一·次·动·蕩“将很快地到来(我們这一世紀的历次欧洲革命——1815年、1830年、1848—1852年和1870年的革命——之間的間隔是从十五年到十八年)”\*\*

这个預言也沒有实现，当时所預期的革命直到現在仍然沒有发生。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卷第503—504頁。——編者。

\*\* 同上书，俄文第1版第16卷第1部第223頁。——編者

这是什么緣故呢？是不是据以做出这些革命預言的馬克思的方法不正确呢？絕对不是的。但是在这些估計中有一个因素是不正确的，它的意义被夸大了。关于这一点，我在十年以前曾經写道：“資产階級的革命反对派的力量两次都被过高地估計了。”（《新时代》第7卷第2期第45頁）

1847年，馬克思和恩格斯預計在德国将发生像1789年在法国爆发的偉大事变那样的大規模革命。实际上却不过发生了一次可怜的起义，这次起义立即吓坏了几乎整个資产階級，使資产階級退到自己政府的卵翼之下，以致重新加强了这些政府，使无产阶级运动的蓬勃发展受到阻遏。从此，資产階級重新把繼續进行革命的重任委托給各国政府（因为資产階級还是需要革命的），而俾斯麦正是这样一个偉大的革命家。他統一了德国（尽管是局部地），推翻了德意志各邦国的諸侯，帮助意大利实现了統一，把教皇推下了宝座，消灭了法兰西帝国，促进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

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所預言而直到1870年才完成的德国資产階級革命的演变。

尽管如此，恩格斯仍然在1885年預料将发生“政治动荡”，并且估計“小資产階級民主派将仍然是这样一个政党”，它在这次动荡之后“必将”在德国“第一个掌握政权”。

恩格斯这一次关于发生“政治动荡”的預言也实现了；但是他对于小資产階級民主派的期望却再度落空了。当事情发展到俾斯麦政权崩潰的时候，小資产階級民主派已經完全屈膝投降了。因此，宰相的倒台并没有超出王朝斗争的范围，也没有造成任何革命的后果。

事情已經越来越明显，革命只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才是可能的，而在有組織的无产階級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和团結到足以

把全国人民的絕大多数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在一个国家里面只有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那末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任何现存政权的倒台，不管这种倒台带有道德的、财政的还是军事的性质，都意味着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破产，因为这些政党都毫无例外地对这个政权负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无产阶级政权才是能够代替现存政权的唯一政权。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意从预期的革命尚未到来这一事实做出这样的结论：由于经济发展的结果，未来革命的条件和形式，已经不同于那些根据过去历次资产阶级革命推想出来的条件和形式。相反地，他们却做出这样的结论：在改变了的条件下，革命已经根本不可指望；革命是不需要的甚至是有害的。

一方面，他们认为业已获得的成就——保护劳动、工会和合作社的法律——的进一步发展，足以把资本家阶级从他们所占据的障地排挤出去，并且不知不觉地剥夺他们，而无须乎进行政治革命和改变国家政权的本质。这种从经济上逐渐长入未来国家的理论，不过是反政治的空想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旧词新唱而已。

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不通过革命，亦即不通过国家政权的急剧移手，而只借助于同靠攏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协同行动和建立联合政府（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参加这个政府的政党都无力单独建立这样的政府）这种明智的策略，无产阶级就能够取得政权。

他们认为可以这样来避过革命，因为在他们看来，革命是一种所谓已经过了时的、野蛮的手段，是在我们这个民主、道德和博爱的文明世纪不适于采用的。

这种观点，如果让它占了上风，那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制定的社会民主党的全部策略就将被尽行推翻。这种观点是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相容的。当然，没有理由预先认定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但是很明显地，任何一个做过仔细推敲的人都会承认这种观点的错误，并将积极反对这种观点。因为这里问题不是在于无关紧要的意见分歧，而是关系到斗争着的无产阶级的利益。

但是，在讨论这些分歧的时候，如果不充分准确地划清争论问题的界限，那就很容易偏到岔路上去。

因此，正像前面已经一再做过的那样，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问题决不在于工会、合作社、保护劳动的法律和其他保卫无产阶级利益的法律是否需要和是否有益。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没有分歧。争论的只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掌握国家政权的剥削阶级，能够容许这一切因素发展到摆脱资本主义压迫的程度，而剥削阶级并不事先利用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政权手段，来进行那种只有通过决战才能消灭的抵抗。

其次，问题也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分歧。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反对“反动群众”这种提法，认为这种提法过分抹杀了有产阶级各派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有时对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成功是具有很重大的意义的。不管是工人立法还是无产阶级政治权利的扩大，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应归功于这种矛盾。

争论的只是在一般条件下是否有可能组成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政府或联合执政党的问题，而提出的问题则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否会因此而陷入那种必将使它归于灭亡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国家政权总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之间的重大阶级矛盾，却使无产阶级永远不可能同任何有产阶级分掌国家政权。有产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总是

要求而且必定要求国家政权繼續镇压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則总是要求它自己的党所参加的那个政府，利用国家政权来支持它反对資本的斗争。这种情况最后必将导致任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联合政府陷于崩潰。

资产阶级联合政府中的无产阶级政党总是镇压无产阶级的行动的共同参加者。这种情况将引起无产阶级对它的蔑視。同时，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行动，都将受到它的资产阶级盟友的不信任，而这是会阻碍它进行任何順利的活动的。没有一个这样的政权会加强无产阶级，——也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会容許做到这一点；这只会敗坏无产阶级政党的声誉，麻痹无产阶级，造成无产阶级的分裂。

从1848年起直至今今天发动了历次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退化，完全排除了为夺取政权和共同执掌政权而同它进行有效合作的可能性。

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主張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资产阶级政党之間的分歧，并且一貫反对“反动群众”这种提法。同时，馬克思和恩格斯也給无产阶级专政下了一个精确的定义；恩格斯在1891年，即逝世前不久，还极力维护这个定义，肯定无产阶级的政治独裁是无产阶级实行政治統治的唯一形式。

即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合政府不能成为发展无产阶级政权的手段，即使无产阶级在这种政权下进行社会改革和加强自己經濟組織的可能性受到限制，也沒有絲毫理由认为，既然政治革命还未到来，就說明这样的革命只能在过去发生，而今后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怀疑革命的人們当中，有一些人的論調是不那么武断的。他們认为，在将来某个时候还会发生革命，但那只是极其辽远的事情，至少在我們这个世紀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我們的实际

政策可以不把它估計在內。根据他們的意見，我們在最近几十年內應該堅持和平長入的策略和无产階級—資产階級聯盟的政策。

但是，正是在現時，有一些事实應該迫使我們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認定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 二 革命的預言

有些人为了敗坏馬克思主义者关于未来革命的預言，常常責备我們，說我們虽然喜欢預言，却表現出是一些蹩脚的預言家。

我們已經說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預期的无产階級革命直到現在还未到来的原因。但是，只要我們撇开那些沒有實現的期望，那末我們應該惊奇的就将不是他們的預言沒有全部實現，而是他們的預言實現得那么多。

例如，我們知道，《共产党宣言》还在 1847 年 11 月就預告了 1848 年的革命。而这个預告正是在蒲魯东证明革命时代已經永远結束的时候做出的。

馬克思是在反对蒲魯东的論战性著作《哲学的貧困》（1846 年）中指出工会在无产階級階級斗争中的意义的第一个社会主义者。馬克思早在 60 年代写作《資本論》的时候，就預見到現代的股份公司和卡特尔制度。在 1870—1871 年战争时期，他預言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从今以后将从法国移往德国。1873 年 1 月，他預言了几个月以后就发生了的危机，等等。

关于恩格斯也可以这样說。

甚至在他們估計錯誤的那些情況下，在他們的錯誤中也包含着极其重要的、真理的內核。上面已經提到的、恩格斯在 1885



年所做的关于在最近年代将发生政治动荡的預計，就足以說明这一点。

在这里反駁一篇妨害人們确信理智的謬論将是适宜的。柏林教授海克涅尔在他不久前发行第五版的《工人問題》一书中，給汉諾威党代表大会(1899年)做了一番描述。他写道：

“在热烈的爭論中考茨基非常激动，竟致痛斥那种关于将使一切希望得到实现的大变革即将到来的預言，把这种預言毫不客气地叫做蠢話。这就是說，他要比伯恩斯坦<sup>12</sup>本人所做的远为过火。考茨基說，如果恩格斯真地曾經預言 1898 年将发生大变革，那末他就将不是他实际上是的那种偉大思想家，而将是任何选区都不会把他选做自己的党代表大会代表的白痴。恩格斯只不过是說：在 1898 年，普魯士的現时政治制度的崩潰可能到来。

恩格斯究竟指的是什么，这个問題依然是个悬案。但是，倍倍尔<sup>13</sup>在 1891 年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所說的那席話，即只有这个大会的少数参加者不能活到終极目的的实现，是不容許做任何牵强附会的解釋的。用考茨基在 1899 年所用的那种表达法來說，这些話也是蠢話。这段情节十分明显地表明，甚至在那些旧策略拥护者的头脑中也发生了一种变化，这就是最好根本不存任何希望。”(第 379 頁)

遺憾的是，教授先生的叙述的明确性，使人不能再希望他写出多少更好的东西来。我根本没有把那种“关于将使一切希望得到实现(1)的大变革即将到来的預言”叫做蠢話。原因很简单，因为根本不存在大变革的問題。但是，我完全有权把那种关于“将使一切希望得到实现的”大变革的預言称为蠢話。我是对这样一种提法使用“蠢話”这个詞的，即仿佛恩格斯曾給革命的爆发規定了一个确定的时日——1898 年。我的确认为这一类的預言是白痴的蠢話。但恩格斯对这一点是根本不負責任的。倍倍尔也是一样。倍倍尔在 1891 年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并没有确切指出革命爆发的年头。

早在当时就有人嘲笑他的“預言”。他对于这点曾經答复說：

“可以嘲笑和挖苦預言，但是有头脑的人却是离不开預言的。福尔馬尔<sup>14</sup>現在所特具的那种悲观論者的冷漠的理智性，几年以前对他說来还是格格不入的。他所攻击的恩格斯在1844年就完全正确地預言了1848年的革命。公社起义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所在地关于欧洲未来形势所做的那个預言<sup>15</sup>，难道不是以极度的准确性实现了嗎？（完全正确！）同样曾經对我微含嘲笑的李卜克内西<sup>16</sup>本人也常常在做着預言哩。（活跃）1870年他和我在議會中所做的預言已經完全实现了。讀一讀他和我在1870—1871年所做的演說，你們就会相信这一点。但是福尔馬尔却出来大喊大叫地說：不要提这些旧历史了，別再来这套預言了。但是他自己也常常預言呢。他和我之間的区别就在于，他对我們的敌人抱着一片光明的乐观主义，而对党的坚定的努力和未来則抱着极其危险的悲观主义。”（《議事录》第283頁）

倍倍尔的一些已經实现了的最重要的預言之一是在1873年做出的。他当时說：中央党不久便将在議會中从六十个議席增加到一百席；俾斯麦的“文化斗争”<sup>17</sup>将悲惨地結束并将促进俾斯麦的倒台。

不久前我被荣幸地列入“預言家”的行列。对我說来，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称号。

有人指責我，說我在《新时代》上連載的《Allerhand Revolutionäres》（《形形色色的革命家》）<sup>18</sup>一文里，以及在我的《倫理学》一书序言中关于俄国革命所說的話，都为历史进程所完全推翻了。

是这样嗎？

我在《倫理学》一书序言中曾經写道：

“我們很快就要进入这样一个时期：誰也不知道这个时期有多长，每个社会民主党人都将不再有安静工作的可能性，而我們的活动将变为連續不断的斗争……現在，那些替沙皇制度效劳

的劊子手，狂热地想同 16 和 17 世紀宗教战争中的阿尔巴和梯利<sup>19</sup>媲美，——但不是用軍事功勳，而是用屠杀和纵火。西欧的文化、秩序和人类其他最神圣财富的維護者都对此表示热烈的欢迎，认为这是对法律秩序的恢复。但是，正像哈布斯堡王朝<sup>20</sup>的雇佣兵，尽管获得暂时的成功，却不能在北德意志和荷兰复兴天主教一样，罗曼諾夫王朝<sup>21</sup>的哥薩克也将不能恢复专制制度。这个政权虽然还有足够的力量蹂躪自己的国家，却已經沒有力量統治这个国家了。”

“無論如何，俄国革命还远沒有結束，——在俄国的农民还沒有得到滿足以前它也是不可能結束的。但是，这个革命拖延得越久，西欧无产階級群众就将越觉醒，財政大崩潰的危險就将越临近，而最尖銳的階級斗争的时代也就越有可能在西欧开始。”

在这些写作于 1906 年 1 月的話語里，难道有什么值得我引以为耻的东西嗎？难道能够认为，俄国已經为今后的平靜的和有秩序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嗎？难道自从我写了上引的那几句话之后，整个世界已經真正进入了天下太平的状态嗎？

現在来談談我的《形形色色的革命家》一文中所做的“失敗的預言”。我当时曾和卢斯尼亚論战。他不认为由朝鮮所引起的战争会导致俄国的革命。他把我所說的俄国工人是比英国工人远为现实的政治因素这些话，叫作是一种过高的估价。我在 1904 年 2 月初日俄战争爆发时对此做了如下的回答：

“毫無疑問，俄国就其經濟发展來說远远落后于德国或英国，它的无产階級也不如，例如，德国或英国的无产階級强大和成熟。但一切都是相对的，階級的革命力量也是相对的。”

接着，我肯定了为什么俄国无产階級在当时拥有极大的革命力量。然后写道：

“西歐越是給它以强有力的援助，斗争的結局便越将不利于专制制度。尽可能促进沙皇制度的崩潰，——这是現時国际社会主义党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同时，尽管罗斯的专制君主在西歐有着对他說来有价值的友好关系，他的处境却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日本的战争可能大大加速俄国革命的胜利……俄土战争后所发生的事情，这次可能以更大的力量重演，也就是說，将采取革命运动猛烈爆发的形式。”

我在論证了这一点之后繼續写道：

“俄国的革命将不可能立即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俄国的經濟条件还没有成熟到这种程度。它首先只能实现民主制度，这种制度是为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奋勇直前的、正为自己爭取巨大让步的无产阶级所支持的。”

“这种制度将对俄国的邻国发生强有力的影响。首先，它将使这些邻国的无产阶级运动趋于活跃和加强，并在受到最强有力的推动之后，主动冲击橫在真正民主道路上的各种政治障碍，——而在普魯士則将首先进攻三級选举制<sup>22</sup>。其次，它将促进东欧极为复杂的民族問題的解决。”

我在1904年2月就是这样写的。1905年10月，俄国的革命成为现实，而无产阶级則是这次革命的先鋒战士，并且这次革命立即对邻近各国发生了影响。在奥地利，爭取普选权的斗争以不可遏制的力量爆发起来，并且迅即以胜利宣告結束。匈牙利瀕临真正起义的边緣，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意举行总罢工，并且以自己的全部力量，特别是在普魯士，投入了爭取选举权的斗争。这个斗争在1908年1月导致了柏林自1848年以来从未见过的大規模街头示威。而1907年則曾經发生过轰动一时的霍屯督选举<sup>23</sup>，暴露了德国民主制度的完全破产。如果說，除此而

外我还曾經預料东欧民族运动的全面展开，那末由于整个东方、中国、印度、埃及、摩洛哥、波斯和土耳其的迅速觉醒，我的預料是被大大地超过了，特别是在波斯和土耳其两个国家，甚至发生了胜利的革命起义。

从这里我們可以看出国际矛盾的不断尖銳化。这些矛盾首先是由于摩洛哥，其次是由于土耳其<sup>24</sup>，已經加倍紧迫地使欧洲面临战争的威胁。

如果說有过什么“对未来的預言”（如果願意用这种提法的话）曾經实现，那末这就是关于那个引起了政治觉悟提高及一切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銳化的俄国革命到来的預言。

当然，我也并不否认，我没有預言俄国革命的暂时失败。但是，难道能够說，那个在1846年預言了1848年革命到来的人，因为这个革命在1849年被镇压下去就算是錯了嗎？

不消說，对于任何一个大規模的运动和起义，我們都必須估計到失败的可能性。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斗争，只有傻瓜才会确信自己已經穩操胜算。我們所能够研究的問題，只是我們是否将迎接大規模革命战斗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确切地判明的。至于說到这个战斗的結局，我們不能做出任何預言。但是，如果我們預先便确信失败的不可避免，而不考虑胜利的可能，那末我們便将扮演一个可耻的角色，甚至将成为我們事业的直接背叛者，而不能适应任何斗争。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希望都能实现。那些自封为言无不中的預言家，或者是那些要求別人做出毫无錯誤的預言的人，想必是在假定人具有超自然的力量。

每一个政治家都必須估計到他的預言可能落空。虽然如此，“預言”仍然不是一种无謂的游戏。只要慎重地、周密地对待它，——它仍然是每一个深思熟虑的和有远見的政治家所必要

的。倍倍尔便曾指出过这一点。

只有沒有头脑的保守派才会当真地相信一切将按老样子存在下去。既是思想家又是政治活动家的人，在每一次发生新的事件的时候，都要估量这一事件所包含的一切可能性，并且周密考虑这些可能性的最深远的后果。的确，社会中的习惯势力还是极其强大的。因此，那些不考虑新的形势和可能性而继续走自己老路的保守派，倒十之八九被人认为是正确的。但是，足以克服习惯势力的巨大事变总有一天要爆发，因为习惯势力虽然表面上依然如旧，却早已为一切业已发生的东西从内部破坏了。那时候，发展将突然采取使一切保守派为之惊慌失措、而只有那些对新的可能性及其后果心中有数政治家才能镇定如恒的新道路。

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在事情的通常发展的情况下，沒有头脑的保守派会比考虑未来并“预言”未来的政治家略胜一筹。只有当政治家把他思考过其后果的可能性当做现实，并据以指导自己的日常实际活动的时候，上述情况才是可能的。但是未必有誰敢于断言，恩格斯、倍倍尔或这里涉及的其他某个“善做预言的”政治家，曾经认为自己的预言具有这样的妙用。

沒有头脑的保守派任何时候都感觉不到有研究现实的必要。因为在这种人看来，现实不过是他们过去与之打过交道的那些熟悉的情况的简单重复。相反地，那些习惯于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考虑它的一切可能性和后果的人，则只有靠研究当前的力量对比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些人所首先关切的是新生的、还很少被人研究的因素。

被某些庸人视为异想天开的胡思乱想的东西，实际上是慎重研究现实的结果，因而总是同深刻认识现实分不开的。如果恩格斯和倍倍尔表现出是一些脱离生活的幻想家，那末攻击他

們的“預言”是可以的。但是實際上，任何人都不能像這兩位“預言家”那樣，在每一次發生困難的關頭，給予無產階級以如此中肯和如此正確的忠告。他們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正是因為他們善於“預言”。截至現在為止，經常使新興階級走上錯誤道路的，不是那些一貫高瞻遠矚的政治家，而是那些除了自己的鼻子以外再看不見任何東西的眼光短淺的“現實主義政治家”。這些人認為，只有他們的鼻子碰到過的東西才是現實的；他們把一切曾經一度碰得他們鼻破血流的阻礙，都宣稱為複雜的和不可克服的。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與上述“預言”不同的“預言”。任何社會的發展，歸根結底都決定於它的生產方式的發展。現在，我們對於生產方式發展的規律已經非常熟悉，足以相當有把握地判斷社會必然發展的趨向，並據以做出有關政治發展必然進程的結論。

人們常常把這種“預言”，同我們前面說過的那種根本有別於這種“預言”的東西混為一談。其實，其中一者談的是某一特殊事件或某一特殊形勢所包含的各種各樣的可能性，而這些可能性的各種可能的後果是我們應該加以研究的。另一者則談的是我們也力求判明的那種唯一可能的必然發展趨向。在前一種情況下，我們涉及的是確定的、具體的事實；而在後一種情況下，我們只能知道一般的趨向，對於這種趨向將要採取的形式則是一無所知的。甚至在兩者所得出的結論初看起來似乎相同的時候，也不應當把兩種判斷混淆起來。

例如，如果某一個人說，法國和德國之間的戰爭將導致革命，而另一個人說，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矛盾的進一步尖銳化將導致革命，那末後一個論斷也和前者一樣是對革命的預言，並且二者的意義也都是同樣的。當我說到法德之間的戰爭的時候，

这个战争并不是像自然规律那样可以确切预言其到来的事件。科学还没有达到这一步。战争——这只是可能实现的无数可能性中的一个。但是另一方面，可能从战争引发的革命则是同一一定的形式联系着的。很可能，交战国中较弱的一国为了对付外敌而要求动员全民力量的愿望，会使最无情、最坚决的阶级——无产阶级，成为这一国家的领袖。恩格斯便曾经认为这种情况在1891年的德国可能出现，如果德国除了同当时在人口数量上还不甚落后的法国交战以外，还同时跟尚未为革命所战胜和震撼的俄国交战的话。

当军队已经被击溃并且对战争和战争所造成的穷困感到厌倦，当政府已经被推翻，并且不是为了继续坚持战争，而是为了结束无目的的、毁灭性的战争，为了和同样丧失斗志的敌方缔结和平，那末作为战争的结果，也可能从人民群众的起义演变为革命。

最后，作为战争的结果的革命，也可能由于人民对签订可耻的不利和约的普遍愤怒而爆发起来，因为这种愤怒将使人民和军队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政府。

对于这里所说的这种情况说来，革命的一定的形式是大家早就知道的。但是，如果把革命作为阶级矛盾日益加紧尖锐化的结果来看，那末它的情况就变得绝对不清楚了。我可以完全肯定地说，战争带来的革命不是在战时爆发，就是在战争刚刚结束时爆发。但是当我谈到作为阶级矛盾日益加紧尖锐化的结果的革命的时候，我就决不能像上面那样指出革命到来的时机。在谈到作为战争结果的革命的时候，我可以完全肯定地断言，它是一次毕其功于一役的行动。但是在谈到阶级矛盾日益加紧尖锐化所产生的革命的时候，关于这一点我就一无可谈。它可能演变为曠日持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战争结果的革命只



能起插曲的作用。关于作为战争结果的革命，不能事先确切地肯定它是否将获得成功。相反地，由阶级矛盾尖锐化而来的革命运动，则只能遭到暂时的失败，而最后终将取得胜利。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前一种革命的必要前提条件——战争，正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可能到来，也可能不到来。关于这一点，任何人都不敢武断。相反地，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决定的。因此，如果说作为战争结果的革命只是许多可能性中的一个，那末作为阶级斗争结果的革命则是不可避免的。

从而，这两种“预言”都要求有自己的独特的方法、独特的研究；在那些对这种研究一窍不通的人们看来似乎是无聊幻想的“预言”，它的价值也就决定于这种研究的深度。

但是，如果以为只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才进行“预言”，那就大错特错了。甚至那些只顾眼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也少不得要瞻顾一下遥远的未来。例如，殖民政策的全部力量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如果问题仅仅在于今天所推行的殖民政策，那末这种政策会是极容易抛弃的。除了英国以外，殖民政策对于一切国家来说都是一项油水不大的事业。然而，它却是使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对未来怀抱巨大的（尽管是虚幻的）希望的唯一领域。不是悲惨的现实，而正是对我们的殖民政策狂信者所预言的那种光辉未来的指望，足以说明殖民政策对一切不相信社会主义到来的人具有吸引力的原因。有人认为：在政治方面只有眼前利益是起决定作用的；遥远的理想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我们的竞选宣传中，我们越是“实际些”，也就是说，我们越是头脑冷静和谨小慎微，我们越是仅限于谈谈赋税和关税、警察的刁难、医院的出纳等等，我们越是把我们的伟大目标当作早已消逝的青春之恋，与其公开讲说，无宁在内心深处时时回味，那末我

們獲得重大勝利的機會也就越有保證。再沒有比這種看法更錯誤的了。

### 三 長入未來的國家

在政治方面沒有預言是不行的。那些說什麼一切仍將長期照老樣子存在下去的人，並沒有想到他們自己也是在做着預言。

當然，滿足於現狀並且不想根本改變現狀的無產階級政治家是沒有的。任何一個聰明的政治家，不管他屬於哪一派，只要他肯於稍微拋棄成見，那末他就一定會認為這樣一種假設是荒謬的，即社會的經濟改造雖然今後仍將像現在一樣以飛快的速度繼續下去，但政治狀況卻將在長時期內保持不變。

儘管如此，如果一個政治家根本不想理解政治革命，也就是說，根本不想理解國內力量對比的決定性的改變，那末他就必然要去尋找那種不通過偉大決戰，而只是緩慢地、不知不覺地消除階級矛盾的形式。

自由派幻想不消滅剝削，而只通過各個階級對其他階級的某種自制，通過自願放棄所謂“過火行為”與“過高要求”，就可以建立階級之間、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社会和平。也有人認為，單個的工人和單個的資本家之間的矛盾，通過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有組織的對立，是可以克服的。按照這種人的意見，集體合同應該能夠為社会和平奠定基礎。實際上，組織只能加深矛盾的暴露。兩軍對戰要比過去單個人之間的衝突更為激烈、更為殘酷，而且對社会的震蕩也遠為強烈。對立利益之間的矛盾本身，將通過組織更加鮮明地表現出來，並且使人更加清楚地感覺到這不是個別個人之間的矛盾，而是整個階級之間的不可避免的矛盾。

社会主义者不能同意阶级协调和社会和平的幻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者，正是因为他不同意这种幻想。社会主义者懂得，不是异想天开的阶级协调，而是只有通过消灭阶级，才能在社会中建立和平。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主义者失掉了对革命的信心，那末他就只能盼望通过经济的发展，通过把其他阶级逐步吸入自身的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壮大，来和平地、不知不觉地消灭阶级。

这也就是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

这个理论包含着极其现实的内核。这个理论所依据的事实将为现实的发展所证实，同时证明着我们正在实际上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便曾描述过这个过程，并且论证了它的合规律性。

我们同时通过两条道路长入社会主义。一条是通过资本的积聚而实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大资本对小资本的优越性，竞争将使大资本威胁小资本、压迫小资本，并最终完全排挤小资本。不用说贪得无厌的发财欲望，仅仅这一点便足以使每个资本家极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和扩大自己的企业。企业的规模正在越来越扩大，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并入少数人手中。现在，银行和企业主联盟已经掌握了各个不同国家的大部分资本主义企业，并且把它们组织起来。因此，生产的社会组织正在日益完备。

随着企业的集中，大资本也正在日益增长，而股份公司的形式丝毫不能遏止这种增长。相反地，股份公司现在不仅保证着少数银行和企业主联盟对生产的统治，而且是使小额和极小额资金变为资本、从而使之处于资本主义控制之下的手段。

借助于股份公司，普通人的积蓄也为资本家所支配。资本家把这些积蓄作为自己的资本来利用，从而更加加强了属于资

本家的大资产的集中力。

由于股份公司制度,作为个人的资本家本身,对于资本主义企业說来已經成为完全不必要的了。从經濟生活中消除资本家的活动,已經不再是經濟上是否可能或是否合理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实力问题了。

但是,资本的积聚为社会主义做好准备这一事实,不过是长入未来国家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工人阶级也在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随着资本的增长,社会中无产者的人数正在日益增加。无产者正在成为社会的人数最多的阶级。同时,无产阶级的组织也在日益发展。工人正在创办合作社来消除商业中介,组织满足自己消费的生产;建立工会来限制企业主的专横独断,加强自己对生产过程的影响;向公社自治机关和议会选送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在自治机关和议会中争取实行各种改革,争取通过保护劳动的立法把国营企业和公社企业变为模范企业,并不断增加这种企业的数目。

这个运动正在一往直前地发展着。用我们的改良主义者的話來說,我們已經处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甚至,按照某些人的意見,我們已經进入了社会主义。需要的只是在現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不需要任何大变革,因为这只能妨碍长入社会主义;因此,我們要放棄一切有关大变革的思想,要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放到“有积极意义的”工作上去。

这种前景当然是极其诱人的,只有具有真正恶魔性格的人才会拥护那种将要破坏如此美妙的“渐进的改良主义高涨”的大变革。假如願望会是我們的思想的基础,那末我們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为这种长入的理論同声欢呼鼓舞。

但是,在这个理論中有一个小小的錯誤,这就是这个理論所談的发展,不是单一因素的发展,而是两个根本对立的因素——

資本和劳动——的发展。被“改良主义者”看成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只是两个势不两立的对抗阶级力量的发展，这就是說，劳动和資本的矛盾原来只是国内一小部分人之間的矛盾，現在已經发展成为决定整个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趋向的两大集团之間的斗争。由此可见，长入社会主义不外就是长入那个将动摇国家一切基础的偉大战斗，这个战斗将不可避免地日益激化，并且只能以推翻和剝夺資本家阶级告終。无产阶级是社会所必不可缺少的；它可能遭受暫时的失敗，但是它永远不会被消灭。相反地，資本家阶级則已經成为多余的阶级；它在争取保持国家政权的斗争中所遭受的第一次失敗，便足以使它走向完全彻底的灭亡。只有看不见劳动和資本之間的矛盾这个我們社会的基本因素的瞎子，才不願意承认我們必然长入社会主义这个結論。长入社会主义，这只是阶级矛盾不断尖銳化和长入偉大阶级决战（我們完全有理由把这些决战称为社会革命）时代的另一种說法。

当然，修正主义者不願意承认这一点，但是他們从来不曾提出过任何反对这种观点的有力論据。他們用来进行反駁的事实，即使是重要的和有說服力的，也并不能证明“长入”社会主义，而只是证明社会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例如，关于資本不是在集中而是在分散的說法就是如此。这种邏輯矛盾根源于修正主义的实质本身；如果它想证明长入社会主义，它就必須承认馬克思主义关于資本主义的理論；而如果它要使人相信，社会将沿着和平道路繼續发展和阶级矛盾将日趋緩和，那末它又必須放棄馬克思主义关于資本主义的理論。

但是，修正主义者以及在看法上同他們接近的人仍然开始觉察到，和平长入未来国家的思想并不是无隙可击的。

諾曼<sup>25</sup>最初发表在1908年10月号《Neue Rundschau》（《新观察》）上、后来又发表在《Hife》（《援助》）上的《馬克思主义的命

运》一文，是这方面值得注意的一篇文章。这位“国家社会党”的前领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做了十分混乱的论述。他认为，资本的积聚和企业主联盟的建立是我们社会主义者所没有预料到的；这些情况使我们陷于张皇失措的境地。另一方面他又硬说，工会运动的修正主义活动家，同马克思主义者相反，首先强调了保护劳动的立法和工人工会组织的意义。这个可怜虫没有想到，正是马克思是欧洲大陆上第一个宣传这两条原理的人；马克思在其他社会主义者以前很久就承认这两条原理的重要性，以及企业主联盟的意义。

但是，我们对于这些先生们在这类问题上的无知已经司空见惯了，因此甚至无须加以理会。相反地，值得注意的是，诺曼发现了资本集中的优势；在他看来，经济的发展不是导向社会主义，而是导向“拥有空前强大经济手段的新封建主义”。诺曼说，在企业主联盟面前，合作社和工会都是站不住脚的。

“在最近期内，工业的领导权将掌握到同银行合作的辛迪加手里。依靠辛迪加而加强起来的老爷们，在失业和饥饿的苦难时代还没有激起只知盲目破坏而不能进行建设的群众仇恨以前，是任何社会革命都不能彻底消灭的。社会革命的思想实质上已经寿终正寝。这种情况对于所有旧式的社会主义者说来，同样地也对于我们这些希望工人能够迅速获得成功的社会思想家说来，是极其沉痛的；但是自我欺骗并不能帮助我们，——最近的将来是属于企业主联盟的。”

这同长入社会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尤其同和平长入毫无相似之处。除了破坏一切的“群众仇恨”即革命以外，诺曼本人也不能提出推翻新封建主义的其他办法。在这里，诺曼突然完成了一个逻辑的飞跃。他先是承认，只有革命才能彻底消灭企业主联盟。然后又拒绝有关这种革命的思想，硬说革命应该是“盲

目破坏一切而不能进行建設”的饥饿暴动。为什么事情正应该就是这样呢？为什么事先就假定革命将是徒劳无益的呢？这仍然是諾曼的秘密。

但是，他在毫无根据地一笔抹杀了革命思想以后，并没有陷于完全絕望的境地，而是精神抖擞，充满了乐观主义。他发现，企业主联盟只是对于那些承认經濟必然性而否认自由意志的社会主义者說来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我们承认这个意志，那末我们就能够对付企业主联盟，而“新封建主义”的“空前强大的手段”也将失去不可战胜的力量。

群众的憤怒所不能完成的东西，通过承认个人的自由意志就可以实现，也就是說通过“个人”就可以达到。这个办法也算得是“实际的”、“现实的政策”哩！

諾曼告訴我們：

“馬克思不重視訴諸自由意志，因为他把一切都看作是事件的自然必然性。至少他的理論是这样說的。誠然，就他的为人說来，他是一个具有巨大意志力量的人物，他善于鼓舞別人的斗志。現在，在有头脑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間，有些人正在从自然科学學說回到关于意志的學說，亦即回到作为一切自由主义运动的基础的學說。爱德华·伯恩斯坦比其他人更加明确地主張应当重新拜倒在康德<sup>26</sup>的足下。甚至在接近于社会民主党的无政府主义或半无政府主义运动中，也有人拋棄对經濟生活中盲目起作用的宿命的信仰，而确信人的意志可以决定事物的面貌。回到‘意志說’，这是工业的新的統治已經巩固的結果。事情越来越明显，工业的这种統治不会自行倒台，而只有通过意志活动才能爭取到它的让步。”

那些直到現在才明白了这一点的人們，都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信徒。我們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启示。对于

修正主义者以及他們的无政府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旁枝說来，这的确是个巨大的发现。他們这些善于从任何花朵吸取蜜汁的蜜蜂，也像他們的自由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和半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同行一样，把这个发现看作是对馬克思的观点的駁斥。他們一致譴責馬克思，說他只承认“盲目起作用的”、“自动的”經濟发展，而根本抹杀人的意志。按照他們的意見，发揚人的意志是我們的主要任务。

不仅諾曼这样說，而且弗利德堡也这样說；不仅社会民主党內那些像钟摆一样搖摆于諾曼和弗利德堡之間的分⊙子如艾斯涅尔和摩連布萊赫尔之流这样說，而且那些修正主义的理論家如杜岡-巴拉諾夫斯基<sup>27</sup>之流也这样說：

“《資本論》的作者夸大历史过程的自发方面的意义，而不理解活生生的个人在这个过程中的全部巨大的創造作用。”

这一切都证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論有一个巨大的缺口，这个缺口必須用个人的巨大創造作用和个人的自由意志来加以添补。但是，这个應該补充长入社会主义理論的自由意志，实际上不外就是长入理論的寿終正寢。如果諾曼所說的意志是自由的、它能够“决定事物的面貌”这些話是正确的，那末意志也就應該能够“决定”經濟发展的趋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們也就无法确切地肯定，我們是否有必然长入社会主义的保证。那时候，人們就根本不能認識社会将沿着什么方向发展，也不可能有任何对于社会的科学認識。

#### 四 經濟发展和意志

修正主义者也許要反駁上述意見說，在馬克思本人身上表現出一个更大的矛盾：他作为一个思想家，不承认自由意志，而



完全信賴作为自动过程的必然經濟发展；但是他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又总是表现出最高度的意志，并且寄托希望于无产阶级的积极性。

修正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異口同声地正告我們，卡尔·馬克思在这里有着理論和实践之間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实际上，在馬克思那里是找不到这样的矛盾的。这不过是他的批評家們的头脑混乱、他們的无法摆脱的不可救药的昏聩的結果。所以說他們昏聩，首先是因为他們把意志和自由意志混为一談。馬克思从来沒有否认意志的重要性和“个人”对社会的“巨大作用”。他否认的只是完全不相干的什么自由意志。关于这一点人們过去已經談論得够多了，用不着再在这里多費唇舌。

此外，这种昏聩还基由于对經濟和經濟发展的一种别开生面的观点。这些学者先生們认为，既然經濟发展受一定規律的支配，那末它就是能动的个人无从插手的自动的、独立的过程。因此，他們硬說，人的意志作为与經濟并列并且超越經濟之上的一个特別的因素，可以补充經濟之不足，并且有助于“决定”为經濟所制約的現象的“面貌”。只有那些完全用經院哲学的态度来看待經濟的人，只有那些光靠书本汲取知識并且极其抽象地玩弄这些知識、而对现实經濟过程一窍不通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看法。无产者至少在这方面要比这班先生們胜强多多。因此，同摩連布莱赫尔和艾斯涅尔相反，无产者要比資產阶级理論家或者資產阶级实践家更善于理解当前的过程及其历史作用，因为資產阶级理論家对經濟实践一窍不通，而資產阶级实践家則根本沒有任何理論兴趣，他們在順利榨取利潤所必要的范围以外，根本不感到認識經濟的任何需要。

坚持人的意志是任何经济过程的动力这种看法的人，把一切经济理论都看作是空洞的概念游戏。当然，这里说的不是自由意志，不是愿望自身，而是一定的愿望。归根结底，同具有活动和认识能力的生命一起产生的生活意志，是整个经济的基础。意志的任何表现形式，归根结底都不外是生活意志。

生物的生活意志在每一具体情况下所采取的不同形式，取决于生物的生存条件；而“条件”这个概念，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不仅包含着保存生命的手段，而且也包含着生活道路上所遭遇的危险和障碍。生活条件决定着愿望的性质、活动的形式和活动的成功与否。这个原理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不消说，可以这样来加以解释的关系，只有在最简单的生物那里才是单纯的；在已经达到更高发展阶段的生物那里，在简单的生活意志和意志的各种表现形式之间存在着许多中间环节。

详细论述这个问题不是我的任务。但是我还是愿意就这个问题略谈一二。

生物的生活条件有两种：一种是在许多世代的生活过程中经常重复和一直不变的。适应这些条件的合理的意向，在这种情况下逐渐成为遗传的习性，并且通过自然选择而加强起来；这种意向变为本能、即变为不可克服的倾向性；终于，个体在一切环境条件下，甚至在服从这种本能不仅无助于生存、不能保存生命、而且有害于生命、甚至可能导致死亡的异常条件下，也不能不服从这种本能。生活意志始终是这种意向的始因。

除了经常重复的生活条件以外，还有一种只是偶尔地或极不经常地出现的生活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本能不再起作用，而生命的保存基本上取决于生物的认识能力，亦即取决于生物能不能认识业已形成的形势并且使自己的习性适应于这种形势。某个动物种在迅速变化的生活条件中生活得越久，它的智力也

就发展得越快。这一方面是由于思维向器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是由于智力较不发达的个体都很快地灭亡。

最后，人的智能则已经发展到能够创造人工器官即武器和工具的程度。这样，他就能够在一定的生活条件下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生存。但是因此他也同时为自己创造了他必须适应的新的生活条件，以致作为智力高度发达结果的技术的发展，反过来又成为促进智力进一步发展的刺激物。

技术的发展也是生活意志的结果，但是它却使生活意志发生很大的改变。动物只是希望按照老样子生活下去，此外再无更大的要求。新的工具或武器的发明，使人能够比过去生活得更好，有更丰裕的食物、更多的余暇和更大的安全，最后，也使人能够满足过去所没有过的新需要。随着技术的发展，生活意志越来越变为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意志。

这种意志是文明人的特点。

但是技术不仅改变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是社会的动物。他的生活条件不容许他孤立地生活，而要求他联合为社会。生活意志在这里采取了同其他社会成员一起生活并为了他们而生活的意志形式。技术的发展，首先借助于它提供给人的体外器官，不仅改变了一般的生活条件，而且也改变了社会中集体的、共同的生活和活动的条件。自然的武器和自然的工具——爪、牙和角等等，是属于同一个种的同一年龄和同一性别的一切个体所同样具有的。相反地，人工的武器和人工的工具则可能只掌握在个别人手里，而其余一切人都得不到它们。那些独占这些武器和工具的人，较之被剥夺了这些东西的人，是生活在另一种不同的条件中。这就形成了不同的阶级，而每一个阶级的生活意志也就具有了不同的形式。

例如，如果資本家得不到利潤，那末他就不能生存在他所生活的那些條件中。生活意志喚起他獲取利潤，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意志則喚起他追求更大利潤。僅僅這一點便足以迫使他增加自己的資本。迫使資本家不斷增加資本，否則便使資本家有滅亡危險的自由競爭，也是在這方面起作用的，而且是以更大的力量起作用的。資本的積聚不是同當事者的意志和意識無關的自動過程。沒有資本家追求發財致富和戰勝自己較弱對手的強烈意志，就根本不會有資本的積聚。只有作為這種願望和意向的結果而出現的社會主義生產條件，才是不以資本家的意志和意識為轉移的，因為資本家決不希望出現這種結果。但是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經濟過程排斥人的意志和“具有創造性的個人的巨大作用”。

推動資本家的那種生活意志，在工人身上也同樣表現出來。但是由於生活條件的不同，這種生活意志在他們身上採取了不同的形式。工人追求的不是利潤，而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爭取較高的勞動力價格和較低的食物價格。因此，他們要求組織合作社和工會，要求保護勞動的法律；結果就在資本競爭的趨向之外，產生出人們稱之為長入社會主義的另一種趨向。但是，甚至在這里，這種情況也並不意味着人們通常稱之為“長入”的那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實現的不自覺的過程。

最後，在談到社會過程的時候，必須注意生活意志的另一個特點。在一定的條件下，個體或社會的生活意志只有通過克服其他個體的生活意志才能表現出來。猛獸只有消滅其他野獸才能生活。它的生活意志也往往要求它排斥與它同一種類的那些爭搶它的獵獲物或減少它應得的食物個體。這種排斥所要求的不是消滅競爭者，而是通過肌肉或神經的優勢力量迫使它們的意志服從於自己。

人与人之间也往往发生这样的冲突，但主要地不是在个人之间，而是在整个集体与集体之间。其原因则在于争夺生存资料：从争夺狩猎区和捕渔区起，直至争夺市场和殖民地止。这种冲突通常或者以一方的被消灭告终，或者（这是较多的一种情况）以一方的意志被摧毁或被压服告终。但后者总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除此而外，人还经常为了保持长期的剥削关系而压制别人的意志。

阶级矛盾是意志倾向的矛盾。资本家的生活意志，总是同那些唤起他们摧毁和压制工人意志的条件发生冲突。没有这种对工人意志的压制，就不会有任何资本主义利润，资本家也不可能存在。而工人的生活意志也唤起他们反抗资本家的意志。由此就产生了阶级斗争。

总之，我们看到，意志是整个经济过程的动力。意志是经济过程的出发点；经济过程的任何表现都贯穿着意志。再没有把意志和经济看作是两个彼此无关的因素更荒谬的了。在这种看法后面，隐藏着把经济（亦即人及其彼此对抗的活动的社会合作形式）同经济活动的物质对象、即原料和工具混为一谈的拜物教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正像人利用原料和工具来按照自己的意思生产一定的物品一样，具有自由意志的“创造的个人”也可以利用经济来“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需要创造一定的社会条件。拜物教经济学家认为，既然工人可以站在工具和原料之外来控制它们和支配它们，那末人也就可以站在经济之外，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来控制它和支配它。他们根据原料和工具没有意志和意识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说，在经济中一切都是自动地发生的，是没有意志和意识参加的余地的。

再没有比这更可笑的错误了。

经济必然性并不等于听天由命。经济必然性来自人的生活

意志的必然性和人利用他們所处的生活条件的不可避免性。这也就是一定的意志傾向的必然性。

因此，再沒有比下面这样一种意見更錯誤的了：認識經濟必然性就等于削弱意志；需要利用將軍或其他意志坚强人物的傳記和有关意志自由的报告在工人身上喚起这种意志。仿佛只要向人們开导說，有个什么东西存在着，那末这个东西就立即开始存在着并且成为这些人的所有物。只要一个人相信意志自由，那末这个人也就有了意志，并且是自由的意志！就让大家来欣赏一下我們的教授和其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吧，看看他們經過康德的教育，經過崇拜意志坚强的霍亨索倫王室这种閱历，具有了何等丰富的不屈意志。

如果作为一切經濟必然性的基础的生活意志不是在工人身上表現得特別强而有力，如果必須用人為的方法在工人身上喚起这种意志，那末我們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无益的。

但是我們决不願意因此就說，人的意志是同人的意識无关的，是不决定于人的意識的。不消說，生活意志的力量不取决于我們的意識，但是意識却决定着这种意志在这一或那一情况下所采取的形式，决定着意志在这些形式中的每一种形式上所用的力量。我們确信，除了本能而外，意識也支配意志，而意志的形式則取决于意識对生活条件認識到何种程度。既然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的認識能力，所以他們的同样的生活意志也就可能对同样的生活条件发生不同的反应；正是这种差別造成了意志自由的假象，使人觉得个人願望的性质不取决于他的生活条件，而取决于他的意志。

不是关于意志自由的教訓性的奇談和思辯性的議論，而只有更深刻地揭示社会条件，才能按照无产階級的利益来影响无产階級的意志的形式和它用在每一种意志形式上的力量。

生活意志是这样一个事实，我們必須以这个事实为我們的出发点，并且必須把它看作是早就給我們規定了的。生活意志所可以采取的形式，以及它的表現的强度，都取决于各个个人、階級和民族等等对一定的生活条件的認識；凡是这种条件使两个階級产生出相互矛盾的意志的地方，这种条件就同时也是斗争的条件。

在这里，我們只來談一談斗争的条件。

作为斗争的願望的意志，决定于：

(1)吸引斗争双方的那个斗争的价值；(2)力量感；(3)实力。

斗争的酬报越高；意志也就越坚强，勇气也就越大，斗争者也就越是以更大的决心鼓起自己的全部力量来争取得到这个酬报。但是，这也只是在对夺取酬报所必需的力量和才能具有信心的时候才是如此。如果对自己的力量缺乏必要的信心，那末不管斗争的目的如何誘人，它仍然不会鼓舞意志，而只能引起一种想望，这种想望可能是极其强烈的，但决不会产生任何行动，而且在实践上也将是完全无益的。

力量感如果不是建立在对敌我双方力量的实际了解上，而只是建立在空洞的幻想上，那末它也同样是无益的。沒有力量感的力量是僵死的力量，它不会产生奋勇直前的意志。沒有实力的力量感，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可能导致奇襲敌人或震惊敌人以及摧毁或麻痹敌人意志的行动。但是沒有实力是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的。不是依靠实力，而只是依靠敌方对己方实力的錯誤估計而取得的胜利，迟早总要遭到彻底的破产，而且最初的胜利越是輝煌，士气的銷沉也越是来得严重。

如果把上面所說的話应用于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那末想引导无产階級参加共同斗争并且願意帮助无产階級取得胜利的

人究竟負有哪些任务,也就十分清楚了,而社会民主党应该对无产阶级发挥怎样的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加强无产阶级的力量,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当然,无产阶级的力量不是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思随意加强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一种状态下,都决定于社会的经济状况,是不能够随意加强的。但是现有力量的作用可以通过对这种力量的不合理消耗的反作用而加强。自然界中的不自觉的过程,如果从我们的目的的观点看来,就不外是一种力量的无限消耗。因为自然界没有它所追求的目的。人的自觉愿望不仅给人提出目的,而且也给人指出避免力量的多余浪费、而以最低限度的力量消耗来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

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可以这样说。当然,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不能离开这一斗争参加者的自觉。但是开始时,自觉的意志还只是涉及到这些斗争参加者的最切近的个人需要。最初,斗争参加者还不能理解从阶级斗争推演出来的社会改造。因此,阶级斗争,作为一个社会的过程,长期以来始终是个不自觉的过程,并且作为这种不自觉的过程,具有着一切不自觉的过程所固有的浪费力量的特点。只有认识了社会过程以及这一过程的趋向和目的,才能结束这种浪费现象,使无产阶级的力量积聚起来,集中在大规模的组织中。这些组织是为伟大的目的而联合起来的,它们有计划地使个人行动和为时机所决定的有组织行动,服从于确定的阶级利益,而阶级利益也是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事业服务的。

换句话说,理论是促进无产阶级的力量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的因素,因为它教导无产阶级合理地运用这些为经济发展所制约的力量,并且反对对这些力量的无目的的浪费。

而且,理论不仅仅增强无产阶级的实力,它还提高无产阶级



对自己的力量的自觉。而这也是同样必要的。

我們知道，意志不仅决定于自觉，而且还决定于习惯和本能。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中間不断重复的条件，产生习惯和本能。这些习惯和本能在产生它們的物质基础消失以后，仍然繼續起作用。在这个期間，以前靠力量的优势占居統治地位的階級可能早就衰弱下去，而以前軟弱并因而屈服于剝削階級的那个受統治階級剝削的階級，則可能变得强大起来。但是过去在这两个階級身上所形成的对自己力量的自觉，却在这种力量的考驗(例如，暴露統治階級軟弱性的战争)还没有到来以前，仍然长期地繼續起作用。但是一旦这种时候到来，被压迫階級便会突然地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并且可能发展到革命和出人意料的大变革。

同样地，无产阶级也长期地繼續保持着自己最初的軟弱感，相信資本是不可战胜的。

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产生的时期，无产者群众还是軟弱无力的，对社会說来他們还是一个寄生的、完全多余的成分。利用他們来为自己效劳的資本家，曾經是他們的“救主”、“养育者”，或者如当今流行的一种叫法(虽然也并不怎么更好听)：“雇主”。无产者的生活意志迫使他們出卖自己，除此而外，他們再找不到其他生活出路；正像他們看不到反抗資本家的可能性一样。但是情况开始逐漸发生变化。資本家出于怜悯而給与工作的那些討厭的穷人即无产者，变成为社会賴以生存的工人階級；相反地，单个的資本家則对于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日益成为多余的。股份公司和托拉斯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雇佣关系日益由經濟的必然性变为依靠国家政权支持的单纯力量对比关系。而无产阶级則变为国家中以及国家政权所依靠的軍隊中的人数最多的階級。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例如德国和英国，无产阶

級甚至在現時也几乎拥有夺取国家政权的足够的力量，而經濟条件則使无产階級能够利用国家政权来排除資本主义生产而代之以社会生产。

但是无产階級对自己的力量还缺乏足够的自觉。只是无产階級的个别阶层具有这种自觉，而就整个无产階級說来則缺少这种自觉。社会民主党正在千方百計提高无产階級的这种自觉。为了这个目的，它不仅从理論方面对群众进行教育，而且也利用其他办法。对于提高无产階級的階級自觉說来，实践在任何时候都比一切理論更有效果。社会民主党以自己在对敌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最清楚不过地向无产階級显示了自己的威力，从而也最有效地提高了无产階級的力量感。但是，社会民主党仍然把这些成就归功于理論的指导，因为理論可以使无产階級的有觉悟的、有組織的部分能够在任何时候都把自己所拥有的力量發揮到最大限度。

社会民主党的理論是使工会运动在盎格魯—撒克逊国家的国界之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力。

除了这些成就以外，議會竞选和議會斗争的胜利，也促进了无产階級的力量感和力量本身的显著增长。其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无产階級个别阶层取得了物质利益，而且也因为穷苦的、一直忍气吞声的、絕望的人民群众，看到了敢于起来同一切当权者作斗争并且一再取得胜利的新力量的出現，而且这个力量不是别的，正是最穷苦的人的組織本身。

这也就是五一节的庆祝、竞选期的斗争以及爭取选举权的斗争具有如此巨大意义的原因。这种斗争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給无产階級带来显著的物质利益；这种利益甚至往往不能同遭受的牺牲相比。尽管如此，当斗争以胜利結束的时候，这个胜利总是造成无产階級能动力量的巨大增长，因为胜利会大大地加

强无产阶级力量感，并从而加强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毅力和意志。

再没有比这种力量感的增长更使我们的敌人害怕的了。他们知道，巨人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以前是并不可怕的。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压抑无产阶级力量感；他们宁愿做物质上的让步，也不愿意使工人阶级得到足以提高他们的自觉的精神胜利。因此，他们在争取工厂的无限专断权即“当家作主”权方面，往往要比反对提高工资表现得更为顽强；因此，他们极端反对在五一节停止工作，并且当普遍平等选举权成为社会民主党向人民直接显示自己的不可遏止的胜利前进运动的手段的时候力图扼杀普遍平等选举权。他们所以这样做，并不是由于害怕社会民主党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在这方面，他们还可以安心地等待往后的不止一次的选举，——而是由于害怕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的不断胜利，会使无产阶级产生力量感，而使无产阶级的敌人产生如下的畏惧：无产阶级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国家政权手段将不再起作用，而国内的力量对比将完全改变。

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以便应付我们在最近将来的选举中所获得的巨大胜利将要引起的对现存议会选举制度的进攻。我决不是说，这个进攻会得到成功。无宁说，这个进攻所挑起的斗争，最后将使这个世界的强者遭到比我们的选举胜利更为沉重和更为危险的失败。

当然，我们的党不仅估计到胜利，而且也估计到失败。但是，只要我们善于克服地域的局限性和时间的局限性，而能从各国人民的运动的全局，从两代生活的长期间，来考察我们的运动，那末这些失败就不会使我们感到灰心丧气。那时候，即使有个别极其惨重的失败，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可遏止的蓬勃前进还是将变得极其明显，以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摧毁我们必胜的信心。

但是，我們越是联系着整个社会发展来看待我們的斗争，我們的一切努力的終极目的，——从一切阶级統治下解放工人阶级、从而也解放全人类，——就越是明显地摆在我們面前；无产阶级的生活意志所无时无刻地、不可避免地要求于我們的那些日常細小工作就越是可貴；爭取实现偉大終极目的的願望也将最大限度地加强无产阶级的意志，鼓舞革命的热情；而这种热情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意外事件所引起的輕举妄动，而是明确的認識的产物。

社会民主党截至現在为止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来影响无产阶级的意志，并且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以致毫无理由来改变自己的策略。

## 五 既非不惜任何代价的革命，也非 不惜任何代价的合法性

一方面，有人譴責我們馬克思主义者，說我們从政治中排除了意志，把意志变成了自动的过程。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批評家又提出与此完全相反的一种論調：說我們的願望超越了我們对現實的認識；說对現實的認識只應該使我們确信任何革命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我們却出于一种狂信，便死抓住革命的思想并陶醉于这种思想；說我們甚至在利用現存法律基础可以获得巨大成就的时候，也只是为了革命本身而不惜任何代价来追求政治革命。

例如，有人拿我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立起来，硬說他有个时候也曾經极富于革命情緒，但是在他逝世前不久改恶从善了，意識到甚至承认了自己革命观点的錯誤。

的确，1895年时恩格斯曾經在他給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

爭》一書所寫的《導言》中，指出革命鬥爭的條件已較 1848 年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他說，為了取得勝利，我們必須把“已經懂得應該怎麼辦”的廣大群眾帶領起來，說我們“革命者”、“顛覆者”採用合法手段，要比採用不合法手段或變革辦法，更能獲得遠為巨大的成就。但是不應忘記，恩格斯這裡只是說的當時的形勢。要想正確理解恩格斯的這些話，必須拿這些話同我不久前在《新時代》（第 27 卷第 1 期第 7 頁）上引用的那些恩格斯的信里所說的話加以比較。從這些信里可以看出，恩格斯堅決反對把他說成“一個不惜以任何代價來換取合法性的和平崇拜者”的企圖。關於這一點，我在《新時代》上曾經這樣寫道：

馬克思的《階級鬥爭》一書的《導言》註明寫於 1895 年 3 月 6 日<sup>28</sup>。這本書在幾個星期以後才問世。我曾請求恩格斯允許我在該書出版以前把這篇《導言》在《新時代》上加以刊載。

關於這個問題他在 3 月 25 日答复我說：

“我‘欣然同意’你在電報中提到的那件事情。另郵寄上該文校樣一份，標題為：《馬克思著〈1848—1850 年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該文的內容是《新萊茵報<sup>29</sup>評論》中的一些舊論文的重述。我的這篇文章由於那些害怕《反對陰謀推翻現存制度法案》的柏林朋友們的顧慮而存在着一些缺點，——在當前情勢下我總不能不考慮到這種顧慮。”

為了明白這一點，必須記起那個建議大大加強現存法律嚴厲性以便阻止社會主義宣傳的所謂《反對陰謀推翻現存制度法案》；這個法案於 1894 年 12 月 5 日提交德意志帝國議會，而於翌年 1 月 14 日交付小組委員會審議，審議時間長達三個多月之久（直到 4 月 25 日）。恩格斯正是在這個時候寫作他的《導言》的。

這封信的另一段話表明，恩格斯是多麼認真地估計了當時的形勢。他在那裡寫道：

“我认为，只要没有一个普遍反动的时期突然来临，选举改革在奥地利是完全有保证的。这个改革将使我们进入议会。显然，在柏林，只要全力以赴也可以争取到这一点。可惜，柏林人总是不了解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1月3日，即还在开始写作《导言》以前，恩格斯曾经给我写信说道：

“显然，你们面临着德国的一个沸腾的年份。只要馮·凱列尔<sup>30</sup>先生今后的作法不改变，那末冲突、解散议会、钦定宪法和政变就都是可能的。当然，极少数人会感到满意。容克们会完全满足于增加一些小恩小惠。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们将不得不乞灵某种个人的权力欲，并在某种程度上纵容这种权力欲。不过，反抗的因素将干扰这出丑剧，而偶然的事件，即出乎意外的和不可预料的情节，将出现在舞台上。为了保证自己得到小恩小惠，需要以冲突相威胁，但是当再前进一步时，当基本的目的即小恩小惠变为次要的目的，而王权起而反对议会时，那就需要加以压服或者摧毁了！于是闹剧就可能开始。我现在正在读哈尔丁涅尔的《查理一世的专制统治》。有时，一切都令人发笑地同目前德国的情况巧合。例如，关于议员在议会中的活动的不可侵犯性的论据。只要德国仍然像饒利梅尔所說的是一个‘nix Gewisses weiss man nit’\* 的拉丁语系国家，那末革命冲突便将是不可能的。”

修正主义者硬說，恩格斯曾经宣告无条件合法的和平发展时代已经到来并将永远保持下去，而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候恩格斯預见了这样严重的、孕育着冲突的形势。

---

\* 饒利梅尔是卡·邵列麦尔的带亲暱意味的綽号。恩格斯这里所引用的話是方言，意思是：“不可捉摸”。——編者

十分显然，恩格斯在对形势做这样的估计时，曾极力迴避一切可能被敌人利用来危害党的东西；他在有关革命事业的一切問題上都仍然是绝对坚定不移的，不过在表述上力求含蓄一些罢了。

《Vorwärts》（《前进报》）<sup>31</sup>显然为了对审議《反对阴谋推翻現存制度法案》的小組委员会发生良好的影响，只是发表了他的《导言》的某些片断。这些从全文中断章取义地摘出的片断給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仿佛恩格斯有着后来修正主义者所强加給他的那种想法。这使恩格斯非常恼火。他在4月1日的信里写道：

“我今天在《前进报》上看到了事先未通知我而刊出的我的《导言》的摘录，使我感到非常惊讶。原文被删节得如此厉害，竟使我成了一个不惜以任何代价换取合法性的和平崇拜者。因此我更希望《导言》能在《新时代》杂志上全文发表，以便抹去这个可耻的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要向李卜克内西以及其他任何曾經使李卜克内西有可能歪曲我的观点的人，非常明确地表明我的意見……”。

恩格斯没有想到，过了不多时候，甚至那些理应率先维护他的观点免遭歪曲的亲近友人，也得出了这样的結論，仿佛这个被歪曲了的观点确实是属于他的，而他认为是可耻的那个东西則是他一生中最輝煌的功績；仿佛这个革命战士以“一个不惜以任何代价换取合法性的和平崇拜者”終結了自己的道路。

如果这些摘录还不足以确定恩格斯对革命的观点，那末可以再援引他在1892年、即写作馬克思《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前几年曾經发表在《新时代》上的一篇文章：《德国的社会主

•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1953年俄文版第487頁。——編者

义》<sup>32</sup>。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资产阶级屡次要求我们永远放弃使用革命手段，并且停留在合法的圈子内，特别是在非常法已经废除，而对一切人、甚至对社会主义者(!)已经恢复了平等权利的现在。‘遗憾的是，我们不能满足资产者老爷们的这个要求，虽然目前我们的确没有陷于那些‘受法制摧残的’人们的境地。相反地，法制现在为我们工作得极好，以致我们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去破坏它，就将是一个傻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非常自然的，即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会不会破坏法律和权利，以使用暴力来摧毁我们？让我们等着瞧吧。而暂时，‘还是请资产者老爷们先放第一枪！’

毫无疑问，资产者们将会放第一枪。总有一天，德国资产者会不再耐烦束手观望淹没着一切的社会主义洪流；他们将采取非法手段，采取暴力行动。但这又有什么用呢？暴力可以扼杀流行于有限地区的小宗派，但是还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消灭遍及全国广大地区的二、三百万人的政党。反革命势力的暂时优势或许能够使社会主义的胜利延缓几年，但这只能使将来的胜利更加完全和更加彻底。”\*

这段引文，也和有关的信件一样，值得每一个想正确理解恩格斯《导言》中关于我们借助于法制可以获得很大成功的话的人加以注意。这些话丝毫没有表明他放弃了革命思想。

但是，不言而喻，这些话却表明他彻底摒弃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应该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做孤注的一掷，而这次革命应该按照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的形式重演。认为我在这里的观点同恩格斯的观点有矛盾的人是错了。实际上，我还在恩格斯的《导言》之前，便从另一种角度以另一种不同的形式发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6卷第2部第244—245页。——编者



揮了我們在恩格斯那里所看到的那同一个思想。

1893年12月，我在《新时代》第12卷上发表了《社会民主党的信条》一文。这篇文章詳尽地考察了革命的問題。那里写道：

“我們是革命者，而且不仅仅是蒸汽机的革命那种意义下的革命。我們所追求的社会变革，只有通过政治革命、通过战斗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能实现。而共和国，而且是最通常的意义下的共和国、即民主共和国，乃是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国家形式。

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但不是一个举行革命的政党。我們知道，我們的目的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达到；但是我們也同样知道，我們不能举行这个革命，正像我們的敌人不能阻止这个革命一样。因此我們根本沒有想到要举行或准备革命。既然我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举行革命，所以我們也就无从談起革命将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到来，以及革命将要采取什么形式实现。我們知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夺取到它借以創造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政权以前，是不会停止的。我們知道，这个阶级斗争将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激烈；无产阶级的人数以及它的精神力量和經濟力量将越来越增长；因此，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資本主义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只能模糊地預測这场社会战争的最后决战将在何时发生和怎样发生。在这一切中沒有任何新的东西……

既然我們对于这场社会战争的决战毫无所知，我們也就无从談起这场决战是不是流血的：是武力将在决战中起巨大的作用，还是只有借助于經濟的、立法的和道义的强制才能决定勝負？

但是有一切理由設想，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中，后一种手段将比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所用的实力即武力更为优越。

未来革命战斗之所以显然将更少取决于武力，其原因之一，正如已經一再指出的，是現時政府軍的装备較之‘公民’所拥有的武器具有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通常总是預先决定着公民的任何反抗的失敗。

但是，革命阶层現在却比18世紀时拥有更为优越的經濟的、政治的和道义的反抗武器。在这方面只有俄国是例外。

結社自由、出版自由和普遍选举权(而在一定条件下还有普遍兵役义务)，不仅仅是保证現代国家的无产階級优越于那些曾經参加資产階級革命战斗的階級的武器，而且还使各个政党和階級的力量对比，以及那些鼓舞各个政党和階級的思想，都能够清楚地暴露出来，而这是在专制主义时期所未曾有过的。

在专制主义时期，無論統治階級或革命階級都只能在暗中摸索。由于根本不容許表現反对立場，因而無論是政府或革命者都不了解自己的力量。双方中的每一方，当它还没有同对方較量力量以前，都有过高估計自己力量的危險；而在初次交鋒之后又都有过低估計自己力量以至終于放棄斗争的危險。显然，資产階級革命时期所以有一举把叛乱鎮压下去或一举把政府推翻的現象，其基本原因就在这里。显然，革命和反革命此起彼伏的現象，其原因也在这里。

現在，至少在那些有着某种程度的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情况已經完全不同了。人們把这种制度称为社会的安全活瓣。如果人們想借此說明，民主国家中的无产階級已不再是革命的；无产階級已滿足于有机会公开表达自己的憤怒和訴說自己的痛苦，因而放棄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那就錯了。民主不能消除資本主义社会的階級矛盾和防止这种矛盾的不可避免的結局——推翻这个社会。民主只能做到一点：不是防止革命，而是防止时机尚未成熟的、沒有希望的革命嘗試，使某些革命起义成为多余

的。民主使各个政党和阶级的力量对比清楚地暴露出来；它不是消除它们之间的矛盾和转移它们的终极目标，而是一方面阻止新兴阶级去着手解决那些他们还无力解决的任务，另一方面迫使统治阶级做出他们已无力拒绝的那些让步。这一切都不能改变发展的趋向，而只能使发展的进程更加顺畅、更加平稳。在有着稍许民主的制度的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前进运动的特点，既不是资产阶级在它的革命时期所获得的那种惊人的胜利，也不是它所遭受的那种惨重的失败。从现代的社会民主工人运动在60年代勃兴时起，欧洲的无产阶级就只遭受过一次大的失败——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当时，法国还苦于帝国所遗留下来的灾难，帝国没有给予人民以真正民主的制度，法国无产阶级只有不大一部分人觉悟起来，而法国无产阶级的起义是出于被迫的。

无产阶级的民主斗争方法看起来可能比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采取的方法较为枯燥；无疑地，这种方法不够轰轰烈烈和有声有色，但是它所要求的牺牲也远为微少。或许，这对于那些抱着欣赏体育竞技的趣味和为了搜集引人入胜的材料而唱社会主义高调的文人墨客说来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对于那些实地进行斗争的人们说来却不是无关紧要的\*。

只限于使用非军事手段如议会斗争、罢工、示威、报刊以及

\*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8世纪的革命，曾经一个胜利紧接着一个胜利，其戏剧性的效果一个比一个更使人目眩，仿佛人和物都蒙上了五色花火的光彩，日日夜夜都沉醉在一片狂欢里。但是这些胜利转瞬间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整个社会，当它还没有清醒地总结自己在暴风雨般冲击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以前，一直为狂欢后的晕眩所笼罩。相反地，无产阶级革命，即19世纪的革命，则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8卷第122—123页）。当然，1852年时马克思在拿资产阶级革命同无产阶级革命比较时，还没有能够把民主制度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估计在内。

諸如此类影响手段的所謂階級斗争的和平方法，越是在那些民主制度行之有效、人民的政治眼界和經濟眼界寬广、人民的意志坚定的国家里，它的前途也就越是广大。

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敌对双方中那个感觉自己优胜于对方的一方，将更能保持冷靜的头脑。相反地，那个不相信自己和自己的事业的一方，则将过于輕易地失去沉着和冷靜。

在現代的一切文明国家中，只有无产阶级是最相信自己和自己事业的階級。它完全不需要为此而沉溺于幻想；它只要研究前一代的历史就足以理解它是在不断地前进着，而只要研究現时的发展就足以确信自己的必然胜利。因此，不應該认为某一个国家已經达到較高发展的无产阶级，会輕易地失去沉着和冷靜而采取冒險主义的政策。工人階級的教养和眼光越高，这个国家越是民主，那末做这种估計也就越少根据。

但是对于統治階級却不能表示这种信心。他們感觉到并且看到自己是在日益削弱，他們变得越来越焦躁和神經過敏，因此逐漸失去把握自己行动的能力。他們的情緒越来越使人耽心他們的疯狂的发作。那时候，他們将在盲目狂怒的支配下猛扑敌人，消灭敌人，而不考虑这将給整个社会和本身带来的損害，也不关心将要造成的可怕破坏。

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使人可以設想，它将力求采取上述‘合法的’方法。破坏这种意願的危險，首先就在于統治階級的神經质。

統治階級的政治家照例总是希望这种疯狂的发作在社会民主党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进行抵抗以前尽早地发生，而且不仅仅希望統治階級如此，最好局外的群众也能如此。这是他們延緩（哪怕几年也好）社会民主党的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办法。的确，这是一种‘孤注一擲’的做法，因为如果資产階級不能把无产

階級鎮壓下去，它就将因为精疲力尽而提早倒台，而社会民主党的胜利将更快地实现。但是統治階級的政治家大都认为孤注一擲是他們的唯一出路。他們由于害怕革命而希望挑起內战。

相反地，社会民主党則沒有任何理由采取这种絕望的政策；无宁說它有一切理由尽可能延緩統治階級疯狂的发作，而如果这种发作已經成为不可避免，那就尽可能使它在无产阶级强大到足以战胜和制服疯狂敌人的时候发生，以便使这种发作成为最后一次的发作，使这种发作所造成的破坏和牺牲减少到最低限度。

因此，社会民主党应当避免甚至反对一切可能变成对統治階級的无謂挑衅的东西，反对一切可能被統治階級的政治家利用来煽动資產階級及其拥护者疯狂仇恨社会主义的东西。当我们說举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当我们认为力图掀起革命的做法是无益的甚至有害的，并且遵循这一方針来决定我們的行动的时候，这决不是为了討好德意志的檢察官，而是为了战斗的无产階級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同所有的兄弟党一致的。由于这个方針，統治階級的政治家直到現在还未能对付无产階級的斗争中达到他們所希望的结果。

尽管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影响还不够强大，但它在現代国家中已經成为一支資產階級政治家所必須正視的巨大力量。采取微不足道的行政手段已經不能使他們有任何收获；这种手段只能激怒它所損害的那些人，但并不能吓倒他們和削弱他們的斗争能力。实行旨在摧毀无产阶级斗争能力的决定性措施的任何企图，都有引起国内战争的危險；而国内战争，不管它的結局如何，必将招致惊人的破坏。每一个多少有点头脑的人現在都了解这一点。尽管資產階級政治家有一切理由希望社会民主党尽早受到它所力不胜任的实力考驗，資產階級生意人却压根

儿不愿去做那种可能使他們之中的任何一个人破产的冒险尝试，至少当他們还处于正常状态、还没有陷于疯狂的发作时是如此。而一旦陷于疯狂的发作，资产者当然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而且他們越是恐惧，他們也就越是絕望地嗜血。

現在，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它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坚决地避免一切可能无謂地挑起統治阶级采取实力政策的东西。社会民主党的行动就应当从这里着眼。

但是，現在有一个自称为无产阶级派或社会革命派的派别，它认为除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以外，挑起統治阶级的实力政策，是它的最主要的任务。統治阶级的政治家所幻想的那个唯一能够阻止无产阶级胜利前进的东西，成了这个受到普特卡麦尔<sup>33</sup>之流青睐的派别的代表們的主要目标。这个派别的信徒不是力求削弱资产阶级，而是力图激怒资产阶级。

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說过的，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敗，是无产阶级的最后一次重大的失敗。自那时以来，无产阶级利用上面提到的那种方法，在多数国家中获得了不断的进展。固然，这种进展要比我們希望的緩慢得多，但是却比以往任何一种革命运动更加充滿了信心。

1871年以后，无产阶级运动只有几次遭受过較大的失敗，而每一次失敗都是由于个别人物的插手造成的；这些人物所采取的手段，用現代的术语來說，可以叫做无政府主义的手段，这种手段符合于絕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以行动宣傳’的策略。在这里可以順便指出无政府主义者給‘国际’和1873年西班牙革命起义所带来的損害<sup>34</sup>。这次起义之后五年，被称为海德尔和諾毕灵謀杀事件的普遍疯狂发作爆发了；如果没有这些謀杀事件，俾斯麦未必能够强行通过反社会主义者的法令；这个法令也無論如何不会像它实行初期那样雷厉风行；德国无产阶

級將可以避免巨大的犧牲，而它的勝利前進也不致受到片刻的阻遏。

庫梅列爾和施泰里瑪赫爾之輩的欺詐和暴行，造成了1884年奧地利工人運動的又一次失敗<sup>35</sup>。奧地利的風起雲湧的社會主義運動，沒有任何抵抗地便被一舉擊潰，而且不是被政權擊潰，而是被居民的普遍憤怒擊潰，因為居民把這些無政府主義者的行動歸罪於社會主義。

另一次失敗發生在1886年的美國。當時，工人運動在那裡得到蓬勃的發展，其進展的迅猛，使某些觀察家認為它可能很快就超過並領導歐洲的工人運動。1886年春天，美國的工人階級決心加緊爭取八小時工作制。工人組織有了極大規模的發展。罷工一個接着一個，工人意氣風發，社會主義者也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樣總是熱情洋溢地走在前面，並且已把運動的領導權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是，就在一次警察與工人發生大規模衝突的時候，5月4日在芝加哥發生了投彈事件。直到現在還沒有查明這件事到底是誰干的。11月11日，因為這個案件而被處死刑的無政府主義者以及他們的被判處長期監禁的伙伴，成了法庭謀殺的犧牲者。但是這次舉動是與無政府主義者所長期鼓吹的策略相符合的。這次舉動激怒了美國的整個資產階級，造成了工人的思想混亂，敗壞了那些不善于而且往往也不願意同無政府主義者劃清界限的社會主義者的聲譽。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鬥爭以工人的失敗而告終，工人運動遭到了破壞，而社會民主黨的作用則降低到無足輕重的地步。現在，社會民主黨正在開始重新鞏固自己在美國的陣地。

近二十年來工人運動所受到的少數幾次重大打擊，都是無政府主義者本身的行動，或者無政府主義者極力宣揚的那個策

略所鼓舞的行动引起的。正是因为这种行动，德国的反社会主义者法令，奥地利的紧急状态，芝加哥的法庭谋杀，以及这种行动的其他一切后果，才成为可能的。

但是，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少有理由相信，无政府主义会在某个地方重新掌握群众。

群众轻信无政府主义有两个基本的原因，一是群众的眼界不够宽广，二是他们的绝望情绪：以为单靠政治斗争，甚至连微小的改良都是不可能得到的。

在80年代前半期，当奥地利和美国的工人群众为无政府主义的口号所迷惑的时候，两国的工人运动都有过极其蓬勃的发展，虽然几乎完全处于无领袖的状态。工人队伍完全是由未受训练的新兵组成的，既缺少经验，又没有军官。此外，工人群众还毫无理由地不相信通过政治斗争可以动摇资本的统治。那时，奥地利工人还没有选举权，并且根本没有希望通过合法途径在最近期内得到这种权利。美国的工人则不想用政治斗争手段来消灭政府的贪污腐化现象\*。并且不仅仅在这两国，而且在80年代初期的其他各国，都开始在工人运动中出现一种悲观情绪。

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普遍有所好转。

- 
- 在我们的美国兄弟党的机关报《前进报》的最近一期上，刊载了不久前从监狱获释的米海尔·施瓦布的一篇演说的摘要。他是1886年炸弹案的牺牲者之一。他承认无政府主义的策略是错误的和冒失的。他还解释了无政府主义所以能在80年代的芝加哥获得传播的原因：“必须尽量反复地说，只是当一个法官裁决可以为了对付共产主义者而伪造选举证以后，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策略才在芝加哥传播开来。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记得弗朗克·施陶贝尔先生再度当选国会议员的那次选举的情形。选举的结果是两位监选员最无耻地伪造出来的。这件事情已经在警察和其他证人的宣誓下证实了。可是在百般拖延举行的最后一次开庭的时候，却只根据被告的单方面的供词进行了裁决。法官还替伪造者辩护呢，工人普遍感到愤怒。他们对过去那老一套的方法再也听不进去了。后来，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明白过来，在政治上是不能单凭感情用事的。”



在奥地利还有一种情况促进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抬头：群众对社会民主党失去了信任。当德国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斗争手段——组织和报刊——已经成为反社会主义者法令的牺牲品的时候，当时刚刚登上舞台的无政府主义便趁机向奥地利工人大肆宣传，说什么被人利用来箝制言论的党，已经放下了武器，并且放弃了自己的革命原则。起来维护自己的德国同志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不但没有能够恢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大多数奥地利工人心目中的声誉，反而使自己的声望受到损害。带着轻蔑的口吻说社会民主党人不过是‘穿家庭长衫的革命家’的检察官拉梅燦伯爵，便曾经帮助过在他看来比较可亲的无政府主义者。

直到现在无政府主义者还在千方百计地企图向工人证明，社会民主党人是穿家庭长衫的革命家。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做到这一点。如果说在德国曾经有个时候有过产生相当大规模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可能，这也不是‘独立派’<sup>36</sup>进行鼓动的结果，而是统治阶级发动进攻的结果（因为这种进攻给工人群众造成了绝望感，并且阻碍了他们的觉悟的提高），或者是我们队伍中那种使人觉得仿佛我们已经放弃了革命原则的论调的结果。我们越是变得‘温和’，也就越会助长无政府主义者的声势，从而也越会促进那种把用最最激烈斗争方式代替文明斗争方式当作自己基本目标的运动。可以说，现在只有一种情况可能使无产阶级群众自愿放弃上述‘和平’斗争方法，这就是：对自己政党的革命性质失去信心。我们和平得过火，只能给和平的发展带来损害。

没有必要来详细说明，追求妥协的倾向一般说来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有产者的政权并不会因此而缓和它的敌对态度，而用这种办法也将得不到可靠的朋友。但是，这种做法却将给我们自己的队伍造成思想混乱，使消极者更加消极，而坚定者

离我們而去。

革命热情是我們取得成功的动力。今后，这种热情對我們說來將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因为最大的困难还摆在我們前面。还有待我們去克服。一切可能削弱这种力量的东西都将是不要不得的。

但是現時形势的危險，就在于輕易地承认我們比我們的实际情况更加‘温和’。我們越是变得强大，实践任务也就越是变得重要，我們就越是必須在产业无产阶级之外进行广泛的鼓动，我們就越是應該节制不必要的挑衅，特别是虛声的恫吓。在这中間，掌握必要的分寸是极其困难的：既要給現在以应有的地位，又要不忽略将来；既要考虑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又要不放棄无产阶级的观点；既要尽可能避免一切挑衅行动，又要使人們感觉到我們是对整个現存社会制度进行不調和斗争的战斗的党。”

这就是我在1893年写的那篇文章中所談到的一切。在这里我們再一次发现了一个后来實現了的預言。我在1893年所耽心的那个东西，过了几年就发生了。我們的同志在法国一时成了执政党。这在群众中造成了一种印象，仿佛社会民主党已經放棄了自己的革命原則。他們失去了对党的信任，因此有不少人为无政府主义的最新变种即工团主义所迷惑。工团主义也和鼓吹实际行动的旧无政府主义一样，与其說力求加强无产阶级，无宁說只是徒劳无益地恫吓资产阶级，激怒资产阶级，不合时宜地挑起在当时条件下无产阶级尚难于胜任的实力較量。

在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当中，正是那些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最坚决地反对这种做法。他們像反对內閣主义一样坚决地反对工团主义，认为两者是同样有害的。

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直到今天仍然坚持恩格斯和我在上

面所援引的那些写作于 1892—1895 年间的文章中所发挥的观点。

我既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合法性的拥护者，同样也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革命者。我们知道，历史形势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任意创造，我们的策略必须以历史形势为依据。

我在 90 年代初曾经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无产阶级组织和无产阶级斗争在现存国家制度基础上的进一步稳步发展，将最能把无产阶级事业大大推向前进。因此，人们不能责备我过分热中于革命和过激主义，即使我基于对当前形势的研究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从 90 年代初起，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为国家制度和国家政权而斗争的时期；这个斗争可能在有时胜利有时失败中延续几十年，斗争的形式和延续时间暂时还无法确定；但是这个斗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大大加强无产阶级，甚至使无产阶级在西欧建立起自己的专政。

我在下面将简单地叙述一下我的这种观点的根据。

## 六 革命因素的增长

我们已经看见，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说来并不像人们所喜欢形容的那样是一些蹩脚的预言家。虽然如此，他们之中仍有一些人过去总是在一个问题上犯错误：这就是确定伟大革命搏斗和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重大政治变革到来的时机。

是什么原因使我们能够设想，那个盼望已久的时机现在终于日益临近，政治停滞的僵局将被打破，充满斗争欢悦的生活将重新开始，沿着夺取政权的道路胜利挺进的进军将要开始呢？

恩格斯在上面提到的那篇马克思《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

已經正确地指出：在我們时代的条件下，只有已經懂得自己應該怎么办的广大人民群众，才能贏得偉大革命战斗的胜利。靠一小撮人出其不意的果斷行动就能推翻国家政权并以另一种政权来取而代之的时代已經过去了。

这种事情只有在中央集权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因为在这种国家中政治生活都集中于支配全国的首都，而在彼此不相联系的乡村和小城市則根本沒有政治生活。凡是能够使首都的軍隊和官僚組織陷于瘫痪状态或者把它們爭取到自己方面来的人，就都能够夺取国家政权；而如果总的形势要求社会革命，那末也同样可以按照这种办法进行革命。

在我們的时代，在铁路和电报、报纸和集会、連发枪和机关枪的时代，在已經建立起許多工业中心城市的时代，只要首都的軍隊不是事先已經完全解体，那末少数人是不能使它陷于瘫痪状态的。同样地，只在首都进行政治斗争也完全不可能了。現在，一国的政治生活已經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已經形成这种形势的地方，足以推翻敌視人民的政权的巨大政治震蕩，只在具备下述条件的情况下才可以指望其出現：

(1) 政权是坚决敌視人民群众的。

(2) 存在着坚决反对这个政权并且得到有組織群众支持的大党。

(3) 这个党代表絕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并且受到他們的信任。

(4) 这个政权的工具即官僚和軍隊对政权的信任、对它的力量和稳固性的信心已經动搖。

最近几十年来，至少在西欧，还没有一个国家曾經形成同时具备上述全部条件的形势。长时期来，无产阶级始終不占人口的多数，而社会民主党也不是最强大的党。如果說我們在過去

几十年間曾經盼望革命迅速爆发，那末这也并不仅仅寄希望于无产阶级，而且也寄希望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仅仅寄希望于革命的群众政党，而且也寄希望于拥护这个政党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根本辜负了这种期望。现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德国甚至已经不再是一个反对党了。

另一方面，从1870年起，在欧洲的各大国中（其中也包括俄国）曾经存在过的不稳定状态已经停止。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已经使自己的人民相信：它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

因此，在经常性的和独立的工人运动产生以后最初几十年間，亦即从上一世纪的60年代起，政治革命的可能性在一段时期內不断地缩小，尽管无产阶级日益感到政治革命的需要，并且根据七十年来的经验相信政治革命已经迫近。

但是，形势正在朝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逐渐变化。无产阶级的组织正在日益发展。这一点大概要算在德国表现得最为明显。最近十二年来，这种发展特别迅速。我们知道，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成员人数已经增加到五十万，而思想上接近它的工会组织的人数则达到二百万。与此同时，不是作为私人企业，而是作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事业的报刊也已经加强；各种政治日报的发行数已经增加到将近一百万份；工会的定期出版物（大都是周刊）的发行份数则增加得更多。

被剥削的工人群众的这种有组织的力量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

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优势过去一直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剥削者拥有国家政权的有组织的手段，而被剥削阶级则几乎完全没有任何组织，至少没有全国规模的组织。当然，劳动阶级没有组织是根本不行的。但是，在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以前，这种组织只是联合了个别行业的代表，或者只是在个别地方

进行活动；这就是行会組織或公社組織，以及地方的协社。其中，公社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反对国家政权斗争的强大支柱。有人毫无保留地把公社和国家混为一谈，认为公社是不折不扣的阶级統治組織。再沒有比这种看法更錯誤的了。公社可以是这样的組織并且往往就是这样的組織。可是，如果被剝削阶级在公社中占多数并居于领导地位，那末公社也可能代表国内的被剝削阶级的利益。近几个世紀来，公社的这种作用在巴黎公社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公社有时也可以成为社会的下层阶级的組織。

但是，在我們的时代，公社已經不能单独地在現代强大国家及其政权面前捍卫自己的独立地位了。下层阶级所联合組成的包括全国范围各行各业的巨大組織，具有了越来越大的意义。

这一点在德国做得最为成功。在法国以及拥有旧式工联的英国，无论工会組織还是政治組織都还是极为分散的。但是不管无产阶级的組織如何蓬勃发展，它在平常的、非革命的时期总是不能包括国内的全体劳动群众，而总是只能联合劳动群众中因职业和地区条件或个人特点而超越于一般群众的优秀部分。相反地，在革命时期，当最軟弱的人也感觉到自己能够斗争并且渴望斗争的时候，阶级組織的吸引力就仅仅取决于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人数了。

因此，指出这样一点是很有趣的，即德国雇佣工人現在已經不仅占居民的大部分，而且占选民的大部分了。

我們还没有 1907 年普查时关于工人人口成分的确切統計数字，而只有 1895 年普查时的数字。我們把这些数字拿来同 1893 年选民成分的材料加以比較，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些情况，

1893 年的选民数达 10,628,292 人, 而有独立工资收入的男人在 1895 年达 15,506,482 人。如果从这个数字中扣除未滿二十岁的人数以及二十到三十岁的人数的一半, 那末有独立工资收入的、达到选举年令的男人人数則将近 10,742,989 人。这个数目几乎等于 1893 年的选民数。

在达到选举年令的从事农业、工业和商业的男人当中, 按照同一计算方法来计算, 有 4,172,269 个独立业主, 有 5,590,743 个雇佣工人和职员。如果考虑到 3,144,977 个工商企业中有一半以上 (1,714,351) 是小企业 (它的业主大都在自己的利益方面接近于无产阶级), 那末就可以毫不夸大地认为, 在 1895 年的选民当中, 每有三百五十万个关心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独立业主, 就有要求消灭这种私有制的无产者六百万人以上。

可以认为, 那些虽然应该加以注意, 但是没有特别意义的其余一切居民阶层, 也保持着这样的百分比。这里指的是, 例如, 没有职业的“独立者”。富有的资本家——食利者, 以及領殘廢撫恤金和养老金的貧民, 就都属于这一类。

但是, 无产阶级在有独立工资收入的居民当中, 要远比在选民当中更占优势。因为有独立工资收入而没有选举权的选举适龄人口, 几乎全部是无产阶级。

因此, 在德国計有:

年 令	“独立者”	工人和职员
从 18 岁 到 20 岁	42,711	1,335,016
从 20 岁 到 30 岁	613,045	3,935,592
从 30 岁 到 40 岁	1,319,201	3,111,115
从 40 岁 到 50 岁	1,368,261	1,489,317
50 岁 以上	2,102,814	1,648,085

1895年，在农业、工业和商业中，每有5,474,046个“独立者”，就有13,438,377个工人和职员。如果从前一个数字中再扣除那些家庭劳动者和自认为是“独立者”而实际上是伪装的无产者的人，那末就可以大胆地说，还在1895年，关心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居民阶层就至多不过占有独立工资收入的人口之四分之一，虽然他们仍然足足占选民人数的三分之一。

十三年前，即1882年，情况还不是这样有利的。如果我们拿1882年的工会统计数字同1881年的选民数字加以比较，并且对1895年进行同样的核算，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到如下的结果：

	选民总数	“独立者” 选民数	工人选民数
1882年	9,090,381	3,947,192	4,744,021
1895年	10,628,292	4,172,269	5,590,743
增长数	1,537,911	225,077	846,722

1882年小企业的数目大致与1895年小企业的数目相等，即1,877,872个。但是，1882年“独立者”中非无产者成分的数目却绝对高于1895年。因此，可以认为，1882年关心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选民人数，接近于1895年的数目，即约有三百五十万人，而无产阶级成分的数目则近五百万人。因此，在1882年至1895年期间，拥护私有制的人数没有变动，而反对私有制的人数则在选民中增加了一百万。

在这一期间，投社会民主党人票的选民数增加得还要多，即从311,901人增加到1,780,989人。固然，1881年社会民主党人所得的选票数是被反社会主义者法令人为地降低了的。



1895年以后，资本主义当然还是继续发展，而无产阶级的人数也同时继续增长。可惜，我们没有1907年德国的更完全的统计数字，这些数字是会证实这一点的。

根据初步的统计资料，农业、工业和商业中的独立业主（男人）的数目从1895年到1907年增加了33,084人，就是说，几乎等于没有增加；而职员和雇佣工人（男人）即无产者的数目则增加了2,891,228人，就是说，几乎增加为一百倍。

由此可见，早在1895年即已占居民和选民的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成分，后来又取得了巨大的优势。

假定说，独立业主和工人的数目中男选民的百分数现在仍和1895年时一样，那末我们就可以对前表作如下的补充：

	选民总数	“独立者” 选民数	工人选民数
1895	10,628,292	4,172,269	5,590,743
1907	13,352,900	4,202,903	7,275,944
增长数	2,724,608	30,634	1,685,201

无产阶级在选民增长数中占了极大部分，而且比从1882年到1895年期间增长得更多。

但是，对于工业发展说来，1905年的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的材料是值得注意的。

城市通常总是比乡村更有利于政治生活和无产阶级组织的发展，有利于我们的学说的传播。因此，乡村人口数比城市人口数缩减这一事实是具有巨大意义的。

下面所引的表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是在如何迅速地进行着。在这里，乡村人口是指不足两千居民的公社人口，而城市人口是指不少于两千居民的公社人口。

年 份	乡 村 人 口		城 市 人 口	
	絕 对 数	百分数	絕 对 数	百分数
1871	26,219,352	63.9	14,790,798	36.1
1880	26,513,531	58.6	18,720,530	41.4
1890	26,185,241	53.0	23,243,229	47.0
1900	25,734,103	45.7	30,633,075	54.3
1905	25,822,481	42.6	34,818,797	57.4

由此可見，在三十年中間，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倍多，而乡村人口則不仅相对地减少，而且絕對地减少了。在同一时期，城市人口增加了两千万，而乡村人口則几乎减少了一百万。德意志帝国建立时，乡村人口还几乎占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而現在則只占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二稍强。

如果考察一下加入德意志帝国的各邦，那末經济发展程度較高的邦的人口也增加得比較快些。在按帝国現在疆域計算的人口总数中，各个邦所占的百分比如下：

	1816	1855	1871	1905
普魯士.....	55.2	59.0	60.1	61.5
薩克森.....	4.8	5.6	6.2	7.4
总 計.....	60.0	64.6	66.3	68.9
巴伐利亚.....	14.5	12.5	11.8	10.8
符騰堡.....	5.7	4.6	4.4	3.8
巴 登.....	4.1	3.7	3.6	3.3
黑 森.....	2.3	2.2	2.1	2.0
亚尔薩斯—洛林.....	5.2	4.3	3.8	3.0
总 計.....	31.8	27.3	25.7	22.9

这样，1816年在普魯士和薩克森現在所占有的領土上居住

着当时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而在1905年則已經几乎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七十。相反地，1816年南德意志的人口数占現在屬於普魯士和薩克森的那些地区的人口数的半数以上，而在1905年則只占三分之一。1816年在現在的普魯士和薩克森的領土上共居住一千五百万居民，而在四个南德意志邦和亚尔薩斯—洛林則只居住八百万人。1905年，前两个邦共有四千二百万居民，而在上表所列的其余各邦中則共有一千四百万居民。換言之，在前两个邦中人口数几乎增加了两倍，而其余各邦却甚至增加不到一倍。

由此可見，經濟的发展任何时候都有助于人民中革命成分的增长，而不利于保守成分；有助于革命成分在国家中所占优势的巩固。这里所說的革命成分，是指要求改变現存国家制度和所有制的分子而言。

但是这种革命成分的革命性最初只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存在的。革命成分是革命从中吸收自己的新兵的后备队，但并不是所有的新兵都能立即成为“革命战士”。

很多从小資产階級和小农出身的无产者，大都长时期保持着他們出身的那个階級的胎記；他們不觉得自己是无产者而渴望拥有财产。他們攢錢，想买一小块土地，开一爿小店鋪或有两个不幸的学徒的小作坊，以便以“独立业主”自居。有些人对这一点失去了希望，或者理解到这样的道路会給他們注定如何悲惨的生活。但是他們只是觉得自己无能，而不想同自己的伙伴一起为爭取美好的生活而斗争。他們以为，出卖自己的同伴也許会得到更多的东西。他們变成了工賊或黃色工会的會員。也有一些人站得高些，承认同自己的敌人——資本家进行斗争的必要性，但是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和力量来对整个資本主义制度宣战。他們向資产階級政党和政府寻求援助。

但是，甚至在那些承认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的  
人们中间，也还有不少人不愿意超出现存社会的范围，并且对无  
产阶级的胜利表示怀疑或者完全失去信心。

经济发展以及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居民无产阶级化的过程  
进行得越快，从乡村涌向城市、从东方涌向西方、从小私有者下  
降为无产者的人数越多，那末在无产阶级本身中也就会有越来  
越多的分子还不理解社会革命的意义，甚至还不懂得现代社会的  
阶级矛盾。

把这些人变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拥护者——这是一个必要  
的、但是在一般条件下极其困难的、需要极大的忠忱和智慧的任务；  
这个任务，不管你怎样全力以赴，总是不会像我们所希望的那  
样迅速地完成。我们的兵源现在大概包括人口的四分之三，  
可能还要多些；投我们的票的人数还不到投票者总数的三分  
之一，——它等于选民总数的四分之一。

但是，当革命动荡的时期一经到来，运动前进的速度便会立  
即变得极为迅速。那时候，人民群众将以难以想像的速度学会  
很多东西，并开始明确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在他们身上不  
仅将以难以置信的力量激发起斗争的勇气和渴望，而且还将激  
发起政治上的兴趣，因为他们开始明白，他们挣脱黑暗奔向光明  
的日子终于到来了。那时候，甚至最懒惰的人也将变成最积极  
的人，最怯懦的人也将变成最勇敢的人，而眼光最狭小的人也将  
大开眼界。那时候，群众将在几年之内就受到在平常条件下需  
要几代的时间才能受到的政治教育。

如果这样的形势业已形成，如果被内部矛盾弄得四分五裂  
的政权眼看就要垮台，如果在国家内部有一个要求夺取政权并  
具有为此所需的力量的阶级，那末为了把奋起的阶级引导到胜  
利，就需要有一个受到这个阶级信任的党，它对摇摇欲坠的制度

怀有不可調和的仇恨，并且对业已形成的形势具有明确的認識。

社会民主党始終就是这样的党。构成国民多数的革命階級也存在着。但是能不能够指望現存的制度发生道义的崩潰呢？

## 七 階級矛盾的緩和

前面已經說过，恩格斯曾在 1885 年指出，从法国革命（这个革命以及它所引起的后果，从 1789 年一直延續到 1815 年）时起，大約每經過十五年至十八年便在欧洲发生一次革命或重大的政治变革，如 1815 年、1830 年、1848—52 年、1870—71 年。因此，他預料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将发生下一次的革命。不出所料，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政治轉变：俾斯麦的政权倒台了，民主的政治运动在全欧洲重新活跃起来。但是，高潮的規模不大而且为时甚短；从那时以来已經过去将近二十年了，可是真正的革命，至少在西欧，却一直沒有爆发。

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从 1789 年到 1871 年欧洲一直处于动蕩不安之中，而其后却能保持政治形势的稳定，并且最近又为完全的政治停滞所代替呢？

在 19 世紀的整个前半期，即 1848 年以前，对于那个时期的經濟生活和精神生活具有重大意义的居民阶层，在欧洲的任何地方都沒有能够执掌国家政权；国家政权，作为貴族和僧侶的代表，有时对这些阶层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有时則采取公然敌对的态度。德意志和意大利之分裂为許多小邦，阻碍了任何的經濟发展。从 1846 年到 1870 年期間，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一时期，工业資本首先在英国战胜了土地占有者階級。英国在 1846 年廢除了粮食进口稅，开始了貿易的繁荣；其他国家，例如，德国和奧地利的工业資本，也至少获得了与土地占有者階級

平等的权利。知識分子获得了出版自由和轉业自由，而小資产階級和小农則获得了选举权。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国家統一，滿足了这两个国家的人民的最迫切的希望。的确，这是在1848年革命失敗后发生的，而且不是这两个国家内部的人民运动的結果，而是对外战争的結果。1854—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sup>37</sup>消灭了俄国的农奴制，并且迫使沙皇政府不得不正視工业資产階級。1859、1866和1870年，意大利实现了統一；1866和1870年，德意志实现了統一（虽然是不完全的）；1866年，奥地利开始了自由主义的紀元，而在德国則为实行普选权、某种程度的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創造了前提。1870年，法国完成了这一切工作，并且建立起民主共和国。1867年，英国实行了选举改革，給予过去一直沒有享受过选举权的工人階級上层和小資产階級下层以选举权。因此，在欧洲，除了无产階級以外，一切階級都有了今后可据以建設自己生活的国家基础。这些階級，尽管还不是完全地，但終究获得大革命以来所一直向往的那个东西。如果說它們的願望所以沒有完全实现并且不能完全实现，是因为有产階級各不同阶层的利益的尖銳矛盾，那末那些一直被蒙騙的阶层則不感觉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爭取独攬一国的政权，而它們所缺少的东西也沒有大到足以使它們因此而甘冒革命的危險。

在欧洲各国中，无产階級，首先是城市无产階級，仍然是唯一革命的階級。这个階級仍然充滿了革命精神。尽管上述轉变根本改变了政治形势，无产階級却基于1789年至1871年这一期間、即几乎整整一个世紀的經驗，仍然对新的革命的迅速到来怀抱着希望，当然，他們所希望的还不是純粹的无产階級革命，而是小資产階級—无产階級革命，这个革命的領導权，由于无产階級的业已增长的重要性，必将由无产階級担当起来。不仅是某些“教条主义的馬克思主义者”，如恩格斯和倍倍尔，而且那些跟

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的讲求实际的政治家，如俾斯麦，也預料到这样的革命。如果說俾斯麦还在 1878 年时就认为通过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是必要的，虽然社会民主党当时还没有在选举中得到五十万張选票（就是說，还不到投票人总数的百分之十，不到选民总数的百分之六）；如果說他在当时就抱着一种絕望的想法，想趁着社会民主党还没有取得优势的时候就挑起街巷的战斗，那末这就只能用这样一个原因來說明，即他认为无产阶级一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已經极其迫近了。

的确，这样的观点是为許多情况所确证了的，更不要說前一个世紀的教訓了。

70 年代，欧洲爆发了經濟危机。这次危机的来势之猛、期間之长和規模之大，是欧洲所从来没有过的；它一直延續到 80 年代后半期。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贫困化，以及这次危机所引起的资本家集团的灰心丧志，由于食用商品方面的竞争（首先是来自美国和俄国方面的竞争）的影响而更加尖銳化了。这种竞争使西欧农业的整个商品生产都受到威胁。

农民、手工业者和无产者的普遍贫困，资产阶级对自己力量之日益失去信心，以及 1871 年在法国、1878 年在德国和奥地利开始的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殘酷迫害，都表明在最近期間便将发生巨大的变革。

1848 年到 1871 年时期所創立的国家制度的基础曾經符合于当时广大居民阶层的要求，所以它还不可能在那些年代中被摧毁。相反地，当无产阶级反对資本主义的革命的危險愈迫近，有产阶级便愈是圍繞着自己的政府紧密团結起来。小资产阶级和小农通过新的政治权利（如选举权）获得了影响政府的极为有效的手段，可以用来从政府方面爭取各种物质方面的让步。他們过去的政治斗争的同盟者对他們說来越是变得可怕，他們便

越是想通过政治方面的效劳来获得政府方面的支持。

总之，经济萧条和政治压迫在广大居民阶层中所引起的不满，仅仅演变为一个声势微弱的运动；这个运动，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以俾斯麦的倒台(1890年)达到了自己的顶点；此外，还可以举出法国(1889年)为强力修改宪法开辟了道路的布朗日主义<sup>38</sup>。但是，革命形势的一切假象也就在这里结束了。

为期极长的工业萧条也正是在这个政治转变时期结束的。极为生气勃勃的经济繁荣时期开始了；这个时期除了为时不长的几次间断以外，一直继续到不久以前。资本家及其思想家、教授、记者和其他知识分子，都又重新扬眉吐气。手工业者从这个繁荣中分沾了利益；农业的状况也有所好转。迅速增长的工业人口使农业获得了更为广阔的销售市场，特别是肉类和乳类这些在食用商品方面最少受外国竞争影响的产品。拯救了欧洲农业的并不是农产品的保护关税，——无关税贸易各国，如英国、荷兰和丹麦的农业发展便证明了这一点，——而是80年代末期开始的工业的迅速高涨。

但是，工业高涨又是世界市场迅速扩大的结果；这种市场扩大本身使得食用商品从遥远国家流入欧洲，从而引起了农业危机。世界市场的扩大，其原因之一也是由于西欧以外地区铁路网的发展。

按公里计算的铁路长度如下：

	1880年	1890年	1907年	1880—1907 年增长率 百分比
德 国………	33,634	42,869	58,040	72
法 国………	25,932	36,895	47,823	84
英 国………	28,854	32,297	37,150	29

与此相比较，下列各国的铁路长度如下：



	1880年	1890年	1907年	1880—1907 年增长率 百分比
俄 国……	22,664	32,390	72,020	218
英屬印度……	14,772	27,316	48,106	226
中 国……	11	200	6,698	60,800
日 本……	121	2,333	8,067	6,666
美 洲……	171,669	331,559	487,506	183
非 洲……	4,607	9,386	29,798	547

由此可見，从 1880 年起，特别是从 1890 年起，在年輕的資本主义国家中，铁路建設要比老牌資本主义国家更为迅速。

同时，海上运输业也有了飞跃的发展。海运船只的載重量按吨数計算如下：

	1882年	1893年	1907年
德 国……	249,000	783,000	2,256,783 (1908年)
英 国……	3,700,000	6,183,000	10,838,531
挪威和瑞典……	140,000	392,000	1,347,533
丹 麦……	67,000	123,000	404,946
法 国……	342,000	622,000	739,819
美 国……	617,000	826,000	2,077,477
日 本……	40,000	108,000	1,115,880

这些数字說明了近二十年来世界市場的大規模的扩大，以致使得它能够在一个时期里吞吐如此巨量的商品。所有的工业国都因此而對世界市場，从而也對作为扩大对外貿易市場的手段的殖民政策，表現了最大的兴趣。当然，海外領地的占領，从 80 年代开始，几乎是跟扩大世界市場毫无关系的。从这时开始的殖民政策，几乎仅仅推行于非洲，因为只有非洲，按照歐洲列强的意見，还留存着許多“自由的”土地，亦即尚未被任何一个强

国攫取的土地。但是，只要看一看上面的铁路长度表就可以知道，非洲在这个表中所占的数字是不大的。固然，非洲铁路网的长度从1880年起到1907年从4,600公里增加到将近30,000公里，但是这个数字同亚洲、尤其同美洲比较起来是不大的，因为亚洲铁路网的长度从16,000公里增加到90,000公里，而美洲铁路长度则从171,000公里增加到487,000公里。在非洲，铁路线的极大部分不是在80年代后被侵略的新殖民地，而是在旧殖民地和独立国家。这一点可以从下表看出来：

按公里计算的铁路线长度

	1880年	1890年	1907年
阿尔及尔.....	1,405	3,104	4,906
埃及.....	1,449	1,547	5,544
阿比西尼亚.....	—	—	309
好望角洲.....	1,457	2,922	6,123
纳塔 尔.....	158	546	1,571
德兰士瓦.....	—	120	2,191
奥伦治共和国.....	—	237	1,425
非洲其余地方.....	438	919	7,729
总 计...	4,607	9,356	29,798

可见，那些在欧洲列强的新殖民政策下被侵占了大部分的地区，只有7,700公里铁路，亦即只占非洲铁路总长的四分之一，不到全世界铁路总长的百分之一（0.8%）。这说明，殖民政策对近二十年来世界市场的扩大和生产的复苏是影响极微的。

这次复苏同国外市场的开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国外市场的开辟同80年代起所推行的新殖民政策在时间上是恰相一致的。正是因为这个原故，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把殖民政策同经济繁荣联系起来。同时，欧洲列强的资产者还产生了一

个新的理想，他們从90年代起就开始用这个新理想来对抗资产阶级的某些思想家早在80年代便已甘拜下风的社会主义。这个理想便是要把海外国家并入欧洲的宗主国，这也就是所谓的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不外就是一种侵略政策。这种政策造成了想在同一一些海外国家推行同样的侵略政策的列强之间的敌对关系。因此，没有强大的武装，没有庞大的常备军，没有能够在远洋进行战斗的舰队，是不能够实行帝国主义的。

截至60年代止，资产阶级一般都是反对军国主义的，因为资产阶级当时还采取反对政府的敌对立场。它讨厌常备军，因为常备军所需的军费数目极大，而常备军本身又是敌视资产阶级的政府的巩固支柱。资产阶级民主派认为常备军是多余的，因为那时资产阶级的利益还只限于国内，因而不愿意进行侵略战争。

从70年代起，资产阶级开始对军队越来越发生好感，而且不仅是在1870年的战争中为军閥树立了声望的德国和法国（在德国是由于军队获得了辉煌的胜利，而在法国则是由于人们把军队看作是保护国家免于刚过去的战争所带来的那种破坏的手段），在其他国家，资产阶级也开始对军队感到兴趣，认为军队是镇压国内敌人和征服国外敌人的手段。有产阶级同政府的关系越是改善，它就越是对军队表示好感。尽管利害矛盾分裂着它们，它们——从最急进的民主派起，到最保守的封建主止——却一致愿意为军国主义付出牺牲。只有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才构成反对派。

因此，最近几十年来，政府是无限地加强了，而推翻政府的可能性，即革命的可能性，看来却被推到无限遥远的将来。

不应当把急进的反对派同那不参加政府、但却渴望掌握政权的反动集团对政府的敌对关系混为一谈。只有无产阶级才构

成急进的反对派。但是在1890年的政治转变之后，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也失去了自己的革命倾向。

这次转变在德国和奥地利消除了对无产阶级实行政治镇压的最极端的表現。在法国，公社起义以后时期所开始的迫害也在更早一些的时候最后停止下来。

固然，在社会改革、工人立法方面是没有任何进展的。这方面最大的成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获得的，那时候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居民健康所造成的有害影响虽然已经达到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地步，但是工业资本还没有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统治力量，而小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和部分知识分子还对它采取强烈的反对立场；那时候还可以指望用微不足道的工人立法就能够满足日益变为强大力量的无产阶级。英国还在上一世纪40年代便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形势。英国在工人立法方面的最重大的措施——通过关于妇女实行十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便正是在这一时期（1847年）实现的。

大陆欧洲远远落在了后面。直到1877年，瑞士才通过了规定男工的工作日最长不得超过十一小时的工厂法。奥地利在1885年也实行了这种最大限度的工作日长度。德国和法国在俾斯麦倒台后的政治高涨时期也获得了某些成就。1891年，德国通过了规定妇女的工作日为十一小时的法律，而这在过去是没有法律保障的。1892年，法国也通过了同样的法令。

不过如此而已。从那时以来再没有得到过任何值得一提的成就。德国在近十七年来只实行了女工的十小时工作制。男工的权利仍然缺乏法律的保障。

无论是工人立法还是任何其他社会改革都陷于完全停滞的状态。

但是，80年代末开始的經濟繁荣，使得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

依靠迅速增长的劳动力需求,能够无须立法的帮助,而只通过工会的“直接行动”,便改善了自己的状况。德国向国外移民人数的减少便证明了对劳动力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德国向国外移民的人数如下:

1881年.....	220,902
1887年.....	104,787
1891年.....	120,089
1894年.....	40,964
1900年.....	22,309
1908年.....	19,883

劳动力需求的这种迅速的增长,使工人阶级的许多阶层对资本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在新时代的最初两个十年中间,亦即从1870年起,由于经济萧条和政治压迫而在德国、法国和奥地利发展得极为缓慢的工会,现在开始非常迅速地成长,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最为蓬勃的德国。这些国家的工会赶上甚至超过了工人阶级事业的老战士——英国的工会,并且在提高工资、缩短工时等改善劳动条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例如,奥地利工会会员人数在1892—1907年期间从46,606人增加到501,094人;德国中心工会会员人数在1893—1907年期间从223,530人增加到1,865,506人。在同一时期,亦即从1892年到1907年,英国工联会员人数仅仅从1,500,000多人增加到2,406,746人。可见,英国工会会员人数增加了900,000人,而德国则增加了1,600,000人。

但是这一时期德国工会不仅在自己队伍的迅速增长方面超过了英国工会,而且还是工会运动的一种较高的形式。英国的工联完全是自发地形成的,产生它的只是实践;德国的工会则是社会民主党人创立的,他们领导着工会,并且在自己的工作依据

着馬克思主义的卓有成效的理論。因此，德国的工会运动能够采取更为合理的形式。与按地区和职业分散組織的英国工联不同，在德国建立了大規模的、集中化的产业工会；在这里，比英国的工联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限制各个工会有关它們的管轄範圍的爭論，并且避免行会习气和貴族化。德国的工会活动家比英国人更多地感觉到自己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代表，而不仅仅是組織到工会里面来的某一行业的劳动者的代表。英国人只是逐渐地摆脱了世代相傳的这种局限性。国际工会运动的领导地位日益轉到德国工会，因为德国工会一直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比它們的英国同志处于馬克思主义理論的更大的影响之下。

社会改革的实行越是在議會中受到阻撓，工人阶级通过政治途徑所获得的实际成就越少，工会、特别是德国工会的这种輝煌的发展便越是对广大无产阶级发生深刻的影响。

看来，工会以及合作社的使命，似乎就在于不經過任何政治动蕩，而只是利用現有的立法基础，来爭取工人阶级地位的日益提高和資本活动範圍的日益縮小，用“立宪的工厂”来代替資本主义专制制度，并且通过这个过渡阶段，不經過任何急剧的破坏和重大的变革而逐渐达到“工业民主”。

但是，就在阶级矛盾似乎日益緩和的时候，已經产生了将重新导致阶级矛盾尖銳化的因素。

## 八 阶级矛盾的尖銳化

除了工会組織以外，同时还建立起另一种日益威胁工会組織的强有力組織。这个組織就是企业主联盟。

我們在上面已經提到股份公司。最初，只有銀行和商业企业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但是从上一世紀70年代起，股份公

司形式开始日益扩展到工业方面。我們已經指出过，股份公司促进了以生产的日益扩大为基础的、企业向少数所有者手中的集中。股份公司帮助了大金融资本家剥夺投入股份的小额资产；大金融资本家要比小额“储蓄者”远为熟悉现代经济生活的危险航路，有时他们甚至在经济生活中人为地制造波澜和暗礁。由于股份公司制度，投入股份的小额资产也变成政权的工具，为领导股份公司的金融界巨头所完全控制。最后，股份公司也使个别的大金融资本家、个别的十亿富翁和大银行能够在许多同类企业还没有完全为他们所占有之前就受他们的支配，从而把它们联合成为一个共同的组织。

因此，从90年代起，企业主的组织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起来；而且，根据现有的立法，它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它们的目的却只有一个：为提高利润建立人为的垄断。这个目的一部分靠提高产品价格、即加紧剥削消费者来达到，一部分则靠降低生产费用来达到。降低生产费用的办法有种种，但是不管哪种办法，最后不是解雇工人，就是加紧剥削工人，而且往往两者兼而有之。

企业主为了镇压工人而结成联盟，要比联合到旨在维持高额价格的卡特尔和托拉斯更为容易。在这里，企业主彼此之间既无竞争又无矛盾，而是完全一致的。在这方面，不仅同一生产部门的企业主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企业主之间的利益也是一致的。企业主作为买主和卖主不管在商品市场上彼此如何互相敌对，作为同一种商品即劳动力的买主，在劳动力市场上却是彼此亲密团结的。

企业主的这种组织给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造成越来越大的阻碍。诺曼在上面所引的那篇文章中夸大了这种组织的力量。工会对这种组织并不是那样无能为力的。但是近

些年来，工会的胜利进展受到越来越大的阻撓，它們被迫到处轉为守势；企业主越来越多地并且越来越成功地用同盟歇业来对付罢工。工会可以进行胜利斗争的有利时机正在越来越少。

工資要求极低的外国工人的日益大批入境，更加加深了这种状况。这是工业繁荣的自然結果；而工业繁荣，由于铁路的修建和航运的发达使资本主义产品能够远銷地球的最遙远角落，因而又是世界市場扩大的結果。在新开辟的銷售地区，这些产品代替了当地的、主要是农民的手工业品；因此，在这些地区的居民那里便发展起新的需求并且产生了对货币的需要。同时，在这些落后地区，由于当地工业的衰落，又造成了劳动力的过剩。人們在本国找不到工作、尤其是能够保障工資收入的工作。而资本主义国家用来运銷工业品的新的交通工具、即铁路和輪船，却使他們能够借回程之便作为活的貨物涌到这些可以找到有利工作的工业国家。

人和商品的交流，是资本主义工业市場扩大的必然結果。最初，资本主义工业在本国范圍內从城市向乡村供应工业品，而从乡村不仅获得原料和食品，而且获得劳动力。当工业国变成輸出商品的國家，它也就立即变成輸入人口的國家。英国就是一个例子。在上一世紀初，大批工人流入英国，特别是从爱尔兰。

当然，这些落后成分的流入給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造成严重的障碍，但这种流入是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联系着的。不应该像侈談社会主义的現代“现实主义政治家”那样，把工业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歌頌为无产阶级的幸福，而把外国人的流入看做是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毫无益处的可詛咒的現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任何經濟进步，都会給无产阶级带来某种可詛咒的东西。如果美国工人不滿意于日本人和中国人流入該国，那末他們就应该反对美国輪船把美国商品运往日本和中国，



反对用美国的金錢在这两个国家建設铁路。这两者間是有着不可分的联系的。

外国人的流入，正和采用机器，用女工代替男工，用非熟练工人代替熟练工人一样，是压制无产阶级的一种手段。不应该因为这种流入的消极結果就反对外国工人，而应该反对資本的統治，拋棄那种认为資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可以保证工人得到稳定利益的幻想。这种利益总是暫时的。最后到来的总是悲惨的失望。这一点甚至在現时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上面已經指出过，最近二十年来德国向国外的移民显著减少。但是同时，移居德国的外国人的数目却增加了。其数目如下：

1880年.....	276,057
1890年.....	433,254
1900年.....	778,698
1905年.....	1,007,179

这些数字都是在各該年12月1日統計的，也就是說，是在农业和建筑业停止工作的时候統計的。这里沒有計算那些只是夏季在德国做工，而秋季回归本国的大量外国工人。

企业主联盟的存在，以及工資要求不高的、无組織的、无保护的外国工人的流入所造成的工会斗争的困难，当食用商品价格上涨的时候，就变得加倍的尖銳。

对于維持欧洲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說来，我們上面指出过的那个自70年代开始的食用商品价格下降的情况，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食用商品价格的下降，提高了工人工資的购买力，緩和了危机时期工資下降的消极后果，并且在危机克服之后使实际工資比名义工資提高得更快（只要农产品进口稅沒有影响到食用商品价格的低廉）。

但是，近些年来食用商品价格又重新开始提高了。

研究一下英国物价变动的情况是最适宜的，因为英国没有农产品关税对物价的影响。根据康拉德所制的统计表，英国一吨（即一千公斤）小麦的价格如下：

1871—75年.....	246.4馬克
1876—80年.....	206.8馬克
1881—85年.....	180.4馬克
1886—90年.....	142.8馬克
1891—95年.....	128.2馬克
1896年.....	123.0馬克

根据德国统计季刊（1908年第4期）的统计数字，最近几年的价格发生了如下的变动。在利物浦，拉巴拉塔小麦从7月到9月每吨价格如下：

1901年.....	129.1馬克
1902年.....	——
1903年.....	139.3馬克
1904年.....	152.1馬克
1905年.....	144.8馬克
1906年.....	138.0馬克
1907年.....	160.0馬克
1908年.....	176.0馬克

当然，不同年份的价格的涨落决定于收成的好坏。但是仍然可以认为，食用商品价格的上涨在现时并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长期的现象。

俄国农业经济的破产和美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使人可以设想，廉价食用商品大量流入欧洲的现象将逐步停止。

例如，在美国，小麦的生产近些年来已经不再增长了。

美国小麦生产情况列表如下：

年 份	耕 地 面 积 (单位:百万英亩*)	收 获 量(单位: 百万蒲式耳**)	12月1日每蒲式 耳的平均价格
1901	49.9	748	62.4分
1902	46.2	670	63.0分
1903	49.5	638	69.5分
1904	44.1	552	92.4分
1905	48.9	693	74.8分
1906	47.3	735	66.7分
1907	45.2	634	87.4分
1908	47.6	664	92.8分

由此可見,小麦生产与其說在增长,无宁說在减少。而价格則表现出完全确定的增长趋势。

除了食用商品进口額的縮減以外,人为地提高一切物价和运输費用的企业主联盟也促进了价格的上涨。这里更不消說农产品关税。这种关税更加加重了压在劳动者肩上的重担,因为它使国家能够提高食用商品的价格。

除了这一切之外,再加上1907年末开始的带来大批失业的危机,无产阶级的状况就变得像現時这样悲惨了。但是不能指望,危机的結束会給无产阶级带来1895年到1907年时期曾經出現的那种繁荣。高昂的食品价格将继续保持下去并且更加提高;国外廉价劳动力的流入也不会停止;相反地,随着更加有利的市場情况的来临,国外劳动力将更加大規模地重新流入。此外,企业主联盟将用更加坚固的铁环勒紧工人,而单靠工会斗争是不能打破这个铁环的。

不管工会过去和現在是如何重要甚至必需,我們也不應該

\* 英亩——4047平方米。

\*\* 蒲式耳——英国容量单位,等于36.36公升(美国每一蒲式耳等于35.23公升。——編者)。

指望它会依靠单纯工会斗争的方法，重新给予无产阶级事业的发展以近十二年来所曾经给予的那种强有力的推动。而且，我们应当估计到，我们的敌人能够强大到足以暂时迫使无产阶级实行退却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繁荣年代，当工业已经充分开工并且不断抱怨劳动力不足的时候，工人却不能再提高自己的实际工资，即不是用纸币，而是用食品表示的工资；他们的实际工资甚至无宁说降低了。在德国，通过私人所进行的调查，已经判明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存在着这种情况。而在美国，官方承认这种情况涉及到整个工人阶级。

从1890年起，华盛顿的劳工委员会就每年对美国最重要工业部门的某些企业的劳动条件进行调查。近年来劳工委员会调查了4169个工厂和作坊的工资和工作日长度，以及工人家庭的收支情况和主要消费品及其价格。然后就调查所得的数字进行比较研究，以便判明工人生活水平是提高还是降低。

下面表中的每一栏都是以1890年到1899年这一期间的平均数为100。因此，101这个数字表示比1890年到1899年这一期间的平均数提高百分之一，而99则表示降低百分之一。

劳工委员会的统计数字如下：

年 份	完 全 就 业 工人的周工资	工 人 所 消 费 的 食品的零售价格	周 工 资 的 购 买 力
1890	101.0	102.4	98.6
1891	100.8	103.8	97.1
1892	100.3	101.9	99.4
1893	101.2	104.4	96.9
1894	97.7	99.7	98.0
1895	98.4	97.8	100.6
1896	99.5	95.5	104.2

年 份	完 全 就 业 工 人 的 周 工 資	工 人 所 消 費 的 食 品 的 零 售 价 格	周 工 資 的 購 買 力
1897	99.2	96.3	103.0
1898	99.9	98.7	101.2
1899	101.2	99.5	101.7
1900	104.1	101.1	103.0
1901	105.9	105.2	100.7
1902	109.2	110.9	98.5
1903	112.3	110.3	101.8
1904	112.2	111.7	100.4
1905	114.0	112.4	101.4
1906	118.5	115.7	102.4
1907	122.4	120.6	101.5

这个統計表首先告訴我們，所謂无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高漲”实际上究竟是什么。最近十七年来，对工人阶级說来是非常有利的时期。这是美国經濟极其繁荣的年代，这种繁荣可能是今后永远不会重新出現的。大家知道，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沒有享受到美国工人阶级所享受到的那种自由，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也沒有像它那样奉行更为现实的政策，这种政策摒棄了任何可能使工人阶级离开旨在改善自身状况的瑣細日常工作的革命思想。尽管如此，在經濟高漲的1907年，货币工資虽然比前一年提高百分之四，实际工資却比經濟情况极不景气的1890年提高得极少。当然，失业和对明天缺乏信心，是危机时期和繁荣时期之間的重大区别；但是，1907年完全就业工人的周工資的购买力却只比1890年有微少的改变。

的确，名义工資是大大地提高了。它在1890—1894年蕭条时期，曾經从101.0降低到97.7，也就是說，降低了百分之三，但是其后便不断提高，到了1907年达到了122.4，也就是說，几乎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相反地，在从 1890 年到 1896 年期间，食品价格却比名义工资降低得更快，也就是说，从 102.4 降低到 95.5，几乎降低了百分之七，以致周工资的购买力并不像名义工资降低得那样厉害。1890 年到 1894 年期间，实际工资从 98.6 降低到 98.0，也就是说，只降低了百分之零点六，而名义工资则降低了百分之三。从 1894 年到 1896 年，名义工资从 97.7 提高到 99.5，而食品价格则继续下降。因此，1896 年工人名义工资的购买力达到 104.2。

从那时起，工人的名义工资就不再有那么大的购买力了。就是在繁荣时期，在十多年中间工人的实际工资也一直低于 1896 年。但是却有人把这叫做工人状况的缓慢的然而确实可靠的改善哩。

下述情况也是值得注意的，即甚至在资本家大发横财的工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工人的实际工资不仅未能保持业已达到的水平，而且开始下降了。固然，从 1906 年到 1907 年，名义工资从 118.5 提高到 122.4，即几乎提高百分之四，但食品价格也同时从 115.7 跳到 120.6，即几乎陡涨百分之五，以致甚至在这一时期实际工资也降低了百分之一。实际上，今天的状况显然还要坏些。不能责备美国的统计家，说他们喜欢把眼前形势看得过于一片漆黑。

这使我们有理由设想，就是在危机结束和新的繁荣时期到来的时候，无产阶级也不能指望重新出现不久前的工会斗争的光辉时代。

但是，再说一遍，我们这里决不是说，工会因此已经变成无能为力的或者甚至是多余的东西。工会仍然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群众性组织，没有它，无产阶级便将毫无保障，便将注定彻底的贫困化。形势的改变并没有减少工会的重要性，而只是要求它采取其他的斗争方法。凡是工会要同企业主的巨大组织打交

道的地方，工会就难以直接从它那里争取到任何东西；但是，因为它们同这种组织的斗争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如果企业主拒绝做任何让步，那末它们的斗争就能够震撼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并且给予政府和议会以影响。

在那些受企业主联盟支配并且对整个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业部门里，罢工越来越带有政治性质。另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条件，可以在纯政治斗争，例如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成功地利用群众性罢工作为武器。

由此可见，工会越来越面临着政治的任务；无论在英国还是在法国、德国和奥地利，工会都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这是拉丁语系国家的工团主义的十足健全的內核；但是由于工团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根性，遗憾地，它使这个內核乾癟在反议会主义的外壳里面了。虽然如此，工会的“直接行动”仍然只能作为合理的补充和加强，而不能代替工人政党的议会斗争。

现在，无产阶级斗争的重心，比最近二十年来更加转到政治方面。自然，无产阶级又重新开始对社会改革、工人立法表现出巨大的兴趣。但是，在这里它正在遇到普遍的停滞，而在当前的力量对比下，在现在的国家制度下，这种停滞是无法克服的。

不应当把停滞理解为绝对的沉寂（在像我们这样不安的社会里这是不可能有的），而应当理解为正在转变为沉寂甚至退化的那种缓慢的发展速度（这是同技术和经济变革的速度及剥削增长的速度比较起来说的）。就是这种极其缓慢的发展也越来越必须通过严重的斗争（主要是工会斗争）来准备和争取，而这种斗争所招致的迅速增长痛苦和牺牲，日益超过了它最后所能获得的积极结果。

但是不应忘记，正是我们的“实际的”、“改良主义的”活动，不仅加强了无产阶级，而且也促使我们的敌人采取日益强有力

的反抗。爭取社会改革的斗争越是重新转变为政治斗争，企业主联盟便越是极力“唆使”议会和政府进攻工人及其组织，把工人的政治权利化为乌有。

于是，在政治生活中，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又提到首要地位，而宪法问题和涉及国家生活基础的问题也重新具有决定的意义。

无产阶级的敌人越来越力图重新削弱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在德国，每当无产阶级获得重大胜利之后，选举时用复票选举权<sup>39</sup>来代替普遍平等选举权的威胁总是要增加。在法国和瑞士，军阀残酷地迫害罢工工人；在英国和美国，法院限制无产阶级的行动自由，因为议会和国会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这种自由。

但是无产阶级不能仅限于反对箝制言论的斗争。如果无产阶级不能争取建立新的国家基础，使得国家机器永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那末它的处境便将越来越困难。如果撇开俄国不说，那末德意志帝国现在便是最需要这一点的国家。议会选举制度本身越来越不利于城市无产阶级。1871年议会选举时的划分选区的办法，现在仍然原封未动地保存着。但是我们知道，从那时以来城乡之间的对比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1871年时有三分之二的居民住在乡村，而有三分之一的居民住在城市，那末现在的比例则完全不同了，尽管选区的划分依然未变。乡村地区越来越比城市更占优势。在最近的几次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共得选票总数的29%，而仅得议席10.8%。相反地，中央党得选票总数的19.4%和议席的26.4%，而保守党人则得选票总数的9.4%和议席的15.7%。

这两个党所得选票总数少于社会民主党，但是却得议席42.1%，即比社会民主党多三倍。在比例选举制下，社会民主党在1907年所得的议席不是43个，而是116个；保守党和中央党



則总共得議席 115 个，而不是 164 个。

繼續保持目前的选区划分，对于最落后的居民阶层說来实质上意味着复票选举权，而这种选举权的不平等随着城市无产阶级人数的增长而逐年加强。

同时，我們現行的投票制度也充分說明，無論在乡村或小城市，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几乎像在經濟上一样受着有产阶级控制，因为現时所采用的选票封筒还不如过去的制度能够保持选举的秘密。

当然，仅仅消灭这些缺点是无济于事的。如果議會本身既无威信又无权力，那末仅仅扩大我們在議會中的影响和力量又有什么用处呢？首先应该为議會爭取到这种权力，确立起真正的議會制度；帝国政府应当成为帝国議会的委员会。

但是，帝国議會的不幸不仅在于帝国政府不听从它的意旨，而且同样地也在于帝国还不是一个統一的国家。帝国議会的职权范围是极受限制的，它处处都要同各邦及其政府和議會的主权发生冲突，同它們的狹隘的分立主义发生冲突。当然，各小邦是比较容易对付的，但是在帝国議会的道路上横阻着一个强有力的障碍——普魯士及其議会的三級选举制。首先必須粉碎普魯士的分立主义。普魯士邦議會必須不再成为各种各样的反动派的支柱。爭取北德意志各邦議會、首先是普魯士邦議會选举的秘密平等选举权，以及把帝国議會变为国家的决定力量，也是当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之一。

如果通过这种办法能够把德国变为民主国家，那末这也还不足以为无产阶级开辟道路。現时已占人口絕大多数的德国无产阶级，可以由此取得解决工人立法問題的钥匙；但是如果国家缺少实现社会改革所必要的足够資金，那末仅仅这一点对无产阶级說来还是无济于事的。

現在，國家的全部資金都用于加強陸海軍軍備。陸海軍軍費的不斷增加，使得現代國家甚至忽視那些不僅有利于無產階級，而且也有利于全體居民的文化方面的任務，如改革國民教育、改善交通（運河和公路）等等；這些措施會大大提高國家的生產及其競爭能力，因此也是以資本主義的純業務利益為轉移的。

但是，由于全部資金都為陸海軍所占用，而且只要存在着現時的制度則今后也仍將為陸海軍所占用，因此不可能撥出大筆款項來實行這些措施。

廢除常備軍和裁減軍備——這是國家實行重大的社會改革的必要前提。甚至資產階級分子也日益承認這一點，但是他們不能創造這個前提條件。蘇特涅式<sup>40</sup>的和平空談並沒有使資產階級分子向這個目的前進一步。

現時的軍備競賽首先是殖民政策和帝國主義的結果；只要你參予這個政策，那末宣傳和平便是沒有意義的。誰贊同殖民政策，誰也就應當贊同軍國主義和爭奪海上霸權的鬥爭；因為給自己提出一定的目的而又拒絕達到這個目的所必要的手段是荒謬的。我們朋友中那些幻想世界和平和裁軍，參加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國際性會議，同時又認為殖民政策（當然是人道的、社會主義的殖民政策，但仍然是殖民政策）勢在必行的人，應當考慮一下這個問題。他們很像 60 年代普魯士的進步黨人；進步黨人作為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害怕革命，力求借助于無往不勝的霍亨索倫王朝達到德國的統一，而不去採取革命的道路。但是同時，他們作為民主派的政治家，又力圖限制軍國主義，儘可能不把實現這個任務所必需的軍費交到霍亨索倫王朝手中。這種矛盾終於斷送了他們。

在當前的形勢下，這是戰鬥的無產階級所面臨的最刻不容緩的政治任務。這也是無產階級必須付諸實現的“實際的”政

策。在这些任务还没有解决以前，由于企业主联盟的发展、食品价格的腾贵、落后工人阶层的流入工业，以及不可能通过立法来实行某种社会改革和压在无产阶级肩上的国稅的增加，因而无产阶级就不能指望有任何稍微重大的“改良主义的”高涨。

改革帝国議会的选举制度，爭取在秘密投票条件下实现邦議會选举（特别是在薩克森和普魯士）的平等选举权，爭取帝国議會能够駕御各邦的政府和議會——这仅仅是首先必須爭取完全民主和国家統一的德国无产阶级所面临的任務；而反对帝国主义和軍国主义，則是全体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任务。

有些人可能认为，解决这些任务也不会使我們得到任何东西。难道瑞士不就是符合上述一切要求——完备的民主制，民兵制，沒有任何殖民政策——的国家嗎？然而在瑞士，社会政策的发展也并不十分順利，企业主也和其他国家一样在剝削和奴役着无产阶级。

因此，应该首先着重指出，瑞士并没有置身于其他国家所推行的軍备竞赛之外，相反地，它也在花費不少金錢来热心于軍备。軍費支出的一部分虽然是由各州来支付的，但是联邦的支出却在飞快地增长。下列数字可以证明这一点：

（单位：百万法郎）

1875年.....	39
1885年.....	41
1895年.....	79
1905年.....	117
1906年.....	129
1907年.....	139
1908年.....	151

軍費支出也像关稅收入一样特別迅速地增长。其数字如下：

	联邦軍費支出 (单位:百万法郎)	財政关税部收入 (单位:百万法郎)
1895年.....	23	4
1905年.....	31	64
1906年.....	35	62
1907年.....	42	73
1908年.....	40	70

如果把几乎彼此相抵的邮政和电报的收支（支出为六千三百万，收入为六千六百万）抛开，那末1908年的收入为八千一百万，其中关税收入占七千万，而支出为八千八百万，其中軍費支出占四千万、国債利息占六百万。

由此可見，甚至在瑞士，軍事化也占用了国家收入的大部分，而它的开支还在繼續迅速增长着。

此外，权利是继承的、是恩賜的还是頑强的忘我斗争中爭取的，在这中間也是存在着很大区别的。

恐怕沒有一個人会天真地认为，我們不必經過斗争就可以不知不觉地从軍国主义和专制主义轉到民主制，从好战的帝国主义“长入”自由民族間的亲密合作。只有当人們认为，今后的全部发展将只在經濟基础上进行，而无須乎政治力量对比和政治制度方面的任何变化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长入”的思想。而当人們发觉，只要无产階級想繼續沿着經濟高漲的道路前进，那末这种变化对无产階級說来就是迫切必要的，那时候，政治斗争、政治动荡和政治变革的必要性也就产生了。

无产階級在这个斗争中必然要大大加强起来；无产階級如果不在国家中占居統治地位，它就不能在这个斗争中获得胜利，就不能达到上述目的——确立民主制和消灭軍国主义。

因此，在現代的大國中，确立民主制和消灭軍国主义，必将

造成与瑞士久已存在的、傳統的民兵制和共和制完全不同的結果。

这种改造工作越是仅仅掌握在无产階級手中，这个結果也就越加明显。无产階級不用指望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找到忠实的盟友。过去我們曾經指望在資产階級陣营中，主要是在小資产階級和小农中，找到盟友。我們已經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长期希望小資产階級民主派参加革命，至少是在初期，如在1848年、甚至在1871年的巴黎所曾經发生的那样。当民主派的政党和政治家越来越让出自己的陣地的时候，我們馬克思主义者却仍然希望把小資产階級和小农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讓他們关心我們的革命目的。这种希望反映在我写于1893年的上引文章中，而尤其明显地反映在恩格斯1895年所写的《导言》中：

“如果这样繼續下去，我們在本世紀末就能够爭取到社会中間阶层的大部分、小資产階級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

我們的希望沒有实现。这再一次证明，當我們馬克思主义者过高估計小資产階級的革命性的时候，我們就在自己的估計和“預言”方面犯了錯誤。但是同时这也证明，所謂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狂热从党内驅逐了小資产階級分子这种指責，究竟有多少根据。如果說恩格斯曾在1894年反对法国的土地綱領，而我在一年之后反对德国的土地綱領，那末这也并不是因為我們把吸引农民到自己方面来看作是多余的，而是因为我們认为人們建議給我們的那种吸引农民的特殊方法是不正确的。在过去这段时期里，我們的法国、奧地利和瑞士党的同志曾經企图用这种方法从农民那里获得成就，但是沒有得到任何結果。

对于小資产階級也可以这样說。我們在中等居民阶层的广大群众中間可以說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宣傳，但是今天

要把他們吸引到我們方面來，是要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困難了。這種觀點並不是出於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性”。我們知道，與其責備馬克思主義的過於悲觀的估計，無寧應該責備它的過於樂觀的估計。從這一點上來說，上述觀點是近年來慘痛經驗的結果。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狂熱”，只是幫助我們承認這個經驗並且理解這個經驗，也就是說，幫助我們揭示它的原因，弄清楚究竟什麼東西是實行成功的“現實政策”的必要前提。

在這裡，我們再一次確信，當我們的“實際的”工作加強了無產階級的時候，這種工作也使無產階級同其他階級之間的矛盾尖銳化。

我們中間有些人希望，資本家的卡特爾和瑞恩<sup>41</sup>，也會像使中等居民階層大吃苦頭的關稅政策一樣，把這部分居民引導到我們隊伍中來。實際上恰恰相反。農產品關稅和企業主聯盟是同工會同時出現的。結果，手工業者從各方面受到壓制。關稅和企業主聯盟引起了食品和原料價格的上漲，而工會則在同時爭得了工資的提高。當然，提高的照例只是名義工資而不是實際工資，因為物價比工資增長得更快。雖然如此，圍繞着工資的鬥爭却引起小手工業者的惱恨；他們把企業主聯盟和主張提高關稅的政黨，看作是反對有組織的工人的鬥爭的盟友。他們認為，是工人，而不是關稅和卡特爾，不僅應該對工資的提高負責，而且應該對原料和住宅價格的上漲負責，因為在他們看來，原料和住宅價格的上漲是工資提高的結果。

物價的上漲也對小商人的狀況發生不良的影響，因為他們的顧客（大部分是工人）的購買力趕不上物價的增長。但是，他們的憤怒不是發泄在關稅政策和企業主聯盟上面，而是發泄在工人身上。而且，隨着工人為避免物價上漲的後果而組織起消費合作社，他們的這種憤怒也日益加強，因為消費合作社排除了商

业的中介。

物价的上漲总要加剧买主和卖主之間的矛盾，因而加强了作为食品的买主的无产者同作为食品的卖主的农民之間的矛盾。

不应忘記，工人在商品市場上起着特別的作用。除了工人以外，其余一切人在商品市場上都不仅是商品的买主，而且是商品的卖主。在价格普遍上漲的情况下，这些卖主作为其他商品的买主所損失掉的东西，还可以依靠他們自己的商品的价格的上漲而贏取回来。只有工人只是作为商品的买主，而不是作为商品的卖主出现在商品市場上。他們的劳动力是一种完全特殊的商品，它的价格决定于它自己的独特的規律，因而它的价格的改变并不立即引起工資的改变。要知道，劳动力并不是脱离人而独立的产品，它同人的整个生命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劳动力的价格取决于对其他商品說来并无任何意义的生理条件、心理条件和历史条件；这些条件使货币工資比其他产品的价格具有較为稳定的性质。工資只是非常緩慢地并且只是在某种程度內随着物价的变动而变动。因此，在物价低落时，工人要比其他商品购买者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在物价上漲时則吃亏最大。工人在商品市場上的地位是同卖主的地位直接对立的，尽管他生产一切东西，而只消費他所生产的产品的一部分。他是处于消費者的地位，而不是处于生产者的地位。因为他所生产的产品并不属于他，而是属于剝削他的資本家。正是資本家，作为雇佣工人的劳动产品的生产者和卖主，随同这些产品出现在商品市場上。而工人則只是作为食品的购买者出现在市場上。

这也就决定了工人同这些产品的卖主、从而也同对他說来是卖主的农民，发生对抗的关系。不仅在农产品关税方面，而且在其他許多情况下（例如在企图提高牛奶价格时），反对农民最

坚决的也正是工人。

但工业中工资的提高和劳动条件的改善，也同样在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农民中间引起愤怒。工业繁荣、工会势力强盛和工会取得胜利的时期，也是农业中劳动力不足的时期。不仅是男女雇农，甚至农民的女儿也越来越向往工业，逃避农村中野蛮的劳动条件。当然，该诅咒的“社会”<sup>\*</sup>，被认为是因此而发生的农业劳动力不足的罪魁祸首。

因此，最初构成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核心并且是革命的坚决拥护者，而后来虽然不大积极，但仍然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盟友的那些阶级，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变成无产阶级的最凶恶的敌人。这种情况在“被马克思主义毒化了的”德国要较为好些，而在法国、奥地利和瑞士则远为严重。

在各大国中，中等居民阶层同无产阶级的敌对关系，因为他们们在帝国主义和殖民政策问题上的正相反对的立场而更加恶化。凡是不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并且否定社会主义的人，如果他不愿意陷于绝望，他就只得信仰殖民政策。这是资本主义还能够向它的拥护者展示的唯一前景。但是殖民政策是同承认军国主义和争夺海上霸权的斗争有着必然的联系的。因此，在利益上同手工业、中间商业和食品生产漠不相关的中等阶层的代表、即知识分子，如果不走向社会主义，便会因为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而同无产阶级及其思想家分道扬镳。勃伦塔诺<sup>42</sup>和诺曼之流，一方面对无产阶级的工会组织和合作社组织以及它的民主趋向表示好感，另一方面又都是海軍和世界政策的热烈崇拜者；他们只是在事情还不触及帝国主义及其工具的

---

\* “社会”一词俄文为“Соци”，显系社会民主党(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я)或社会主义(социализм)这两个词的以訛傳訛的說法或卑称。——譯者



时候才是社会民主党的朋友。

因此，这种政策似乎旨在孤立无产阶级，并且在无产阶级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扩展自己的政治力量的时候，用这种办法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陷于一筹莫展。

虽然如此，帝国主义政策却仍然只能成为摧毁统治制度的支点。

## 九 革命的新时代

我們已經知道，瑞士的軍費支出是在如何迅速地增长。然而，这不过是軍国主义大国的情况的一种微弱的反映罢了。以德意志帝国为例，按照德意志帝国統計年鉴所发表的数字，其軍費支出如下(以百万馬克为单位)：

	1873年	1880/ 81年	1891/ 92年	1900年	1909年
陸 軍.....	308	370	488	666	814
海 軍.....	26	40	85	152	409
殖民地管理費.....	—	—	—	21	32
撫恤金.....	21	18	41	68	115
國債利息.....	—	9	54	78	171
總 計.....	355	437	668	985	1541
每年增长額.....	12	21	35	62	
國家支出總額.....	404	550	1118	2056或 1640*	2850
每年增长額.....	21	52	58	88	

- 从1900年起，邮政、铁路和国家印刷所的支出被列入支出栏内，而过去这些开支是不在該栏内列示的。1900年，这些开支达四亿一千六百万馬克。

我們看見，支出在不斷增長，而且增長的速度越來越快；在帝國成立的最初十年，每年平均增長二千一百萬，而在最近十年則每年平均增長八千八百萬。在最後几年中，這個增長額每年已經達到幾億（1905年——2195億；1906年——2392億；1907年——2810億；1908年——2791億；1909年——2850億），也就是說，在四年中間總共增加七億。

這個增長額主要是用於軍備方面的支出，並且首先是用於海軍方面，而不是用於陸軍方面。從1891年到1909年，帝國的人口從五千萬增加到六千四百萬，亦即增加了四分之一；而在同一時期，陸軍方面的支出幾乎增加一倍，撫恤金和國債利息幾乎增加兩倍，海軍支出則幾乎增加四倍。這種瘋狂的增長在現存制度還沒有根本改變以前是會停止的。同資本主義生產的機械化和自然科學成就在生產中的利用相聯繫的技術的不斷發展，也影響到軍事方面，造成這方面圍繞新發明的不斷競爭，使業已達到的成就相繼失去價值，使國家政權手段日益加強。但是與工業方面的情況不同，這種情況在軍事方面並沒有達到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結果，而只是不斷擴大戰爭時期的破壞，不斷提高和平時期的非生產性支出。

不僅是技術的發展，而且旨在擴大自己的統治、至少是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的列強的世界政策，也使列強必須不斷加強它們借以實現其統治的手段。只要存在着爭取世界霸權的政策，瘋狂的軍備競賽就不可避免地要日益加劇，直到弄得精疲力盡為止。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帝國主義是現存社會所僅余的唯一希望和唯一前途。除此而外便只有一條出路——社會主義。因此，在無產階級還未強大到足以決定國家的政策、克服帝國主義的政策並代之以社會主義的政策以前，這種瘋狂行為是只能有增無已的。軍備競賽越是繼續下去，它給各國人民帶來的痛

苦也就越大。而且，每个阶级都将日益顽强地力图把这种重担轉嫁到其他阶级肩上；軍备竞赛将越来越加剧一切阶级矛盾。

在德意志帝国，基本的負担当然是压在工人肩上的。这个負担在工业繁荣、食品价格低廉和工会运动順利的年代已經足够沉重了。而在危机、物价騰貴和企业主联盟力量占优势的时期，这个担子便将变得更加难以忍受。

而且，日益增长的賦稅重担不仅减少工人的收入和降低他們工資的购买力，而且还严重威胁工业进步本身，而据說世界政策原是应该有助于这种进步的。

美国是德国工业的最危险的竞争者。由于德国現行的保护关税制度，德国的工业較之美国处于更不利的地位。

固然，美国也实行着更高的保护关税，但只是对工业品，而不是对农产品。美国拥有最低廉的食品，并且自己生产着几乎一切原料。同时，美国还具有在自己的比邻没有一个大陆强国这种优越性。美国不必每年从生产中抽出五十万人来做毫无用处的玩偶兵游戏。

随着欧洲軍国主义的加强，美国在工业方面的优势日益增长，而欧洲的经济發展則日益緩慢，欧洲工人的经济状况也日益恶化。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加快，正在要求工人做出最重大的牺牲。

当然，美国也走上了軍国主义的道路，从而也走上了加紧武装的道路。从美西战争<sup>43</sup>时起，美国的陆海軍支出便日益增长。但是，这一点給美国造成的損害要比欧洲列强为少，因为它沒有必要在自己的国内維持一支龐大的常备陆軍。在美国的整个国土上只有七万士兵。無論在工业竞争方面还是在軍备竞赛方面，美国都能比其他一切国家坚持得更久。

关于美国，我們拥有如下的材料：

年度	人口 (单位: 百万人)	国債 (单位: 百万美元)	陆軍支出 (单位: 百万美元)	海軍支出 (单位: 百万美元)	出口額		
					粮食	原料	工业品
					对出口總額的百分比		
1880	50	1724	38	14	56	29	15
1890	63	725	45	22	42	36	21
1900	76	1023	138	56	40	24	35
1907	86	894	125	98	28	32	40
1908	87	897	140	119	28	30	42

我們看見，国債整个說来沒有增加。截至 1890 年，它有了显著的减少。从 1890 年起，由于对西班牙的战争，国債也像陆軍支出一样开始增长。但是到了 1907 年，尽管陆海軍的支出增长了，国債却重新减少。

上面的表告訴我們，美国的工业品出口額是在如何迅速地增长，美国如何日益作为工业国而不是作为农业国出现在世界市場上。

德国的商品出口總額在 1908 年达七十亿馬克，其中工业品占四十三亿馬克(即百分之六十二)。在美国的国产商品出口總額八十亿馬克(十八亿三千五百万美元)中，工业品占三十亿馬克(七亿五千万美元)以上。在 1890 年，德国的工业品出口額为二十一亿四千七百万馬克，而美国的工业品出口額只有八亿馬克(一亿七千九百万美元)左右。因此，在同一时期，德国的出口額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而美国則增加了百分之三百。

由此可見，美国作为一个工业国，已經开始紧紧地追上我們。

美国在 1900 年到 1908 年期间，国債額减少了一亿三千万美元(五亿馬克)，而德国則在同一时期增加了十五亿馬克。从那时以后，支出和賦稅又有了增加(增加了五亿)，但是仍然添不滿

战神的欲壑。

这个重担首先压在工人阶级的肩上，对工业也发生着有害的影响，使竞争发生困难；而这又反过来打击了工人，因为在竞争中首当其冲的正是工人。但是对工人的压迫也有它的不能超越的一定界限，因此军备竞赛归根到底必将使工业的发展陷于瘫痪状态。

同时，军备竞赛也使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并且加强战争的危險，虽然据说它的目的在于维护和平。不断的、疯狂的扩军备战，对各国政府说来越来越变得不能忍受了，但是却没有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把它们所推行的对外政策看作是扩军备战的原因。它们要这样看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政策是资本主义的最后支柱。因此，各国的统治阶级都极力把罪过推到别人身上，——德国人把罪过推到英国人身上，英国人则把罪过推到德国人身上。因此，普遍的神经过敏和相互猜疑日益加强，而这反过来又促进更加疯狂的军备竞赛，直到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惨痛的结局胜过没有结局的惨痛。

如果不是革命的二者择一较之在武装和平之后更有可能在战争之后发生，这种形势早就要导致战争了，因为除了革命以外，只有战争才是各国从疯狂地虚费国帑的状态中摆脱出来的唯一出路。近三十年来，无产阶级的日益增长的力量，阻碍了任何战争在欧洲的爆发，而现在更迫使各国政府顾忌战争。但是各国正在不可遏止地走向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枪炮终将自行开火。

另外一个因素也在这方面起着作用；这个因素比军备竞赛更加使世界政策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失去发展的最后可能性。

认为只有欧洲文明各国的人民才能独立发展这样一种观

念，是殖民政策或帝国主义的基础。他们按照对待自己持友好态度的程度，把其他种族的人分别看做幼儿、白痴或牲畜，但总归是可以任凭自己支配的下等生物。甚至社会主义者，只要一开开始执行殖民政策（当然是在道德的基础上），便也抱着这种看法。但是事实很快就告诉他们，我们党关于一切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不是空洞的辞句，而是极其现实的力量。

固然，处于欧洲文明之外的民族，近几百年来几乎处于无防御的状态，并且不能进行长期的抵抗。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地落后，像妄自尊大——这种妄自尊大在我们的种族主义理论家的鬼话中得到科学的表现——的欧洲资产阶级所认为的那样。这些民族只不过是欧洲技术的优势以及归根到底仍然是以技术为基础的欧洲天才的优势所压倒罢了。处于欧洲文明之外的民族，除了只有万余人口的少数最落后部族外，完全能够接受欧洲的文明，但是迄今为止他们一直缺乏必需的物质前提。

资本主义的传播，长时期来几乎没有给现存的情况带来任何变化。资本主义输出业者最初只是把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而不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本身，输出到处于欧洲文明之外的地区（当然，现在的美洲和澳洲也是在欧洲文明之内的）。同时，这种地区主要地限于毗连水路干綫、海岸和几个大河沿岸的地区。但是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对海外领地的政策方面开始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工业国对落后国的产品输出，这些年来也变为现代工业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的输出。

我们知道，这一时期的铁路建设，特别是在东方（包括俄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此外，纺织业、冶金业和矿业这样一些资本主义工业在那里也得到了同样迅速的发展。矿业使南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上一世纪80年代后半期起，生产资料的输出保证了资本

主义工业的新繁荣。在 80 年代前半期，工业品出口方面的实际情况表明，资本主义工业已经不能进一步发展了。但是，生产工具的输出使资本主义工业得到新的、完全出乎预料的、辉煌的发展。这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生产工具的输出，保证了处于欧洲文明范围之外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并且迅速地消灭了那里从过去保存下来的旧的经济关系。但是同时，这也使东方传统的思想方式宣告终结。随着从欧洲传来新的生产方式，迄今处于野蛮状态的各族人民的精神能力也突然发展起来，并且达到了欧洲的水平。但是不能够说，那里风起云涌的新思潮是充满着对欧洲的热爱。新的国家成了旧的国家竞争者，而竞争者总是敌人。欧洲精神在东方国家的传播，不是使这些国家成为欧洲的朋友，而是成为欧洲的平权的敌人。这种情况并不是一下子就表现出来的。我们从上文中已经知道，对力量的自觉在社会生活中是起着很大作用的；那些虽然拥有足够的独立自主能力，但仍然没有自觉到自身力量的新兴阶级或民族，势将长期受人支配。这种情况甚至在目前也得到证实。由于欧洲民族常常战胜东方民族，使得后者认为对欧洲民族的任何抵抗都是徒劳的。欧洲人也抱着这种看法。他们的殖民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看法上面的。这种殖民政策使他们能够支配其他民族，像牲畜一样贩卖和交换这些民族的人民。

但是一旦日本人首先打破僵局，便马上影响到整个东方。整个东亚和伊斯兰世界都已经奋起，并且开始执行抵抗任何外来统治的独立政策。

这就使帝国主义的发展受到阻遏。它现在仍然在停步不前。但是帝国主义是必须向前发展的，正像为了使资本主义剥削不致成为完全不可忍受而必须日益扩展资本主义一样。

赤道非洲是可以实行帝国主义扩张的硕果仅存的地区。那

里的气候是当地人的最好的盟友；欧洲的士兵不能在那里进行战斗，因而欧洲人必须招募当地人作为雇佣军；这就造成了一个因素，以致有朝一日这些雇佣军会掉转枪口对付自己的长官。

在亚洲和非洲，到处充满一种叛逆的精神，欧洲的武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对欧洲的剥削的抵抗也日益增长。向任何一个国家移植资本主义剥削，都必然地同时在那里留下反抗这种剥削的火种。

这首先表现为推行殖民政策的日益困难和殖民政策支出的不断增长。我们的殖民主义狂信者安慰我们说，殖民地现在加在我们身上的重担，会为将来的丰富收入所补偿。实际上，为保持殖民地所必需的军费支出今后还将不断地增长。而且事情还不仅限于此。亚洲和非洲的大多数国家都日益接近于这样一种时刻，那时候一时的愤怒将转变为公开的、持久的愤怒，并且终将推翻外来的压迫。英国在东印度的领地最接近于这种状况；而失去这些领地，对英国说来就意味着破产。

我们已经着重指出过，从日俄战争时起，东亚和伊斯兰世界已经奋起反击欧洲的资本主义。这样，他们就是在同欧洲无产阶级的同一个敌人进行斗争。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虽然在跟同一个敌人进行斗争，却有着他们自己的不同目的。他们起来斗争，不是为了使无产阶级战胜资本主义，而是为了使国内的民族资本主义能够同外来的资本主义相抗衡。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当存任何幻想。正像波尔人\*是最凶恶的吸血鬼，而日本的统治者是社会主义者的最疯狂的迫害者一样，青年土耳其派也认为对付罢工工人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必须批判地对待欧洲资本主义的欧洲以外的敌人。

---

\* 南非的荷兰殖民者的后裔。——译者



但是这决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們会削弱欧洲的资本主义及其政府，并給世界局势带来政治动蕩的因素。

我們知道，从 1789 年到 1871 年期間，在工业资产阶级还没有为自己爭取到迅速发展所必要的政治条件以前，欧洲一直处于动蕩不安之中。从日俄战争时起，亦即从 1905 年起，东方也进入了这种持續的政治动蕩时期。东亚和伊斯兰世界各国人民，以及俄国各族人民的状况，現在在許多方面与 18 世紀末和 19 世紀初的西欧资产阶级的状况类似。当然，两者的条件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差别首先就在于，時間已經差了整整一个世紀。一国的政治发展，不仅取决于該国内部业已形成的社会条件本身，而且取决于对該国发生影响的整个周圍世界的条件。在俄国、日本、印度、中国、土耳其和埃及等国的各个不同阶级之間，可能存在着大革命以前的法国的各个不同阶级之間所曾經存在过的那种关系。但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在这一时期所已經取得的阶级斗争經驗，却会对他們发生影响。此外，他們爭取本国资本主义生产的有利条件的斗争，同时也就是反对外国資本和外来压迫的斗争，而这个斗争是 1789—1871 年革命时期西欧各国人民所无須进行的。

这些差别使东方不致简单地重演百年以前在西方所曾經发生的那些事变。尽管如此，形势的相同点却是如此之大，以致东方現在也正在开始一个类似的革命时期，即密謀、政变、叛乱、反动、新的叛乱和不断的动蕩的时期，而在这个地区还未建立起足以保证自由的发展和巩固的民族独立以前，这个时期是会繼續下去的。

由于世界政策的推行，东方——就这个詞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已經在政治方面和經濟方面同西方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使得东方的政治动蕩也会引起西方的不安。各国費了很大力

气才争取到的政治均势，现在由于这些国家所无力对之发生影响的意外变化而变得不稳定；被认为不可能和平解决因而被束诸高阁的那些问题，例如对巴尔干各国的关系问题，现在突然重新发生并且要求限期解决。惊慌不安、互不信任、普遍的无信心，以及原来就被军备竞赛弄得十分紧张的神经过敏状态，都达到了顶点。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而近几十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战争也就意味着革命，它将引起极其重大的政治变革。恩格斯早在 1891 年时曾经认为，即使可能引起革命并且可能使我们取得国家政权的战争爆发起来，对我们说来也不是什么大走红运的事，因为时机还不成熟。在一段时期里，无产阶级与其在战争所引起的革命上冒险，还不如利用现存的国家基础更能稳步前进。

从那时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产阶级现在已经强大到可以更加平静地等待日益迫近的战争了。既然无产阶级已经从现存国家基础吸取了它所能从那里吸取的全部力量，既然这个基础的改造已经成为无产阶级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那末就不能再说什么为时尚早的革命了。

无产阶级对战争是深恶痛绝的，它要尽一切努力不听任战争情绪的发展。虽然如此，如果战争终于爆发，那末现在无产阶级已经可以满怀对未来的希望等待战争的结局了。

从 1891 年起，无产阶级不仅在人数上增长了，在组织上巩固了，而且在道义上也取得了巨大的优势。二十年前，德国社会民主党还面对着帝国的统治者在争取创建帝国的斗争中所赢得的巨大威信。现在，这种威信已经烟消云散了。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思想越是遭到更大的破产，社会民主党便越会成为争取实现伟大思想和伟大目的，并且能把导源于这种思想的能力和忠诚发动起来的唯一政党。

相反地，在敌人的队伍里面，由于意识到他们的领袖为贪污

受賄和愚昧無知弄得日益退化。正在瀰漫着一種怯懦和消沉的情緒。他們越來越不相信自己的事業和自己的領袖的正義性，這些領袖正是在形勢變得日益困難的現在，越來越表現出而且今後還要不可避免地表現出自己的庸碌無能，越來越暴露出自己的毫無價值。

不能認為這是偶然的或者是個別人物造成的；原因就在於情勢本身。

這裡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只要階級或國家一旦從革命階段過渡到保守階段，只要它一旦不再為自己的生存或鞏固而鬥爭，而開始滿足於現狀，只對現狀做微小的改善，它的思想領袖和領導者的精神眼界便會馬上變得狹窄起來。他們對重大問題的興趣消失了，他們的胆略不見了；勇敢的思想家和戰士被看做不穩分子並受到冷遇。而勾心鬥角和優柔寡斷則大為盛行。

此外，那些不需要再為偉大理想而鬥爭的階級和國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已經不再有對於一般階級利益和整個社會利益的無私關懷，而只是關心自己個人的利益。鼓舞那些爭奪政權的人的，已經不是為社會創造某種偉大的新事業的願望，而只是為自己爭取榮華富貴的野心。他們的無恥的升官發財思想，還表現在當權人物不願意那些最能夠為公共事業服務的人留在自己身邊，而只喜歡那些最善於阿諛逢迎自己的個人需要和愛好的人。

除了一切當權者在保守階段都有的這些道德衰退和智力衰退的一般原因以外，還有來自資本主義的特點的特殊原因。

從前，剝削階級同時也就是統治階級。至少，它們也在國家機關中佔據着主要的地位。相反地，資本家階級則由於埋頭於自己的齷齪勾當，而把政治交給那些實質上不過是他們的幫辦的人：在民主國家交給那些千練的政客、國會議員和新聞業者；在專制國家交給廷臣，而在處於中間狀態的國家，則交給這些分

子的混合体，在这个混合体中有时是前者占优势，有时是后者占优势。

当资本主义剥削还为数甚微之时，资本标榜“积累”的口号，而且力图把这一口号强加给国家机关。小资产阶级不管愿意与否总得忠于这一口号；相反地，大资本则随着剥削的加紧而日益挥霍和奢侈，这种挥霍和奢侈终于采取了像军备竞赛那样的疯狂的速度和荒谬的形式。

从前，国家的统治者，就其富有和奢侈来说，是他的全体臣民所望尘莫及的。现在，甚至盘踞最高地位的政治家和国事活动家，在这方面也日益为金融界的巨头所超过。当权的国事活动家要用国库款项来提高自己的正常收入已经不那么简单，特别是在议会制国家里，因为在那里必须重视呼吁实行节约的选民和纳税人的意见。国家收入的增长额中军备用款越大，要做到这一点也就越加困难。

如果政治活动家和国事活动家不愿意在自己的生活排场方面落后于花销越来越大的大剥削者，他们就只有在合法的收入来源以外，利用自己在国家中的势力舞弊营私，寻找非法的收入来源。他们利用自己对国家机密的熟悉和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来进行市场投机；他们利用大剥削者的好客来过寄生式的生活，要大剥削者替他们支付债款，而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直接接受贿赂，出卖自己的政治权力。

这种坏现象是普遍的，它在一切有大剥削者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极为流行。它首先侵入最有势力的政治机关：在民主国家里是国会议员和新闻业者，而在专制国家里则是宫廷集团。它到处引起深刻的道德败坏；资本主义剥削和铺张浪费越是严重，政治活动家和国事活动家的欲望越是增长，国家政权越是强大，国家政权的经济职能越是宽广，这种道德败坏现象便越是迅速

地腐蝕周圍的一切。

当然，不能认为那些沾染了贪污腐化习气的人都能意識到自己的墮落，也不能认为統治階級的政治活动家和国事活动家都是出卖节操的人。如果这样认为，那便是夸大其詞。但是，贪污腐化这种歪風邪气正在这些集团中日益增长，以致需要有越来越大的意志力，才能不为这种歪風邪气所熏染；而贪污腐化的風气越是盛行，贪污腐化的手法越是高明和隱蔽，以致沾染这种习气的人也感觉不到自己的墮落，那末沾染这种习气也就越加容易。

总之，我們知道，随着政治問題的日益复杂化，日益要求国事活动家有淵博的知識、严肃认真的作風、坚毅果断的精神和寬广的眼界。但是，正是在这种时候，在統治階級中，科学的态度却日益为夸夸其談所代替，认真作風日益为輕率馬虎所代替，爭取达到崇高目的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日益为个人的升官发财主义和勾心斗角所代替，沉着果断的坚毅精神日益为不断地搖摆于公开的殘忍和怯懦的退縮之間所代替。同时，貪得无厌和贪污受贿的風气也日益发展；这既表現在巴拿馬运河舞弊案的可耻事件上，又表現在当权者同騙子的勾結上，更几乎普遍地表現在軍用物資供应者的舞弊上：有的人供应不牢固的装甲板，有的人供应不能使用的大炮，有的人則从本国敲取两倍于外国的价錢。軍事供应早就成了許多資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軍事物資供应者从来没有像現在这样同政府保持着如此紧密的联系，对决定战时和平时的各种問題的政策发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現在，这些供应者还是最大的工业家，是无产階級的最大的剝削者。他們最感兴趣的是反对国内敌人或国外敌人的殘酷战争，并且对于那些由見風使舵分子組成的政府发生最大的影响。

因此，任何国家都必须随时准备迎接来自邻国的挑衅或进

攻，而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必须随时准备迎接来自本国统治者的挑衅或进攻，而且是可能引起难以弥补的灾难的进攻。这一切都可能影响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新的动向。

当然，统治阶级的道德败坏是在劳动人民所无从接近的圈子里实现的。为了揭穿制度的全部腐朽性，需要有像日俄战争那样的大灾难。平时，只有当什么事情弄巧成拙的时候，整个黑幕才被羞答答地掀起一角。这种暴露对无产者的阶级觉悟不发生多大的影响。他们早就对统治阶级抱着敌视的态度，并且对统治阶级的道德品质根本不存任何幻想。

小资产阶级则是另一回事。他们越是背叛自己的民主传统，越是托庇于自己的政府并期待它给予援助，越是信任自己的政府，认为它是不可动摇的，那末当他们知道这些政府的堕落的时候，当这些政府威信扫地的的时候，他们的失望也就越大。

同时，大资本主义卡特尔对小资产阶级的迫害越来越加紧，而国家对小资产阶级的钱袋的需索也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决不会有助于加强小资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的信任。

但是，当统治者的庸碌无能、敷衍塞责和贪污腐化轻率地导致惨祸、战争和政变，因而使国家遭受无可计量的灾难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最后终将不能遏止自己的愤怒。那时候，小资产阶级的盲目的愤怒将立即指向当时的当权人物，而且他们过去越是觉得自己的统治者尊严和伟大，这时的愤怒也就越是强烈和无情。

近十年来，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憎恨无疑地加强了。因此，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政策中应该估计到，它将不得不单独地进行未来的战斗。马克思便曾着重指出过，小资产者作为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间的中间环节，经常摇摆于两者之间，有时靠攏这一方面，有时靠攏那一方面。我们对他们不能寄托任何希望，整

个說来他們总是靠不住的；虽然个别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可能成为优秀的党员，但是小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敌视可能仍然继续增长。但这并不排斥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有朝一日小资产阶级会由于难以忍受的赋税负担的重压和当权人物的意外的道德崩溃，而整个转到我们方面来，并且或许能够从而清除我们的敌人，保证我们获得胜利。不过，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小资产者将不能做出更合理的举动，因为胜利的无产阶级将大大改善一切非剥削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以及现在在小资产者或小农的地位上苟延残喘的人的生活。

不管小资产阶级目前怎样敌视我们，他们决不願意成为现存制度的巩固支柱。和社会的其余一切支柱一样，小资产阶级也正处在摇摇欲坠和四分五裂的状态中。

人民越来越对现存制度的巩固性失去信心，而实际上现存制度的巩固性也正在日益削弱。可以感觉得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普遍动摇的时期；而由于这种状况已经继续了整整一代的生活期间，所以不能再继续发展下去；迅速地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的目前状况，不可能再继续保持一个世纪之久。

但是，在这种普遍动摇的形势下，无产阶级的最近任务是摆得十分明确的。我们已经揭示了这些任务。无产阶级如果不改变它据以进行斗争的国家基础，就将不可能继续前进。德国无产阶级的最近任务，就在于采取最坚决的行动，争取在整个帝国和个别邦国（如普鲁士和萨克森）确立民主；它的最近的国际任务，就在于反对世界政策和军国主义。

我们为了解决这些任务而拥有的手段，也和这些任务一样是明确的。除了以前我们曾经采取过的各种手段以外，现在又加上了群众性的罢工；我们还在 90 年代初期就从理论上承认了这种罢工，而从那时以来它在有利条件下所具有的效果，也一再为

實踐所證明。如果說自從1905年的那些光榮的日子\*以來，群眾性罷工已經多少退居次要地位，那末這只是證明，總罷工不是在任何條件下都可以收到效果的，而在任何情況下都採取總罷工將是愚蠢的。

在這方面，形勢是很明顯的。但是，在談到未來的戰鬥時，應該考慮的不僅僅是無產階級；在這個戰鬥中起作用的還將有許多現在完全無法估計的其他因素。

無法事先估計我們的國事活動家的立場；他們迅速地更替，他們的情緒也迅速地發生變化。不應當指望他們有首尾一貫的、目標明確的政策。

也無法事先估計小資產階級群眾的動向，他們時時從一方面跑到另一方面，以致我們的秤盤也要隨之不停地上下擺動。

更難估計的是千頭萬緒的對外政策，因為對外政策涉及到許多國家，而這些國家的對內政策所特有的不穩定性，是要更加強烈地影響到它們的對外政策上面的。

最後，對東方各國所發生的變化也是無法做任何估計的；在這些國家中，有許多新的、過去沒有研究過的因素在開始發生作用。

現在，這一切因素在不斷地、最緊密地互相發生作用；這些因素將在今後為我們造成許多意想不到的情況。

但是，在這種普遍動搖的情勢下，社會民主黨本身越是屹立不搖、堅持不渝，那末它也就越會鞏固壯大起來。與不穩定的、依情緒為轉移的政策相反，社會民主黨的理論越是能保證它採取首尾一貫的、目標明確的實際活動，它就越能提高工人群眾對自己力量的自覺。社會民主黨越是在一切權威掃地的時期表現

---

\* 1905年初魯爾煤礦工人曾舉行群眾性罷工，同年9月社會民主黨耶拿代表大會曾通過總政治罷工的決議。——譯者



出毫不动摇性，它自己的威信也就提得越高。而且，它对统治阶级的贪污腐化现象越是采取不调和的反对立场，那末在普遍的腐朽已经浸透了仅仅为讨好政府而完全放弃自己原则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对它的信任也就会愈益加强。

社会民主党越是坚定不移、始终不渝和毫不调和，它就越能更迅速地战胜自己的敌人。

在“反动群众”这个概念已经变成现实的现在，要求社会民主党参与联合政策或联盟政策，就等于要求社会民主党实行政治自杀。在资产阶级政党出卖节操和大肆糟蹋自己声誉的现在，希望社会民主党用同资产阶级政党结盟的政策来束缚自己，希望它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起来助长这种出卖节操的勾当，那就无异于要求社会民主党实行道德自杀。

热心的朋友们生怕社会民主党可能通过革命过早地取得国家政权。但是依我们看来，只有在革命以前，亦即在无阶级夺取到真正的政权以前就取得国家政权的假象，才能够算是过早地取得政权。在还没有夺取到真正的政权以前，社会民主党要参加国家政权，就只能向资产阶级政府出卖自己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任何时候也不会从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争取到几个締結卖身契的議員罢了。

凡是把社会民主党看做无产阶级解放的工具的人，都应该最坚决地反对自己的党参预这种腐败勾当。如果说有什么手段能够使人民群众中一切正直的人失去对我们的信任，使一切能够参加并决心参加无产阶级各阶层的斗争的人轻视我们，并且能够阻碍我们向前发展，那就是社会民主党采取联盟的政策。

那时候，将只有把我们的党看做是追求个人名利的阶梯的分子，亦即滿腦子升官發財思想的官迷，才会大走红运。我们越是少招揽这样的分子，我们越是对他们敬而远之，对我们的斗争

也就越有好处。

除了这里已經談过的以外，关于这一斗争的細节恐怕未必再能談出任何确定的东西。从来都沒有像現在这样难于預言未来发展形式和速度，因为除了无产階級以外，与未来发展有关的一切因素，現在都是这样地不确定和这样地无法估計。

只有普遍的动摇是确实可信的。可以确信，我們已經进入了普遍动荡和不断政治变革的时期；这个时期，不管它所采取的形式和所延續的时间长短如何，在无产階級还没有蓄积起足够的力量来从政治上和經濟上剝夺資本家階級，从而为世界历史开辟一个新紀元以前，是不会轉入較长的稳定时期的。

当然，很难說这个革命时期是否会像从1789年开始一直延續到1871年的資产階級革命时期那样延續得很久。現在，事业比以前更加迅速地向前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斗争舞台也空前地扩大。当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曾經认为只有西欧是无产階級革命的舞台。現在全世界都成了这种舞台。現在，不仅在史普勒河和塞納河的两岸，而且在哈德孙河和密士失必河、涅瓦河和达达尼尔海峡、恒河和黃河的两岸，都正在进行着劳动人民和被剝削人类的解放斗争<sup>44</sup>。

和斗争舞台是宏偉巨大的一样，这一斗争所追求的終极目的——世界經濟的公有組織——也是宏偉巨大的。

而且，在这个剛剛开始的、可能延續整整一个世代的革命时代終結的时候，无产階級同它进入这个时代时相比将变成完全另外一个样子。

如果說，无产階級的精华在今天已經联合到最巨大的自由組織中的、欧洲各文明民族人民中最坚强、最有远見、最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和最勇敢的一部分，那末，它在斗争中和由于斗争的結果，将把一切階級的最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和最有远見的分

子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并在自己的队伍中組織和教育甚至最落后的分子，使他們树立起对本身力量的希望和信心。它将使自己的最优秀的儿女攀登文化的頂峰，使他們能够領導最偉大的經濟改造，消灭全世界由于奴役、剝削和愚昧而产生的一切貧困。

那些能够参加这个偉大斗争并分享光荣的胜利的人是幸福的！

## 斯拉夫人和革命<sup>45</sup>

从“三月起义”<sup>46</sup>这一革命斗争时起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这段时间在社会生活中是不算长的，——然而，整个世界却把我们从这个时代划分开来。那时以来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可以用斯拉夫人对革命的态度来最清楚地加以说明。

1848年时，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斯拉夫人还是“反动的群众”。如果撇开波兰的小贵族和知识分子不谈，那末可以说，斯拉夫人的一部分曾经抱着不关痛痒的态度观望争取人民自由的伟大斗争，而另一部分则为了挫败自由事业而投入这个斗争。斯拉夫人极其成功地达到了这个目的。革命的命运早在“六月起义”<sup>47</sup>时期的巴黎就被决定了。但是，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所以被那样彻底粉碎和消灭，奥地利的专制制度所以能完全恢复自己的统治，则应归罪于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俄罗斯军队的干涉。1848年10月维也纳的陷落和匈牙利军队在维拉豪斯附近（1849年8月13日）向俄国将军巴斯凯维契的投降，对东方的革命说来，是和西方的六月屠杀一样的决定性失败。

不管德国革命家具有如何强烈的国际团结的思想，他们却不能抑制对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的极大仇恨，把他们看做是各族人民中的败类。这也是毫不足怪的。在他们看来，革命必须战胜这些败类。斯拉夫人被认为是奴隶民族，被认为是天生要被奴役的民族。

但是，斯拉夫人从事反革命行动的原因不在于神秘的、天生

的奴隶性，而在于他們所生活于其中的經濟条件。除了捷克人以外，他們全是根本不能理解資產階級社会的政治要求和社会要求的純农民民族。固然，在波希米亚已經有发达的城市生活和資本主义大工业，但是捷克民族却是由农民、小市民和沒有階級觉悟并且就思想眼界說来跟着小市民的尾巴跑的无产者构成的。的确，小資產階級在1848年时还是个革命階級，但早在那个时候它已經到处暴露出自己是不可靠的了。半資產者、半无产者、小資產者，时而把自己想成这个，时而把自己想成那个；时而投身革命，时而投身反动；时而卷入革命的怒潮，时而流于奴顏婢膝，絲毫沒有一个穩固的立場。捷克的小市民就是这样：他們最初表現出自己的革命方面，而后来則表現出自己的反动方面；他們在七月曾起来反对温第什格萊茨<sup>48</sup>（他因此曾炮轰布拉格城），而在十月，当这同一个温第什格萊茨去对付他們所仇恨的維也納时，他們又对他表示同情。

当然，这种行徑，除了小資產階級的不可靠性以外，还取决于民族的对立。在捷克的农民、小市民和无产者看来，德国人是敌人、剝削者和压迫者。在波希米亚，不仅資本是德国的，而且官僚、僧侶和軍隊的上层以及大部分貴族也都是德国的。同时，在波希米亚，革命也是德国的产品，革命的代表者是德国人，而革命的目的則是統一和加强德意志民族！捷克人民在短时期的革命陶醉之后投入反革命的怀抱，这是不足为怪的。

現在，这一切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从1848年起，資本主义不仅在德国为自己开辟了道路，而且在斯拉夫民族那里也为自己开辟了道路。資本主义已經完全征服了大部分斯拉夫世界，并且不仅在德国和波兰得到迅速的发展，而且在俄国以及斯洛文人、克罗地亚人和塞爾維亞人那里得到迅速的发展。資本主义在到处制造无产者，造成資本和劳动之間的对抗关系；从这

种对抗关系中早晚要发展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而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必然就是革命的政策。

因此，斯拉夫人被认为是奴隶性的化身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他们现在已经跨进拥有革命阶级的民族的行列，在他们内部现在正为解放工人阶级、同时也为解放全人类进行着伟大的文化斗争。

不仅如此，我们在上面指出的斯拉夫民族的改造，几乎在二十五年以前便已为举世所公认。现在可以认为，斯拉夫人不仅已经跨进革命民族的行列，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重心正在日益转向斯拉夫人。

革命的中心正在从西方移向东方。19世纪前半期，革命中心曾经在法国，有时则在英国。1848年，德国也跨进革命民族的行列，而英国则在不久以后脱离了行列。从1870年起，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开始失去它的最后一点点革命性。从那时起，做一个革命者和做一个社会主义者，变成了同义词。正是在这个时代，随着普法战争之后而发生的许多事件，把社会主义以及欧洲革命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向了德国。

新的世纪开始时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使人们感觉到我们正在面对着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亦即移向俄国。

早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俄国革命家<sup>49</sup>的英勇斗争便曾一度震惊整个欧洲，并对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最深刻的影响。

除了巴黎公社的起义和它的英勇灭亡以外，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它反对“伟大的”俾斯麦的斗争中的那种神速壮大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少数俄国革命家反对专制恐怖力量的那种无畏的、有时是极其成功的殊死斗争那样，给与70和80年代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如此有益的影响，并且如此地鼓起它的

斗志和自我牺牲精神。

由于没有一个革命的阶级做后盾，这场殊死的斗争终于以战士的枯竭而告终。

但是从那时以来，新一代英雄人物已经在俄罗斯民族中成长起来，并且现在已经不再是孤军作战了。在沙皇帝国中，强大的无产阶级正在成长，它本身产生着英雄人物并且给予来自其他人民阶层的革命英雄以支持，这种支持是他们从前所没有的。因此，我们正在面临着俄国革命斗争的新时代；这个斗争是在比二十五年前更广泛的基础上爆发的，但是在战斗的激烈性上，在压迫者的野兽般的残忍性和卑鄙性上，在革命家的英勇精神和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上，都较之以往时期俄国革命运动的斗争毫无逊色。

但是，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俄国的武力对武力的斗争。不，同拳头的革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还正在进行着头脑的革命。觉醒的各人民阶层都热烈地渴望知识，力求弄清楚自己的历史任务，借以着手解决最复杂、最大胆的问题，并且站在日常斗争的细微末节之上，高瞻远瞩这一斗争所追求的伟大历史目的。

我们可以指望，这种智慧的高涨将产生出必然要影响到西欧的丰功伟业。从西方接受了革命首创精神的俄国，现在可能成为西方革命动力的泉源。热火朝天的俄国革命运动，看来可能成为清除那种开始在我们队伍中流行的萎靡不振的庸人态度和谨小慎微的政客伎俩的最强大手段，从而迫使斗争的渴望和对我们的理想的耿耿忠忱重新像烈火一般燃烧起来。

对西欧说来，俄国早就不再是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简单支柱了。现在的情况无宁说恰恰相反。西欧正在成为俄国的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支柱。朽烂的沙皇宝座正在摇摇欲坠，如果不是西欧资产阶级不断用成百万的金钱来重新加固这个宝

座<sup>50</sup>，恐怕它早就崩潰了。1848年，沙皇曾經向歐洲派送強大的援軍來鎮壓歐洲資產階級的起義；現在，這同一個資產階級又在給予俄國以強有力的支持，幫助沙皇鎮壓國內的一切愛好自由的運動。俄國的革命家如果不是必須同時跟沙皇的盟友——歐洲資產階級——進行鬥爭，他們或許早就取得了戰勝沙皇的勝利。

我們希望，他們這次能夠戰勝自己的敵人，而新的“神聖同盟”<sup>51</sup>將比它的前身更快地崩潰。不管俄國當前鬥爭的結局如何，在這一鬥爭中死難的烈士（遺憾的是，這種死難者的數目是過於多了）所犧牲的鮮血和幸福是不會歸於泡影的。他們的鮮血滋潤着整個文明世界的社會變革的幼苗，促使它茁壯地、迅速地成長。

在1848年時，斯拉夫人曾經是摧殘人民之春的花朵的嚴寒。現在則可能成為融解反動冰層、給人民帶來新的幸福春天的暴風雨。



## 注 釋

1 摩連布萊赫爾, 麦克斯·亨利——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考茨基和摩連布萊赫爾关于对改良主义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和倍倍尔的观点的評價問題的爭論, 以及关于議會活动和預算等問題的爭論, 刊載在 1908 年第 1、4、6、7、8、11 期《新时代》上。——第 11 頁

2 《新时代》(«Neue Zeit»)——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杂志, 1883 年至 1923 年出版于斯图加特。1917 年以前考茨基曾任該杂志編輯人。自 90 年代后半期起, 在恩格斯逝世之后, 該杂志經常刊載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1914—1918), 該杂志采取中間立場, 搖摆于馬克思主义者和公开社会沙文主义者之間, 实际上則支持后者。——第 11 頁

3 考茨基指的是他的小册子《社会革命》。他在那本小册子中論叙了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說, 闡明了革命和进化的問題, 以及各个历史时代革命的特点; 考茨基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資產階級民主、資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階級在階級斗争中的地位以及无产階級革命等問題上面。——第 12 頁

4 《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是俾斯麦利用 1878 年两次謀杀德皇威廉一世的事件而提出的, 曾由帝国議會于 1878 年通过。威廉虽然只受輕伤并且很快痊愈, 反动集团却大肆迫害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法令禁止了社会民主党組織及其活动, 禁止社会民主党出版报纸、杂志和宣傳文件。根据这个法令,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积极活动家都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法令于 1890 年廢止。——第 18 頁

5 俾斯麦, 奥托·馮·双豪森, 公爵(1815—1898)——反动的普魯士国事活动家、工人运动的最凶恶的敌人。1862 年任首相, 用“铁血政策”領導了普魯士容克地主爭取在普魯士领导下統一德国的斗争。經過了同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 于 1871 年 1 月建立起德意志帝国, 由俾斯麦自 1871 年至 1890 年 3 月任宰相。俾斯麦是 1871 年武装干涉和鎮压巴黎公社的組織者之一。——第 19 頁

6 欧文, 罗柏特(1771—1858)——卓越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馬克思主义的先驅者之一。1800 年至 1829 年在苏格兰的紐拉納克管理一个大工厂。他改善了他所管理的工厂的工人的劳动条件, 把工作日从 13—14 小时縮短到 10.5 小时, 創辦了工人子弟学校、托儿所和幼儿园。1825 年他在美国組織了一个名为“新协和”的

共产主义新村。新村失败后返回英国，在英国参加了合作社运动。欧文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私有制、竞争、阶级划分和工人的贫困化。他把未来的社会想像为一种社会主义公社的联合体，这些公社把农业和工业生产结合起来，在那里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能力劳动并按照需要获得产品。欧文否认阶级斗争和革命是改造社会的手段，他不理解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他认为普及教育是改造社会的基本方法。——第 21 页

7 傅立叶，沙利(1772—1837)——卓越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尖锐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制度，认为这种制度在一个极端产生穷奢极侈和游手好闲，而在另一个极端则产生群众的贫困，压制人的思想和感情，使人得不到全面的发展。他认为，保证人们的一切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主义应该代替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人都将有劳动的权利，而劳动本身也将成为人的需要和享乐。新社会的条件使人们可以从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消除终生束缚在一种职业上的现象；并将创造出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和极为丰富的产品，这些产品除了分给资本家的部分以外将按照劳动和才能加以分配。傅立叶徒劳无益地向富人呼吁，要他们帮助进行自己的社会主义实验。他不懂得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认为教育及和平手段是新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的唯一途径。傅立叶的社会主义学说，同圣西门和欧文的学说一起，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第 21 页

8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1809—1865)——小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和社会学家、庸俗经济学家、法国无政府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同时，却捍卫小私有制。他认为商品交换形式是劳动者贫困状况的根本原因。为了消除这种交换形式，他提出了把社会建立在相互服务、无息信贷和交换银行基础上的空想主义理论。蒲鲁东建议不要消灭商品交换和剩余价值，而要清除对资本主义的滥用和危机，使私有制永世长存。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批判了蒲鲁东的观点。——第 21 页

9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1805—1881)——法国革命家，1830年、1848年、1870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一些反对国王政权和资产阶级政权的秘密阴谋组织的领导者之一。他认为，只要通过少数革命家的阴谋建立起他们的专政，就可以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和消灭对劳动人民的压迫，而无须广大群众参加革命。1839年5月12日和1870年10月31日两次举行这种政变，都被政府迅速镇压下去了。这种单靠少数革命家的阴谋而轻视同群众和具体环境的联系，并低估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的理论和策略，在工人运动中被称为布朗基主义。——第 22 页

10 考茨基对无产阶级胜利的条件抱着一种不正确的观点。他和西欧社会主义政党的其他领导者一起，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首先在无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

資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例如,德国、法国、英国或美国)获得胜利。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无产階級革命首先在俄国获得了胜利;俄国虽然是一个中等发展程度的資本主义国家,但是却有着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领导的强大的无产階級革命运动,有着工人階級同劳动农民的联盟。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的学說的正确性,推翻了社会民主党的陈腐教条。——第 22 頁

11 关于科倫共产党人审判案的小册子是指 1853 年馬克思所写的《揭露科倫共产党人审判案》一文。1852 年 10 月 4 日至 11 月 12 日在科倫进行的共产党人审判案,是根据普魯士警察的各种阴谋和伪证捏造出来的。普魯士反动派想借助于对十一名“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員的司法迫害,来打击德国无产階級的革命部分。——第 23 頁

12 伯恩斯坦,爱德华(1850—1932)——修正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右翼的领导者,苏联的敌人。他在恩格斯逝世后公开修正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原理。伯恩斯坦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1902)一书中,要求社会民主党放棄馬克思主义的經济学說、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理論,以及馬克思主义的其他基本原理。他提出了“运动就是一切,終极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个口号,用改良主义来頂替无产階級的革命斗争。他捍卫資产階級民主,反对革命暴力,认为只有議會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才是无产階級的基本斗争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同考茨基一起采取了中派的立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反对苏联的苏維埃政权。——第 29 頁

13 倍倍尔,奥古斯特(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創始者和杰出活动家之一。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倍倍尔同李卜克內西一起創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了德国无产階級的斗争。他在議會中保卫巴黎公社,反对軍事撥款。在反对社会主义者的非常法年代,倍倍尔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議,进行了反对取消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这时倍倍尔显示出了自己是党的真正領袖。他及时地看出了危險性,認識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評是正确的,因而把党引上了进行不調和的斗争的道路。”(《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294 頁。)倍倍尔曾經反对伯恩斯坦,但他的斗争是不彻底的。他有时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对机会主义者做出原則性的让步。倍倍尔在揭露德国帝国主义时,無論在德国工人运动問題上或第二国际的活动上都犯过中派的錯誤。列宁曾經指出,倍倍尔的为人和活动反映了工人階級在准备和聚集力量时期的特点,反映了它的长处和缺点(參閱同上书第 295 頁)。但是,倍倍尔对革命无产階級的必然胜利一貫地表現了坚定的信心。——第 29 頁

14 福尔馬尔,乔治·亨利(1850—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右翼

的領袖之一，改良主義的思想家。福爾馬爾要求黨拋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放棄黨綱的宣傳，把黨的活動僅僅限制在爭取微小改良的議會鬥爭範圍內。在土地問題上他捍衛富農的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是熱烈的社會沙文主義者。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批判過福爾馬爾的機會主義觀點。——第30頁

15 倍倍爾指的是馬克思的著作《法蘭西內戰》。——第30頁

16 李卜克內西，威廉（1826—1900）——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創始人和領袖之一，曾經積極地參加1848年的革命。流亡倫敦期間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結識，成為社會主義者。——第30頁

17 俾斯麥的文化鬥爭——這是對19世紀70年代俾斯麥反對德國天主教會（“中央”黨）的鬥爭的稱呼。鬥爭的方法是：警察迫害，把耶穌會教團暫時驅逐出德國，限制教會的某些權利，等等。實際上根本就沒有進行什麼文化鬥爭。“俾斯麥的這場鬥爭，只是鞏固了天主教徒的戰鬥教權主義，只是危害了真正的文化事業，因為這樣一來不是把政治上的分野提到首位，而是把宗教上的分野提到首位，使某些工人階層和民主派忽視革命的階級鬥爭的迫切任務而去重視最表面的、資產階級騙人的反教權主義運動。”（《列寧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77頁。）——第30頁

18 考茨基的這些文章曾被譯成俄文，并由“知識”公司于1907年以《革命的展望》這個標題出版。小冊子《倫理學和唯物主義歷史觀》在1906—1917年期間和蘇維埃年代曾數次被譯成俄文出版。——第30頁

19 阿爾巴和佛利——以異常殘酷的手段鎮壓農民起義的貴族國事活動家。曾任西班牙國王駐尼德蘭全權代表的西班牙公爵阿爾巴（1507—1582），在國內實行血腥的恐怖政策，對積極的革命家進行了大規模的屠殺。——第31頁

20 哈布斯堡王朝——奧地利皇族，最後一個皇帝查理一世（1887—1922）為1918年的革命所推翻。——第31頁

21 羅曼諾夫王朝——自1613年至1917年統治俄國的沙皇皇族。最後一個沙皇尼古拉二世（1868—1918），為1917年的二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推翻。——第31頁

22 1848年革命被鎮壓下去以後，普魯士實行了建立在所謂三級制之上的憲法。全體居民都按照所納稅額分成三類即三“級”：分擔總稅額三分之一的最大額稅款的人列為第一類；分擔第二個三分之一大額稅款的人列為第二類；分擔最後一個三分之一的小額稅款的人列為第三類。每一類都選出同等數目的復選人，再由復選人選舉議院的議員。這樣就可以保證第一類和第二類的代表、亦即富有的居民階層在議院中占居統治地位。這個制度在普魯士一直實行到1918年。——第32頁

23 “霍屯督选举”——对1907年德意志帝国议会选举的讽刺称呼。这次选举的结果，社会民主党较上届选举减少了三十六个议席。选举进行时，恰值反动政党正在争取增加拨款来加强殖民政策，镇压西南非洲德国殖民地的起义。从1904年坚持到1907年的霍屯督部族的起义，被非常残酷地镇压下去。——第32页

24 “摩洛哥危机”——法国帝国主义者力图侵略摩洛哥。英国政府对此加以赞助，但德国帝国主义则反对法国的计划，提出了对摩洛哥的权利要求。1906年在西班牙城市阿尔赫西拉斯召开的国际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会议的决议更加加剧了国际局势并且加强了军备竞赛。

德国、英国、法国和沙皇俄国在土耳其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已经进行了很长时期。到了20世纪，由于德国建设横贯土耳其直到巴格达的铁路（后来又延长到波斯湾）而尖锐化。这个斗争几次达到非常激烈的程度。——第33页

25 诺曼，弗里德里希——柏林出版的研究政治、文学和艺术问题的周刊《Hilfte》（《援助》）和自1889年起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资产阶级杂志《Neue Rundschau》（《新观察》）的出版人。——第41页。

26 康德，伊曼努尔（1724—1804）——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初期德国唯心主义的创始者。康德的哲学带有二重性：他一方面承认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物，即所谓“自在之物”的客观存在，一方面又认为这些物是不可认识的。在康德看来，空间、时间、因果性、自然规律都不是物质世界的特性，而只是人的认识能力的特性，是人先于任何经验而具有的直观和意识的形式。康德企图把科学和宗教调和起来。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家和修正主义者，其中包括伯恩斯坦和阿德勒等人，都是康德哲学的拥护者。考茨基也认为把马克思的经济和历史理论同康德哲学结合起来是可能的。——第43页

27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米海尔·伊万诺维奇（1865—1919）——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后为立宪民主党员，1917—1918年是乌克兰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积极活动家。他在《过去和现在的俄国工厂》一书中反对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民粹派。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公开捍卫资本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的剥削，写过一些妄图“驳斥”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经济问题的著作。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改良主义者，都利用考茨基所引用的这本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著作《现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119页）和他的其他著作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第44页

28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小册子《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曾经刊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杂志上，但删除了有关新条件下的街垒策略、革命斗争手段和破坏资产阶级宪法的可能性等若干论点。这些删节歪曲了恩格斯的观点的本质，使他变成

了资产阶级—地主国家的法制的拥护者。恩格斯坚决地抗議了这种仅仅有利于机会主义者的、歪曲他的观点的作法。恩格斯的《导言》第一次在苏联全文发表(参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6卷第2部)。——第57頁

29 《新萊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自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出版于科倫,由馬克思任主編。該报发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著作。列宁在《卡尔·馬克思》一文中曾称該报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最好的、无与伦比的机关报”。——第57頁

30 凱列尔,艾恩斯特(1841—1928)——主張对社会民主党采取非常手段的普魯士保守党人;1894—1895年任德国内政部长。按照恩格斯的評价,他是“刚愎自用的、傲慢的和心胸狹隘的容克的典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4卷第35頁)。——第58頁

31 《前进报》(«Vorwärts»)——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出版于1876年至1933年。恩格斯曾在該报上对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表現进行了斗争。恩格斯逝世后,該报經常刊载机会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捍卫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曾进行反苏宣傳。——第59頁

32 恩格斯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6卷第2部第239—254頁。——第60頁

33 普特卡麦尔,罗柏特(1828—1900)——普魯士显貴,曾任許多高級官职;1881年任内政部长,对工人运动和一切反对党进行了殘酷的斗争。——第66頁

34 考茨基这里指的是西班牙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西班牙于1873年建立了共和国。领导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的无政府主义者阻碍了共和国的巩固:他們阻撓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妨碍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發揮。各地起义被粉碎和工人阶级被镇压以后,君主制度又恢复起来。恩格斯在总结西班牙革命斗争的经验时写道:“西班牙的巴枯宁分子給我們提供了一个怎样搞糟了革命的最好不过的例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5卷第124頁)——第66頁

35 奥地利的无政府主义者采取了一些恐怖行动,結果奥地利政府于1884年发布了一个反社会主义者的专门法令。根据这个法令,警察封閉了工会和工人报刊。但是工人运动仍然继续发展起来,在1889年1月成立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第67頁

36 “独立派”或“青年派”——施佩尔、康普梅尔等人——90年代初德国社会

民主党内“左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他们在议会斗争可以使社会民主党大大扩大对群众的影响，并且是工会运动以外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极重要形式的时期否定议会斗争。“独立派”集团后来被开除出党。——第69頁

37 这里指的是克里木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尽管俄国军队在塞瓦斯托波尔尔坚持了十一个英雄的保卫战，俄国却为英、法和土耳其联军所战败。列宁曾经写道：“克里木战争显示出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103頁）封建农奴制度是俄国战败的基本原因。战争加强了国内的革命动荡，促进了政府实行农民改革和其他改革。——第82頁

38 布朗日，乔治·艾恩斯特（1837—1891）——法国将军，1885—1887年任陆军部长。他一方面同反动的保皇派进行勾结，一方面企图借助于笼络人心的宣传来为自己树立民主派的声望。他曾在一段时期里利用了他在小资产阶级分子中间的威信。——第84頁

39 复票选举权——选举时进行几次投票的权利，例如，可以同时居住在居住地点以及企业和科学机关等所在地投票。这种权利使有产阶级有可能得到额外的选票。——第100頁

40 考茨基显然指的是女作家苏特涅·贝尔莎（旧姓金斯基，世袭伯爵）——资产阶级的国际反战协会的创始人和主席。——第102頁

41 卡特尔——资本主义垄断形式之一，某一生产部门的企业主之间关于规定商品统一价格和划定销售地区的协定。

瑞恩——资本家间关于通过市场收购或仓库囤积的办法来提高某些商品价格的临时协定。——第106頁

42 勃伦塔诺，路易奥（1844—1931）——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反对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剥削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只承认不革命的“阶级”斗争，号召建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和平。勃伦塔诺认为通过建立改良主义工会和实行自由主义的工厂立法，就能够消除阶级矛盾。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他想说服工人，要工人满足于自己的雇佣奴隶的命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部第152頁）。在帝国主义时期，勃伦塔诺成为垄断组织的热心的维护者。在他看来，垄断组织同工会团结合作，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危机，保障资产阶级社会内的社会和平。在土地问题上他主张“土壤肥力递减”和小农经济稳固性的反动理论。——第108頁

43 这里指的是1898年的战争，美国通过这次战争掠夺了过去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夏威夷，确立了对古巴的控制。——第111頁

44 这里指的是位于下面这些河流两岸的国家或首都：史普勒河——柏林；塞納河——巴黎；涅瓦河——彼得堡。

哈德孙河和密士失必河在美国；达达尼尔海峡在土耳其；恒河是印度的大河；黄河是中国的大河之一。——第 126 頁

45 《斯拉夫人和革命》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报纸《火星报》1902 年 3 月 10 日第 18 号上发表。——第 128 頁

46 “三月起义”——指德国 1848 年的革命，尤指 1848 年 3 月革命群众在柏林街垒的武装斗争。——第 128 頁

47 “六月起义”——法国 1848 年革命的最高点。6 月 23 日巴黎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在街垒上同反革命的正規軍和别动队进行英勇的搏斗。考茨基这里指的是陆军部长卡文·雅克將軍以空前残酷的手段对巴黎工人起义所进行的镇压。——第 128 頁

48 温第什格莱茨，阿尔弗莱德（1787—1862）——奥地利將軍，革命的恶名昭著的敌人。1848 年 6 月 12 日爆发的布拉格城居民的起义，被他指揮下的奥地利軍隊残酷地镇压下去。根据他的命令，奥地利軍隊以非常野蛮的手段镇压了 1848 年維也納居民的革命的十月起义。——第 129 頁

49 考茨基称革命的民粹派、秘密的“民意”社的成员、“黑分派”等等为 80 年代的俄国革命家。民粹派对历史和俄国的发展抱着不正确的观点：拥护个别人物、英雄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唯心主义理論，不承认人民群众的作用，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认为只有农民是革命的动力，放棄組織群众的工作，选择了个人恐怖这种错误的、有害的同沙皇制度作斗争的策略。但是在人民日益不满沙皇制度的条件下，80 年代革命民粹派的自我牺牲的斗争，曾是国内政治局势中的一个重大的因素，并且在俄国国外造成了强烈的印象。——第 130 頁

50 考茨基指的是欧洲和美国的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銀行給予沙皇政府的巨額貸款。——第 132 頁

51 “神圣同盟”——俄国、奥地利皇帝和普魯士國王根据 1815 年 9 月 26 日在巴黎签订的条約所結成的同盟。同盟的目的是这些国家的君主为了保卫现状，特别是为了对付一切革命运动（不管在何地发生）而互相援助。1815 年 11 月法国参加了这个同盟，后来大多数欧洲国家也都参加了这个同盟。

同盟在很长时期内曾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第 132 頁